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2019年第三季度）（总第51期）

结构大变革时期中国就业的新现象、新规律、新趋势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九月

结构大变革时期中国就业的新现象、新规律、新趋势
——CMF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19 年第三季度）

摘 要

2019 年以来中国就业形势一改过去四平八稳的局面而变得扑朔迷离，调查失业率两次攀上 5.3%却又很快回落，风险因素闪现闪离。我们要用警惕的眼光看待当前就业，可以说稳中有变、变中有忧。

当前中国就业问题主要是局部性的，包括六个维度：1、分行业看，受多种因素影响，汽车、电子通信、纺织等六大制造业、建筑、房地产、信息服务业等就业问题比较突出。2、分地区看，东北和京津冀地区的就业形势最为吃紧。3、分所有制看，民营经济遇到较大的困境，就业增长大幅放缓，就业景气度急跌。4、分规模看，小微企业形势低迷，就业海绵功能弱化。5、分就业形式看，双创企业倒闭潮使自雇佣就业人数增长乏力；严格的城市管理体制使传统形式的灵活就业人数大幅下降，新就业形态能否及时补充还需时间检验。6、分劳动群体看，大学生就业压力创新高，但已接近洪峰尾期；20-29 岁青年人失业问题最严重，特别是 20-24 岁尤甚。另外就是初中学历者。

未来一段时间内有多重因素会冲击中国就业，其中既有以技术进步为代表的长期的趋势性因素，也有以贸易战为代表的短期性因素，二者叠加交织，使就业形势的演变更加复杂。

第一个风险点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这是短期的最大风险。贸易摩擦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很可能是非线性非均衡的：一开始由于加征种类并不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再加上加征的幅度小，对就业的影响不是很明显，一旦美国将火力转向劳动密集型行业并持续抬升关税，当达到一定临界点时，不排除某些行业在局部地区突然引爆失业风险的可能性。现在最要防范的就是风险的集中释放。

在对美出口的行业大类中，通用设备制造业等九个行业要格外关注，它们占对美出口行业直接从业人员的 70%以上，对这些行业来说，引爆失业风险的关税加征临界幅度是略低于 25%的水平。进一步的测算表明，目前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可能已触及失业风险点，它们有近 500 万直接从事对美出口的生产人员。

从地域分布看，对美出口的通用设备制造业典型地分布在：江苏无锡、常州，山东青岛、临沂，浙江温州、宁波等地；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典型地分布在：江苏苏州、常州，山东济南，广东佛山、东莞等地；金属制品业典型地分布在：浙江金华，江苏无锡、常州，广东佛山、东莞等地；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典型地分布在：浙江宁波、台州、温州，广东佛山、东莞等地。

上述地方应加强预警，做好相关行业的风险防范工作。

第二个风险点是企业亏损正在深化，如果继续下去，可能会引发企业倒闭潮特别是弱质民营中小企业的倒闭潮，把劳动力集中抛向市场。

第三个风险点是当下的工业经营困境可能进一步传导到生产性服务业，后者对工业景气度高度敏感。而仓储物流、信息传输 IT 等行业不仅吸纳大量劳动力，很多还是高质量就业岗位，受冲击的不仅是就业数量还有就业质量。

第四个风险点是技术进步吞噬就业。这是一个长期因素，多项指标显示中国技术进步可能正在越过一个阈值而加速排斥劳动力，这在制造业中非常明显。

第五个风险点是不断攀升的财政压力使政府进行直接的就业干预能力受限，政府在赤字财政和就业干预之间要做出更艰难的选择。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对 2019-2020 年就业形势进行预测。如果 2019 年中国经济增速为 6.2%，那么非农就业增量仅 400 万，比上年回落近 230 万，这足以

证明今年就业形势之严峻。进一步，如果 2020 年中国仍能保持 6.2%增速，非农就业增量将有所恢复，但需注意，这种回暖主要是靠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租赁和商务服务等低生产率的传统服务业带动，不仅会拉低全要素生产率，更会拉低就业质量，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牺牲就业质量为代价实现的。

对于未来的中国就业，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

首先，中国就业有足够的韧性。随着经济体量的不断壮大，即便稍慢一些的经济增速也能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再加上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趋势，不太可能再出现大面积失业。在这种情形下，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出现与之前不同的变化，特别是失业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反应可能变得更平和，相应地，菲利普斯曲线变得更加平缓，这是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一个新的运行规律。

其次，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矛盾正在转型，即从数量型矛盾转向质量型矛盾。放眼未来，不太可能出现大面积的失业问题，问题是就业质量不高，甚至下降。当前中国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低质量就业是无法完成这一使命的。如何提高就业质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

为兼顾短期就业稳定和长期就业质量，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对贸易摩擦可能诱发失业风险的局部行业、局部地区，加快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或引导措施。2、对汽车、手机等近期面临较大困难的行业要研究专门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不是孤立的，要结合产业政策、消费政策、税收政策、交管政策等进行。3、要重视企业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面临的经营困境，从多个维度为企业减负，扶持政策应结合就业目标进行。4、适当放宽对地摊经济夜间经济的限制，扩大灵活就业的生存空间。5、在技术进步过程中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矫正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通过就业补贴等工具引导企业的用工行为，同时，要更关注青年失业群体的就业引导。6、继续发挥好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用好专项债等工具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但也要兼顾赤字财政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在赤字财政和就业目标之间不能偏废。7、重构未来的就业政策体系，积极就业政策要更加积极，目标从充分就业转向高质量的充分就业，为提高就业质量做准备；消极就业政策要更完善，进一步健全社会安全网，做好托底准备，防患于未然。

第一节 2019 年中国就业稳中有变、变中有忧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不断回落，但就业形势持续向好，这似乎已成为常态，但进入 2019 年后就业突然遭遇扰动，调查失业率两次攀升到 5.3%，虽然后来在宏观调控的强力干预下有所好转，但仍应引起警惕，当前中国就业可能正游走于正常与失常的边缘。

一、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不断回落，但就业形势持续向好。2019 年上半年这一趋势仍在延续，经济弱企稳，就业较充分，比年初预期的好。

自 2010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不断下移，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已成为新常态。劳动需求是引致性需求，经济增速放缓引起人们对就业的担心，但年年担心，年年就业形势都超预期，城镇新增就业还屡创新高。就业形势与经济增长的背离，似乎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一种新常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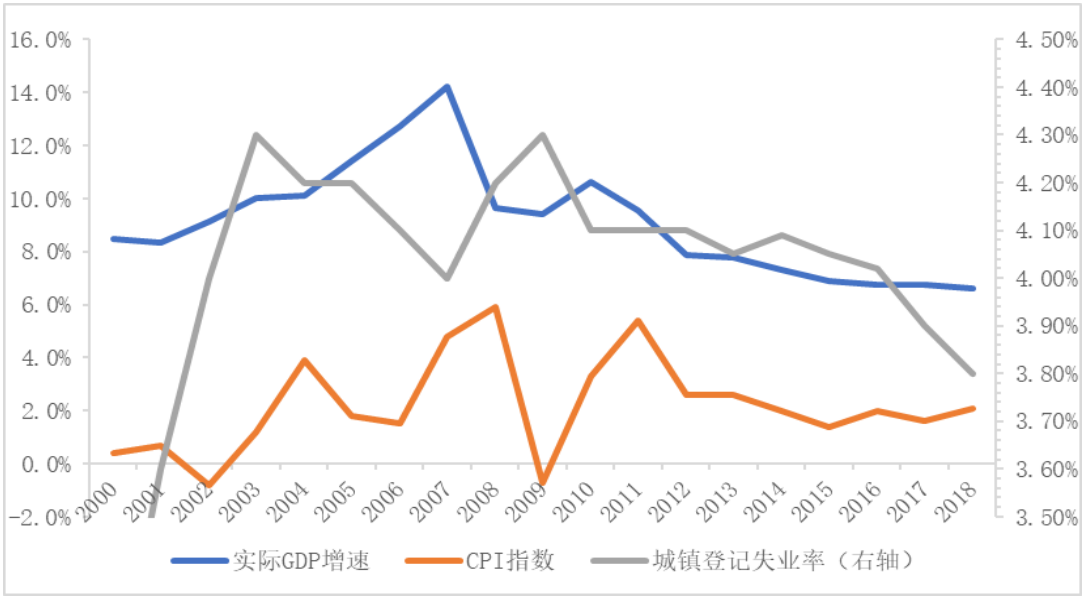


图 1.1：历年 GDP 增速、CPI 指数、城镇登记失业率（2000-2018）

2010-2018 年中国经济增速从 10.6%逐步回落至 6.1%，与此同时，CPI 指数也从最高峰 2011 年的 5.4%降下来，基本维持在 1%-2%的较低水平，另一方面，失业率也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城镇登记失业率从之前长期徘徊于 4%以上降到 4%之内，大致维持在 3.8%-3.9%附近。

如果说城镇登记失业率存在失真问题，城镇新增就业则能弥补这一缺憾，它同样显示出强劲的就业增长趋势。从 2011 年起，GDP 增速破十，城镇新增就业数量却在那一年突破 1200 万；2015 年破七，当年新增就业数量超过 1300 万；2018 年只有 6.6%，新增就业量达到历史新高 1361 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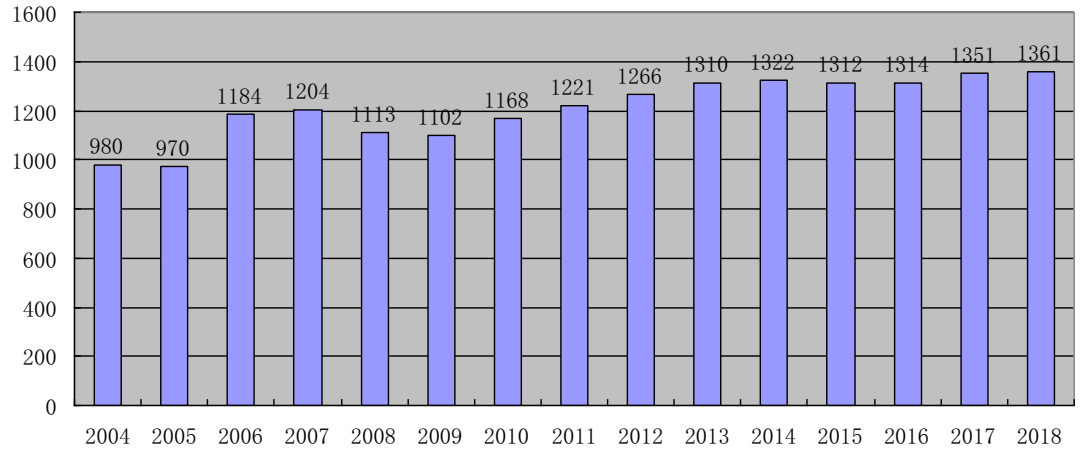


图 1.2：历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2000-2018）

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就业景气指数（CIER）也大致能反应近年来中国就业的繁荣迹象。2011-2012 年，就业景气指数在 1 左右徘徊；2014 年之后则基本稳居 2 以上；2018 年达到 2.38；2019 年虽有所回落，但仍在处于相对高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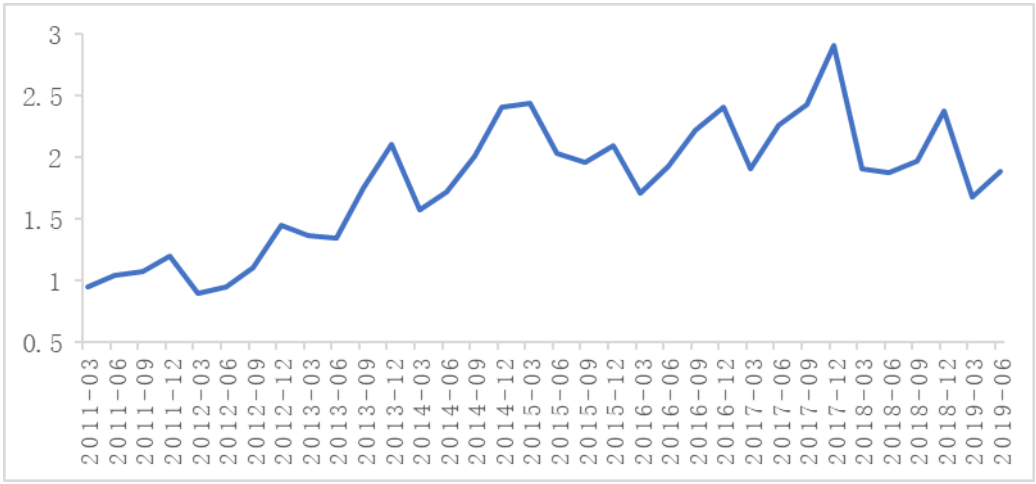


图 1.3：历年 CIER 指数（2011-2018 季度）

应该说，近十年来，人们已逐渐适应了较低经济增长下的高就业增长，对保

就业的经济增长底线的判断也逐步下移，从之前“保七说”到现在“保六说”，说明它已常态化。

低增长率、低通胀率、低失业率并存的“三低现象”，是对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的挑战，因为按惯常理解，高增长、高通胀与低失业率对应，或反之亦然。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却能与强劲的就业形势（低失业率）并存，说明我们理解中国劳动力市场运行规律的一些传统工具可能已经失效。

这个现象不是孤立的，次贷危机后，在西方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迹象。这在后面还会述及，这里不再赘述。

2019 年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偏离趋势仍在延续：首先是经济下行压力依旧。一季度 GDP 同比增速为 6.4%，比去年同期低 0.4 个百分点，二季度进一步降至 6.2%，与去年同期的差距扩大至 0.6 个百分点。虽然从总体上看，上半年增速仍维持在 6.3%的合意水平，但最多也只能算是弱企稳，下行压力仍在发酵。

但另一方面，就业“风景这边独好”，仍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1-8 月城镇新增就业 867 万，已完成全年目标的 78.8%。在国内市场不牢和外部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下中国就业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实属不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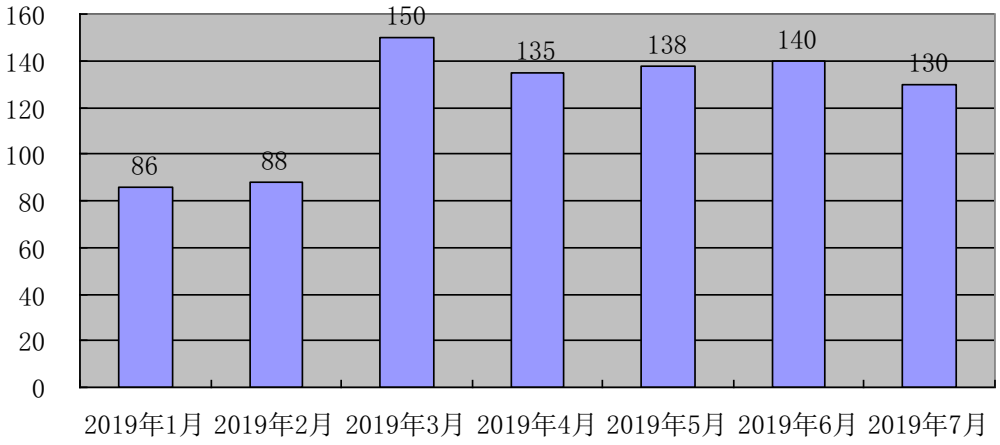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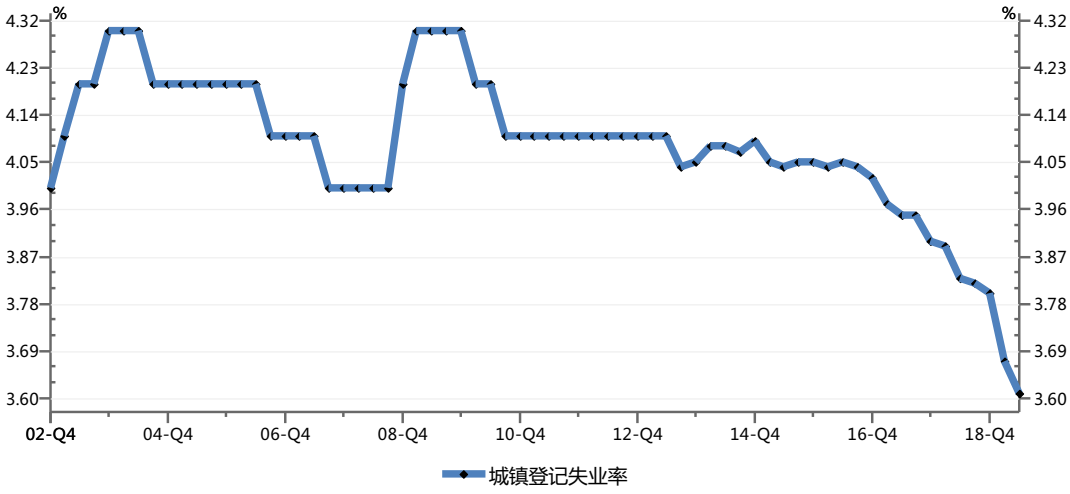


图 1.4：2019 年上半年各月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也降到近年来新低，二季度月末只有 3.61%，如图 1.5 所示。



数据来源：Wind

图 1.5：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季度变化趋势

总体来看，上半年就业比预期的好的多。要知道，去年底今年初人们对今年就业形势的预期还是比较谨慎的，甚至可以说保持高度警惕。在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把稳就业作为 2019 年六稳工作目标之首。2019 年 5 月，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就业领导小组，显示出政府对就业工作的高度重视。但从近几个月的数据来看，就业并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但人们实践中，人们似乎感知到就业压力较大。东南沿海企业倒闭潮，外企外迁、裁员，智联招聘一夜之间撤掉上百万个招聘岗位，百度上“找工作”搜索关键词陡增等报道不绝于耳。为什么统计数据的繁荣与人们感知的就业压力会有如此大的出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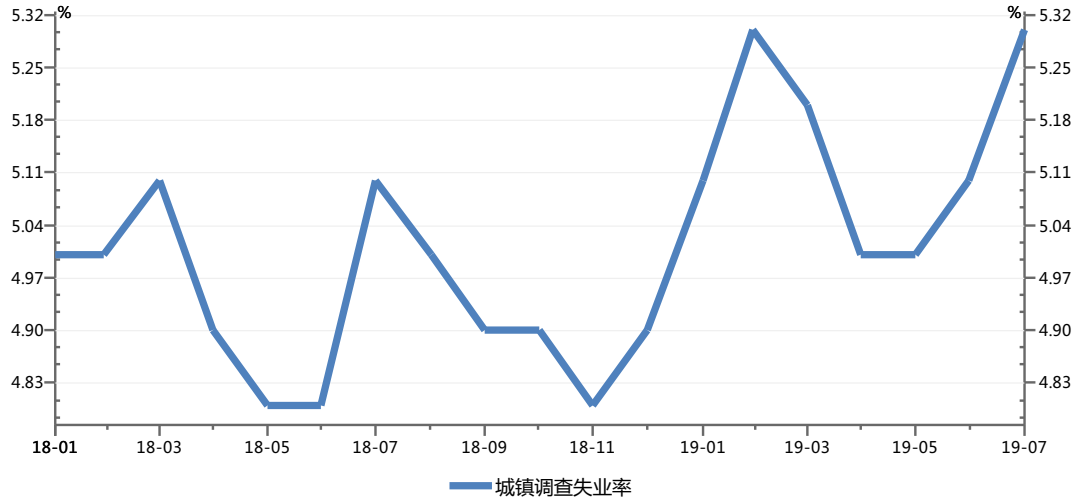
进一步解读宏观数据就会发现，就业风险在其他指标上其实已经留下痕迹，这在 2019 年年初尤为明显，只不过很快又消失了。

二、与以往不同的是，2019 年就业风险曾两度闪现，虽然中间有所缓解，但仍应引起警惕，多项指标已发出走弱信号。

1、调查失业率两次攀上 5.3%的相对高位

我们知道，城镇登记失业率存在诸多缺陷，比如靠失业者主动登记，有很多缺省值，另外，它不能覆盖农村劳动力，并不能完整反应就业形势，调查失业率则要好很多，它是通过对劳动力抽样调查所获得的就业和失业数据进行计算。从

1994 年 0.1%人口抽样调查试验开始，至 1996 年 1%人口抽样调查起步，2009 年开始覆盖 31 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至今已能覆盖所有地级市。月度劳动力调查的样本户大约为 12 万户，它不仅包括城镇户籍劳动力，还包括常驻务工劳动力，因此涉及面广，样本量大，代表性强，因此，相对于登记失业率，我们更应关注调查失业率所发出的信号。



数据来源：Wind

图 1.6：城镇调查失业率

从上图可以看出，自 2019 年 1 月以来调查失业率就有一个迅速攀升的过程，从 2018 年 12 月的 4.9%跳涨至 2019 年 1 月的 5.1%，再跳涨至 2 月的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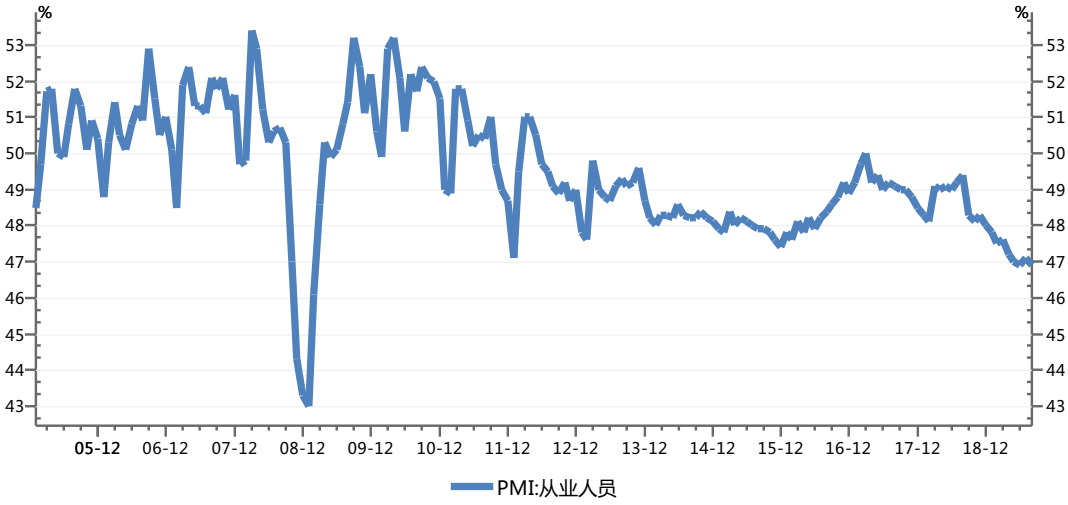
自 2018 年公布以来调查失业率一直在 5.1%以下，突然跳升至 5.3%，可能意味着就业形势正在迅速恶化，当时引起了人们较大的担心，好在从 3 月开始又回落至 5.2%，之后又逐步回归到 5%，6 月份又回升至 5.1%。但 7 月份开始调查失业率又再次回升到 5.3%，虽然这可能与毕业季大学生就业压力上升有关，但仍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它是偶然的吗？其他一些指标显示这绝不是孤立的。

2、PMI 从业人员指数持续下跌至 8 月份的 46.9

图 1.7 显示，自 2019 年以来制造业 PMI 就业指数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跌，直至 8 月也没有停止，只有 46.9，比上年同期跌了 2.5，幅度不可谓不大。现在处于自 2008 年 12 月份以来的第二最低点，当时受美国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就业形势告急，PMI 就业指数降至 43 的冰点。

类似地，非制造业 PMI 指数也有一个下跌过程，只不过相对缓和一些，从

2018 年 9 月开始就在荣枯线以下一路阴跌，至 2019 年 7 月只有 48.9。这些数据说明，不管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就业都处于不景气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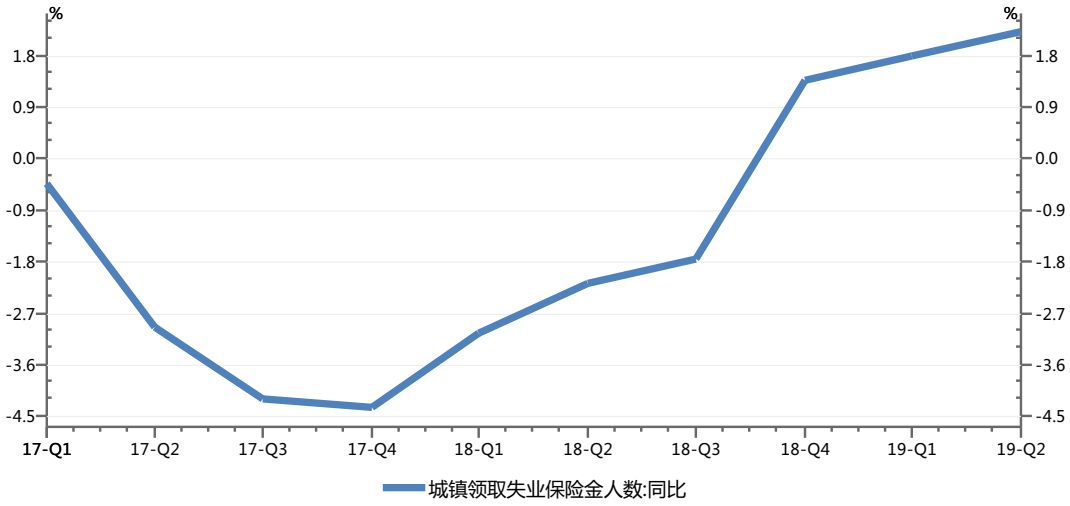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Wind

图 1.7：制造业 PMI 从业人员指数（月度）

3、领取失业保险的人数止跌回升，上半年同比增加 2.22%。

另一个指标是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失业人员可能会领取失业保险金，也可能不领取，能迅速找到工作或对再就业有信心的人更可能选择后者。如果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增加，则说明失业人数增加，就业信心下降，二者都表明就业形势的恶化。从图 1.8 可以看出，自 2017 年以来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增长率一直为负，但从 2018 年开始，负增长率不断收窄，至 12 月份增长率开始为正，幅度在不断扩大，2019 年一季度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同比增加 1.79%，二季度继续扩大至 2.22%。



数据来源：Wi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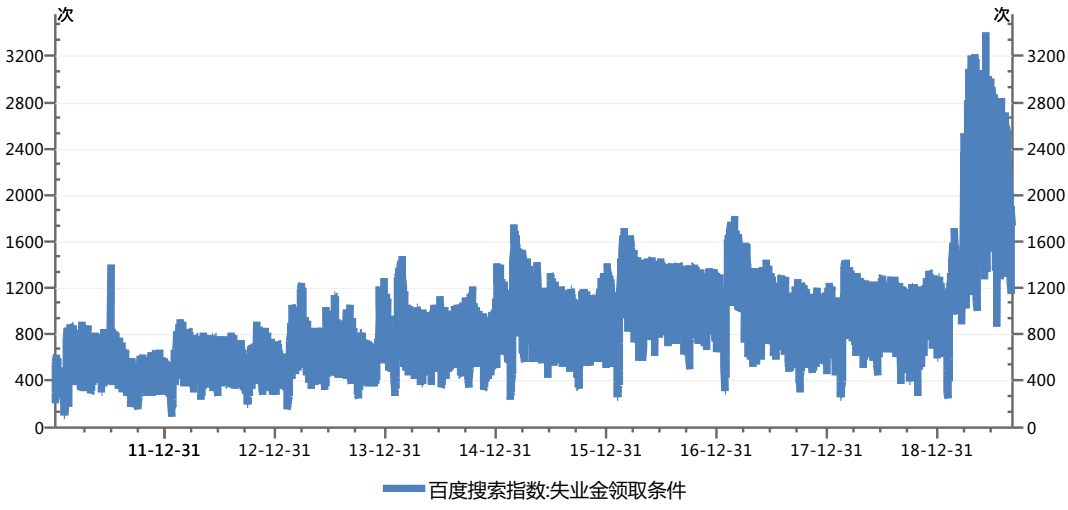
图 1.8：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增长率（季度）

4、失业人员再就业数量前 7 个月累计同比减少 8.58%。

另一个需关注的指标是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数量。2018 年城镇失业再就业人数与上年基本持平，但从 10 月份开始变为负值，此趋势一直延续到 2019 年，前 7 个月比去年同期累计减少 8.58%。这从一个侧面反应出当前工作不好找。

5、“失业金领取条件”等搜索指数飙升。

“春江水暖鸭先知”，如果就业形势不好，最先感知的就是劳动者，他们会通过各种信号传递出来，比如，在百度上搜索如何领取失业金。百度指数里就有一个“失业金领取条件”的关键词，该搜索指数自 2019 年以来出现了飙升。



数据来源：Wind

图 1.9：百度“失业金领取条件”搜索指数

第二节 分维度透视当前就业的结构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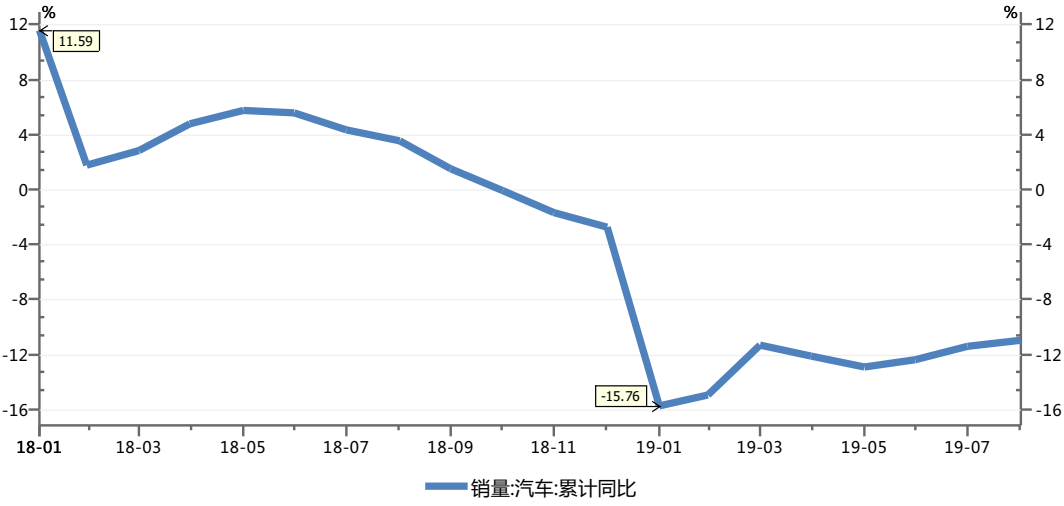
虽然前述各项指标走弱，但从总体上看，当前就业形势还算稳定，所以就业矛盾应该不是总量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下面分六个维度来剖析。

一、分行业看，汽车、电子通信、纺织等六大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信息服务业等就业问题比较突出，就业减量基本都在 50 万以上。

1、多重因素使汽车行业陷入困局，就业波及面大。

汽车行业值得高度关注：第一，其产业链长，产业关联度高。一旦出问题，会对上下游很多领域的就业产生冲击。要知道，光汽车制造本身就有 458.8 万的就业人口，这还不算销售、服务人员。第二，自 2018 年以来，汽车行业遭遇了严峻的困境，销量大幅下滑。如图 2.1 所示，按中汽协提供的数据，从 2018 年 10 月开始汽车销售量就开始下降，到 2019 年 1 月同比降幅突然猛增到 15.75%，虽然 6 月份汽车企业采取一些降价促销等手段全力挽救，但前八个月销量仍累计同比减少 11%，其中新能源汽车的下降趋势更明显，降幅达 15.8%。

面对如此之压力，一些地方政府又在考虑取消摇号购车，比如贵阳、广州、深圳等地。



数据来源：Wind

图 2.1 汽车销量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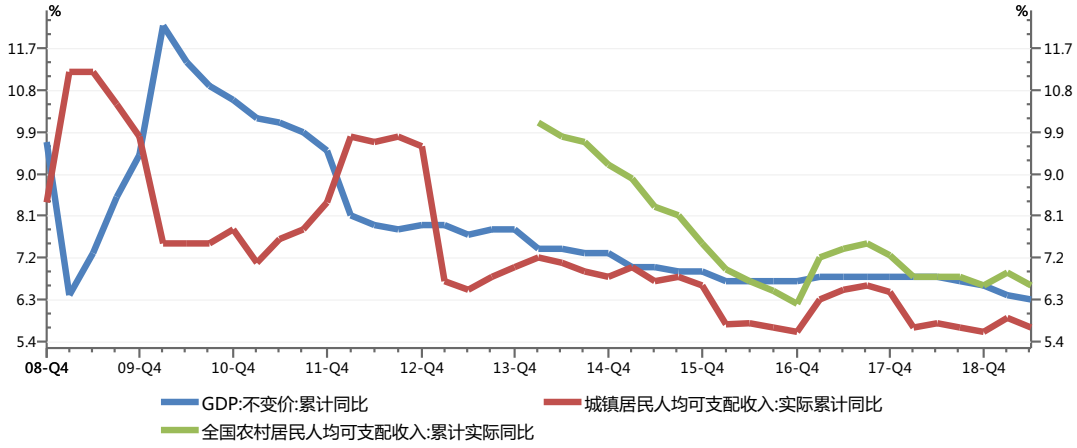
汽车困境是多重因素造成的：1、汽车市场已趋于饱和，目前汽车保有量约2.5 亿量，接近一户一辆。2、今年汽车排放标准从国标五转向国标六，令很多购车者产生观望情绪。3、新能源汽车补贴取消。4、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居民家庭的消费能力严重不足。

汽车和手机是两大代表性消费品，与居民部门的消费能力休戚相关。近年来，源于如下两个因素，居民消费能力受到严重限制。

第一是收入放缓。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根本因素，近几年经济下行必然冲击到居民收入，如图 2.2 所示。自 2013 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实际收入增速在不断下滑，城镇居民更明显，且一直低于 GDP 增速，农村居民虽然多数时候高于 GDP 增速，但也在呈下降趋势。

城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在 2017 年前三季度达到阶段性峰值，为6.59%，此后开始迅速下降，至 2018 年年底降为 5.6%，2019 年上半年为 5.7%，比同期 GDP 增速低约 0.6 个百分点。

类似地，农村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同比增速也是在 2017 年前三季度达到阶段性峰值，为 7.52%，此后开始下降，至 2018 年年底降至 6.6%，2019 年第一季度有所回升，上半年又跌落至 6.6%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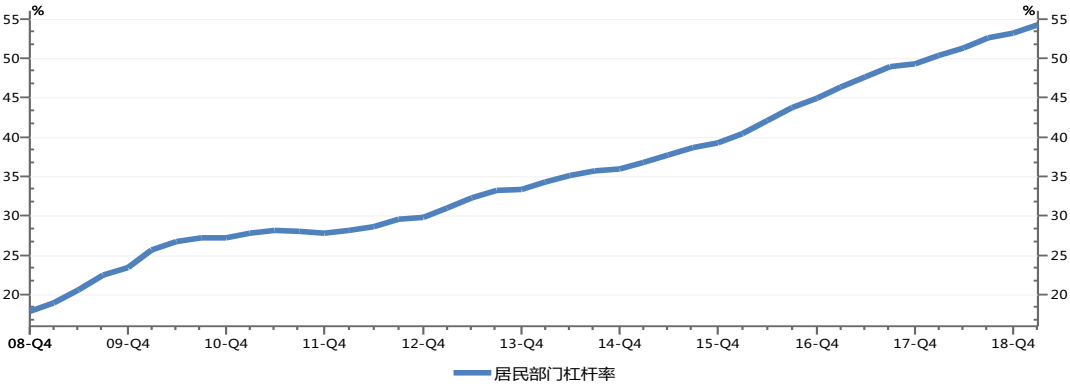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Wind

图 2.2 城乡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速

第二是杠杆率快速攀升。如图 2.3 所示，2008 年底居民部门杠杆率只有17.87%，2009 年超过 20%，2013 年突破 30%，2016 年在新一轮房价快速上涨的刺激下居民杠杆率直接越过 40%，2018 年居民杠杆率超过 50%的大关，至 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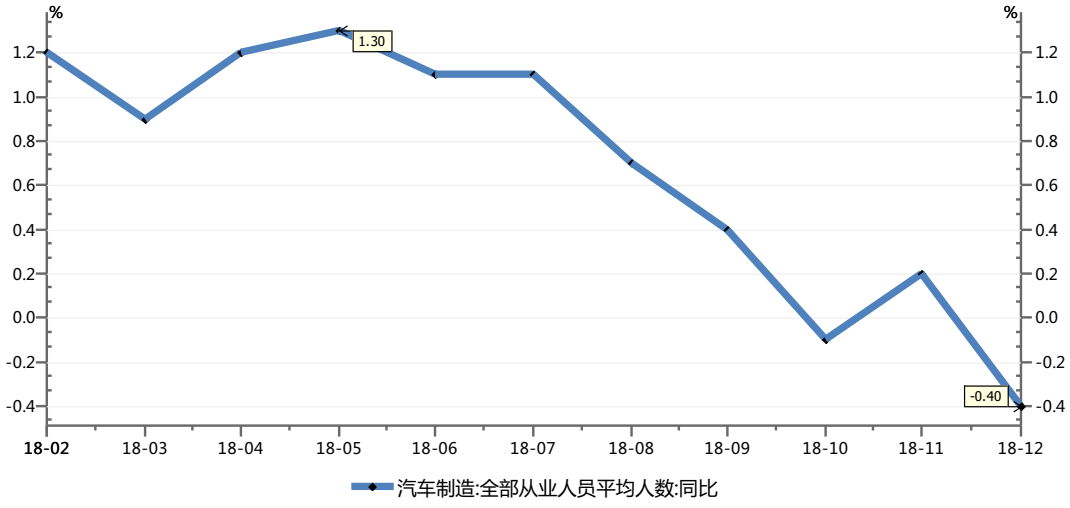
年一季度已达到 54.28%，正在逼近 60%的公认警戒线。虽然与英国的 88%、美国的 79%相比，这一数值不算大，但与欧元区的 59%、日本的 58%相比，已非常接近。但要注意的是，与这些经济体相比，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居民消费的顾虑很大，不敢敞开花钱，杠杆率特别是住房贷款比率提高使家庭部门还贷压力大增，更不敢大手大脚地花钱消费。



数据来源：Wind

图 2.3 居民部门的杠杆率

汽车行业的困局会对就业产生较大影响，其产业关联性强，波及面宽，而且汽车行业本身就是一个就业大户。汽车销量大幅下降会首先对其自身的生产制造人员产生影响。如图 2.4 所示，这一影响在 2018 年底就已经显现，其从业人数比上年同期减少 0.4%，合计达 13.8 万人，当时其销量下降 2.76%，按此推算，今年以来从业人员受冲击的数量应该不下 50 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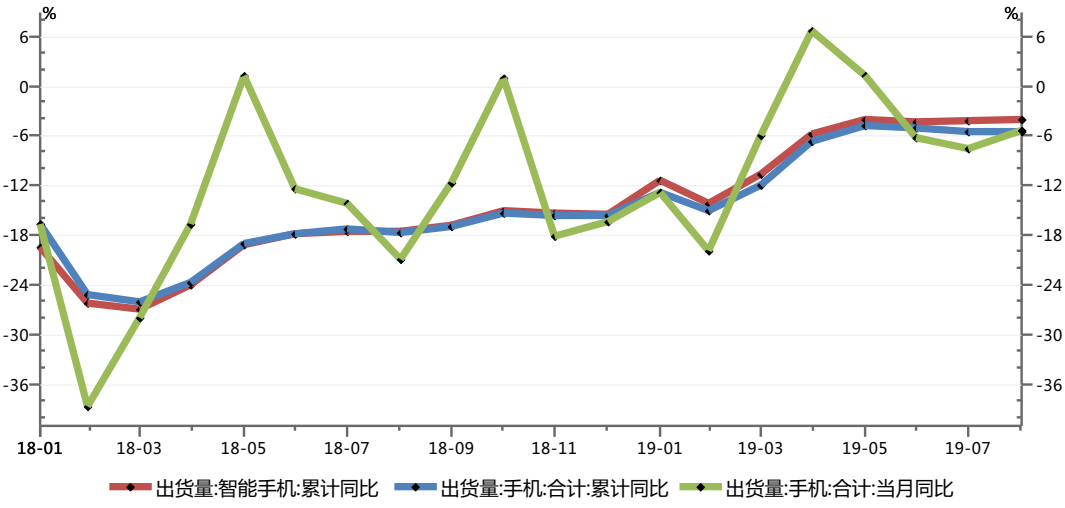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Wind

图 2.4 汽车制造从业人数变化率

2、手机行业遭遇严冬，牵扯整个通信业。

通信行业包括通信设备制造和通信服务业，前者又包括通信交换设备和通信终端设备，以手机为代表的通信终端设备对上游产业有很强的反馈性影响，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客户购买新一代手机时，就能开通新的业务，这会带动通信服务业的发展，这又倒逼运营商采购新的设备，比如新型交换设备或光传输设备，进而带动通信交换设备行业的发展。“终端为王”在今天通信领域尤为重要，所以，像华为这样世界一流的交换设备制造商都要占领终端设备的制高点。

但自 2018 年以来，中国手机行业也遭遇了持续的严冬，出货量一直下滑，谷底出现在 2018 年 3 月，当时累计同比下降 26.1%，此后跌幅虽有所收窄，但仍未止跌，截止 2019 年 8 月累计跌幅达 5.5%。在这一过程中，智能手机基本上呈同一演进趋势。



数据来源：Wind

图 2.5 手机出货量的变化率

手机销量大幅下滑是个普遍现象，今年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 2.3%，比中国略强，Q2 全球前五甲是：三星 75502 万台、华为 5870 万台、苹果 3380 万台、小米 3230 万台、oppo2950 万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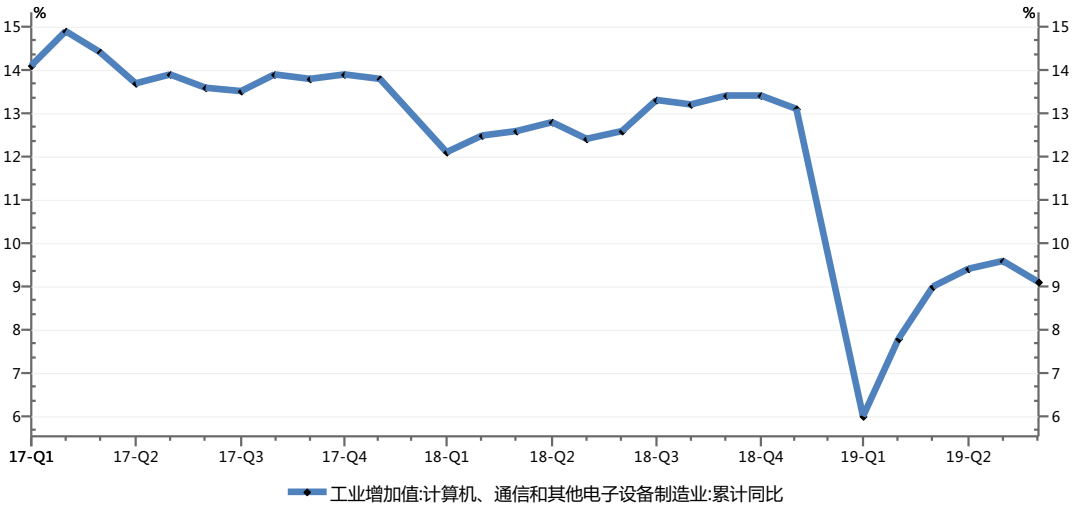
其中，中国市场的萎缩令人震惊，就以小米为例，Q2 在华销售下跌 38%，只有 1080 万台，苹果则下跌 32%。

手机市场遇冷有两个因素：第一，与汽车类似，市场渗透率太高，趋于饱和。

第二，居民消费能力受限，制约了升级换代。现在智能手机质量都很好，用上 2-3 年甚至更长时间不换都没问题。一部手机价格不菲，动辄几千元，升级换代需要消费能力。考虑到消费能力的限制，即便 5G 手机时代来临，也未必能完全逆转当前的颓势。第三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美国对中国通信领域的野蛮打击，这会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是需求端，加征关税会减少出口需求；二是供给端，限制核心零部件供应，同时终止一些重要协议的使用许可，比如 ARM 的协议、谷歌的安卓系统。脱离这些生态，产品的市场接受度会受到影响。

现在不光是手机，整个通信领域，乃至高端制造的全产业链，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度还非常大。美国对中国的限制措施首先针对“中国制造 2025”中的芯片、半导体、高端零配件等。中美通信产业进出口份额的对比大概能反应这一趋势，目前中国通信产业进口中有 45%左右来自美国，而美国只有 5%来自中国，说明中国高度依赖美国，但美国并不依赖中国。

手机行业的严冬必然冲击到整个通信领域，进而影响到就业。因为没有严格的统计口径，我们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如图 2.6 所示，2018 年 12 月该行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还有 13.1%，到 2019 年 2 月就降为 6%，随后有所反弹，但至 2019 年 7 月也只有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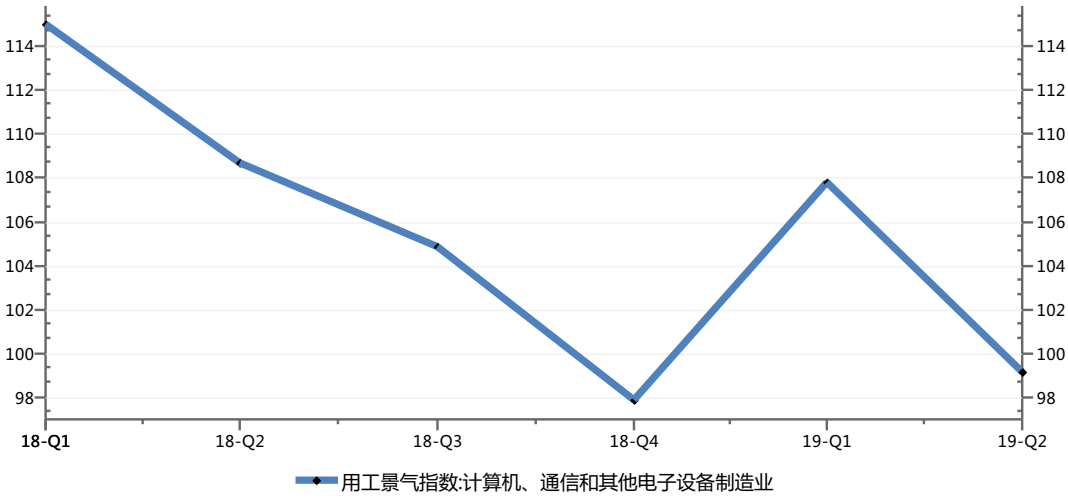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Wind

图 2.6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规模以上）

图 2.7 则显示，自 2018 年以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用工景气度指数直线下滑，这与手机遇冷的时间节点基本一致。2018 年 3 月景气度

指数为 115，到 12 月底降至 97.9，此后手机厂商采取了一些促销政策，手机出货量及产量的跌幅开始收窄，用工景气度也有所回升，但随后出货量又开始下跌，2019 年 7 月当月同比下降 4.9%，用工景气度指数也在二季度应声下跌，跌至与 2018 年 12 月低谷接近的水平，目前只有 99.2。

一些重要的手机厂商，比如小米就屡次传出裁员或降薪风波，尽管它们一再辟谣，但压力是肯定有的。



数据来源：Wind

图 2.7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用工景气指数

3、源于技术进步，纺织等六大制造业 2018 年各排斥劳动力 50 万以上。

按统计口径，工业部门包括开采业、制造业、水电气基础工业等三大类。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只计算这些行业的城镇就业人数，即城镇单位和城镇个体私营的就业人数，而不包括其他的个体私营就业人数，所以，只是就业人数中的一部分。

就以工业部门为例，截止 2018 年底，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为 21391 万人，其中，扣除建筑业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6299 万人（国家统计局季度数据），工业部门为 15092 万人，其中，城镇口径的就业人数为 7942 万人，占 52.6%。再以制造业为例，2017 年制造业全部就业人数为 10296 万人（国家统计局网站：城镇单位制造业人数 4635 万+私营个体制造业人数 5661 万=10296 万人），城镇口径的制造业人数为 7921 万人（wind 提供的工业企业细分行业的月均就业人数加总），占 76.9%。

假设其他口径下工业就业人数的变化趋势与城镇口径的一致，那么通过梳理城镇口径的变化趋势，也能窥见工业就业人数变化之一斑。

表 2.1 城镇口径下工业部门就业人数的变化趋势（万人）

	采矿业	制造业	水电气基础工业	工业总计
2015 年	701	8323	374	9398
2016 年	635	8189	365	9189
2017 年	573	7921	366	8860
2018 年	511	7071	361	7942

注：数据源自 wind 资讯网

从表 2.1 可以看出，2015-2018 年按城镇口径统计，工业部门就业人数累计减少 1456 万人，其中主要源自制造业部门，它累计减少 1253 万人；采矿业累计减少 190 万人，水电气基础工业部门变化不大。所以，我们关注的焦点是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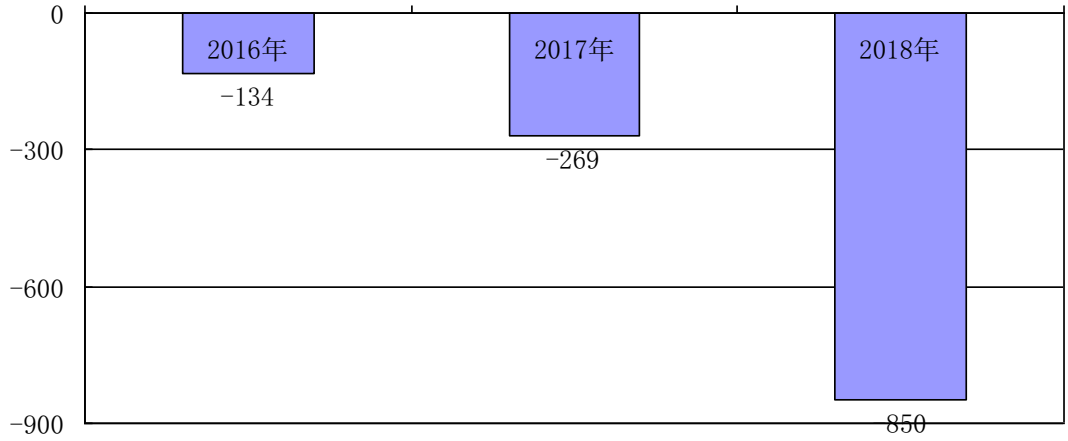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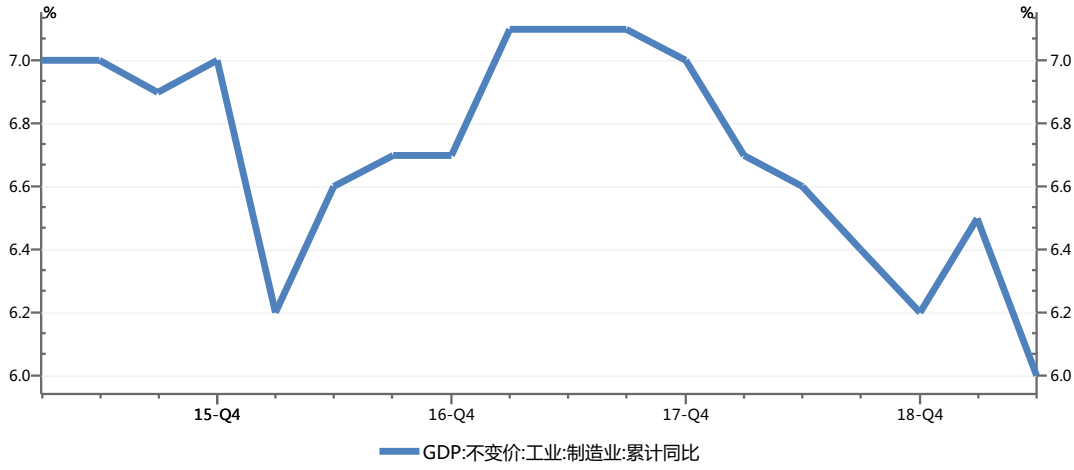
图 2.8 城镇口径下制造业就业排斥人数（万人）

图 2.8 显示，单以城镇统计口径计，2018 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出现了一次骤降，达 850 万人，而 2016 和 2017 年分别只有 134 万和 269 万。

当然这只是城镇口径下的制造业就业人数的骤减，而其他口径下制造业就业人数有可能增加，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前者的影响。但我们相信，这个抵消程度

不会很大，因为如前所述，城镇口径下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口径下制造业人数的比例已经高达 76.9%，所以上述数字足以令我们震惊。

那么，制造业为什么会排斥这么多劳动力呢？是不是因为 2018 年出现了大幅度的萎缩所致？图 2.9 显示，2018 年虽然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速有所下滑，但仍维持在 6.2%的相对较高位置，显然，制造业减员不是由于减产所致。



数据来源：Wind

图 2.9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要剖析制造业减员的原因就必须深入到制造业内部各细分行业中，那么，在制造业各哪些细行业中，哪些行业扮演了排斥劳动力的“急先锋”的角色呢？

从图 2.10 可以看出，2017-2018 年制造业就业排斥的十大“急先锋”分别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94 万）、纺织业（-72 万）、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71 万）、农副食品加工业（-66 万）、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64 万）、纺织服装服饰业（-61 万）、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45 万）、皮革毛皮羽毛及制鞋业（-36 万）、通用设备制造业（-35 万）、橡胶和塑料制品业（-34 万）。它们合计减员 576 万人，占制造业减员的 2/3 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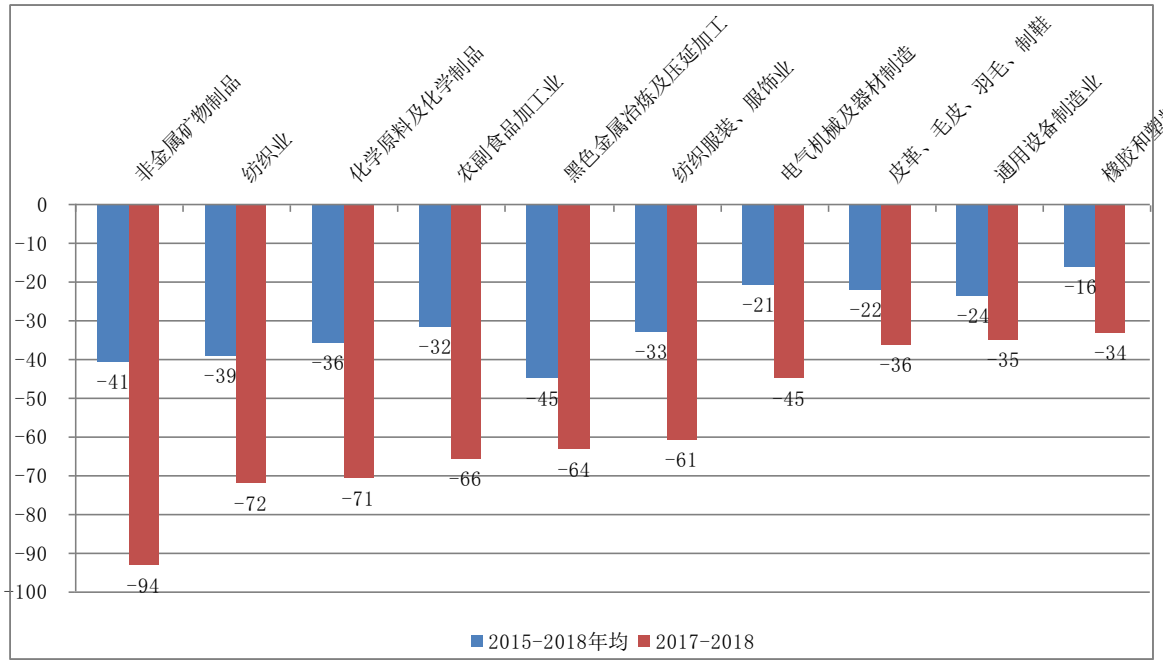


图 2.10 制造业细分行业中劳动力排斥的十大急先锋

接下来，这些行业为什么会在 2018 年加速排斥劳动力呢？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产出减少了；要么是要素投入结构更节约劳动了，后者对应于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

我们首先可以排除第一种可能性，按细分行业看，十大劳动力排斥行业在 2018 年都处于稳健增长的状态，如图 2.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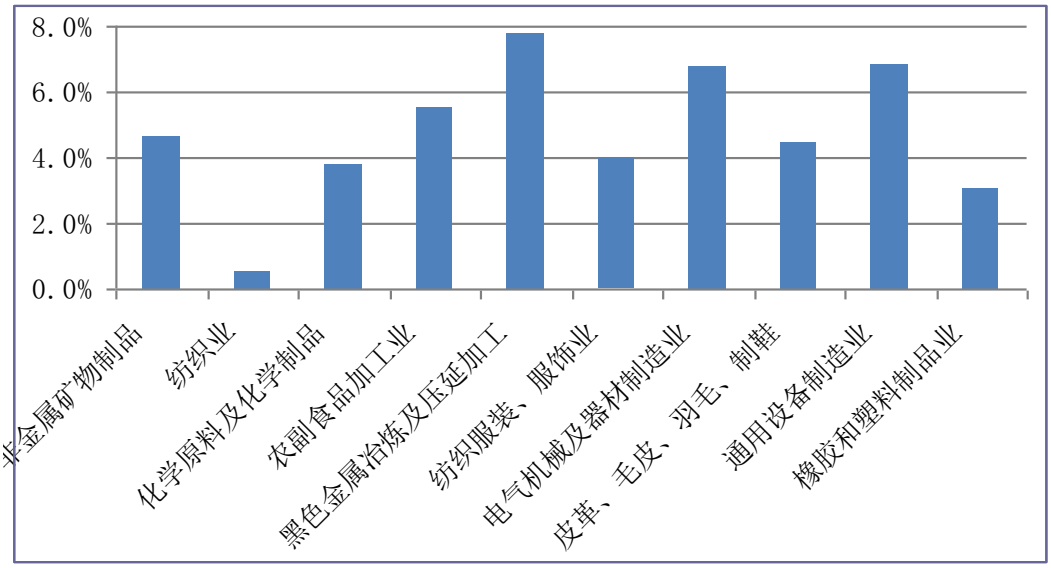


图 2.11 十大劳动力排斥行业的 GDP 增速（2018 年）

上图显示，除纺织业外，其他九大行业在 2018 年都实现了较为稳健的增长，其中，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在 3%以上；纺织服装服饰业、皮革皮毛羽毛及制鞋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在 4%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在 5%以上；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在 6%以上；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在 7%以上。只有纺织业较慢，但也有 0.6%的增长。

在产出增长的前提下，就业人数大幅减少，就只能归结于技术进步因素了。关于技术进步，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检验：一是投入维度，比如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二是中间产出维度，比如申请专利数量；三是结果维度，比如劳动生产率。我们很难说用哪一种方法能准确地度量技术进步，最稳妥的办法是三种方法综合比对。

我们用近七年来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年均值、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均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进行综合分析，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制造业中劳动力排斥十大行业的三类技术度量指标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研发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42%	0.44%	0.47%	0.52%	0.59%
	纺织业	0.44%	0.47%	0.52%	0.54%	0.61%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0.87%	0.90%	0.95%	0.96%	1.05%
	农副食品加工业	0.29%	0.31%	0.33%	0.36%	0.43%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83%	0.86%	0.87%	0.85%	0.95%
	纺织服装、服饰业	0.36%	0.36%	0.41%	0.45%	0.50%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34%	1.39%	1.46%	1.50%	1.70%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0.27%	0.30%	0.35%	0.39%	0.44%
	通用设备制造业	1.28%	1.34%	1.34%	1.39%	1.48%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73%	0.77%	0.79%	0.86%	0.97%
专利申请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5369	16627	16243	18777	24215
	纺织业	11457	12712	17017	13777	12667

数（个）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27165	30482	28778	34739	39389
	农副食品加工业	7344	8449	9074	10066	10966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3874	15419	14085	13262	14784
	纺织服装、服饰业	6347	7939	13143	8086	5653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78154	92954	92865	113140	136915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3538	4034	5026	5265	4917
	通用设备制造业	49305	53169	52898	60198	64164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5427	16042	16288	19614	24726
劳动生产率（元/人）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028904	1098414	1132024
	纺织业			895326	951122	940716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1745021	1872083	1964133
	农副食品加工业			1593092	1706738	1694699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781243	1924286	2312401
	纺织服装、服饰业			508477	557908	552292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139495	1207534	1238437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519629	564345	587501
	通用设备制造业			1025076	1088209	111196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933654	989609	1004025

注：根据 wind 数据库整理得出。

从表 2.2 可以看出，近五年来（2013-2017 年），劳动力排斥十大行业的技术进步特征非常明显：

首先看研发投入占主营收入占比，它们均无一例外地呈大幅攀升的态势。就以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为例，2013 年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0.42%，到 2017 年就升至 0.59%，五年间上涨了接近 40%；再以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为例，2013 年该比例为 1.34%，2017 年则为 1.70%，涨幅也有近 27%。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研发投入也呈迅猛的增长趋势，以纺织业为例，2013 年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为 0.44%，2017 年为 0.59%，增幅达 34.2%。再以纺织服装及服饰业为例，2013 年研发比例为 0.36%，2017 年为 0.50%，涨幅为 38.9%。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2013 年为 0.27%，2017 年为 0.44%，涨幅高达 63%。

其次看专利申请数。持续的研发投入带动了技术成果，2013-2017 年间，除纺织服装、服饰业外，其他九个行业的年专利申请数量都呈明显的增长态势。以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为例，2013 年申请专利数为 15369 个，2017 年升 24215 个，五年间增加了 57.6%，与研发投入的增速基本一致；再以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为例，2013 年申请专利数为 78154，2017 年为 136915，涨幅超过 75%。

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纺织 2013 年申请的专利数为 11457 个，2017 年为 12667 个，增幅达超过 10%。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2013 年为 3538 个，2017 年为 4917，增加近 40%。

最后看劳动生产率。仅 2015-2017 年，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就从 1028904 元增加到 1132024 元，三年时间提高了 10%；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从 1139495 元增至 1238437 元，提高了 8.7%；纺织业从 895326 元增加到 940716 元，提高了 5.1%；纺织服装及服饰业从 508477 元提高到 552292 元，提高了 8.6%；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从 519629 元提高到 587501 元，提高了 13.1%。

由此可见，技术革新带来劳动生产率提升还是很明显的，这是“技术吞噬”的根本所在。

从研发投入到产生技术成果，直至最终影响要素构成，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些年来制造业技术投入不断增加，生产率效应也在不断累积，劳动力排斥效应开始逐渐显现，似乎进入到一个加速期。

4、建筑业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滑，前七个月累计减少 15.6%，上半年就业人数减少 60 万人。

建筑业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一个重要场所，建筑业受调控周期的影响很大，在2015-2016年房地产刺激政策的拉动下，建筑业就业人数出现一次激增的过程，2017 年比上年增加 401 万，但随着调控政策转向以及房地产投资回落，2018 年增速放缓，就业人数比上年只增加 142 万人，如图 2.12 所示。

至 2019 年建筑业就业人数开始绝对下降，一季度同比减少 12 万人，二季度减幅继续扩大，上半年累计同比减少 60 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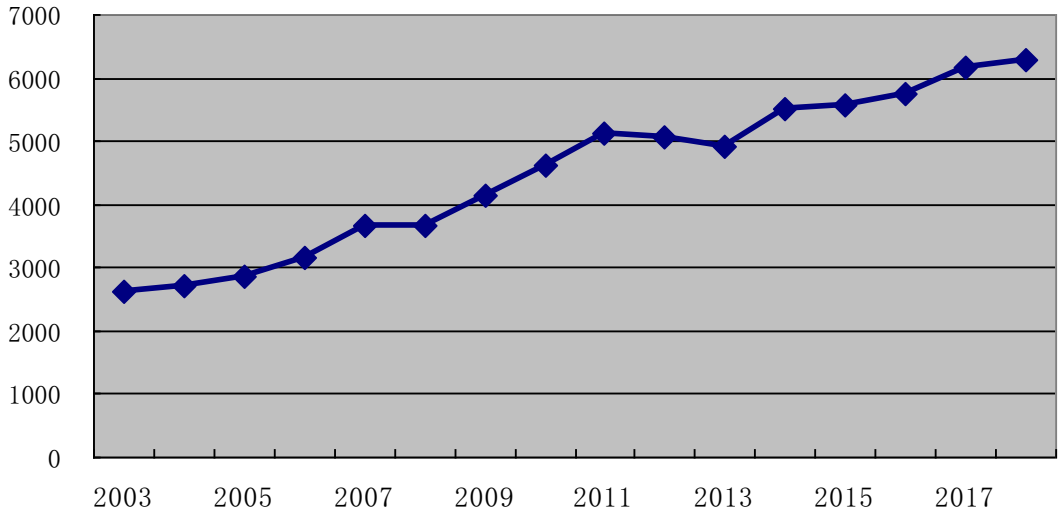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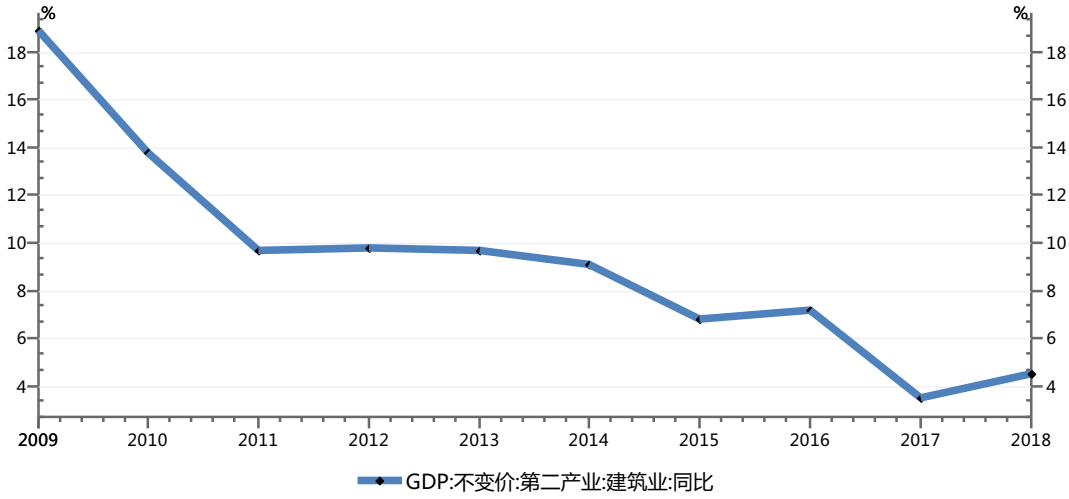


图 2.12 直接参与建筑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人数（2000-2018）

从图 2.13 可以看出，自 2009 年以来建筑业增速不断下移，从之前的两位数增长跌至 2017 年的 3.5%，2018 年虽有所回升，但也只有 4.5%，2019 年上半年略回升至 5.5%，处于缓慢运行区间。



数据来源：Wind

图 2.13 建筑业增加值的增长率（2000-2019Q2）

制约建筑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建筑和建材行业的产能过剩。据统计，我国有施工活动的建筑企业近 9 万个，市场已趋于饱和，竞争激烈。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均处于较低水平，就以 2017 年为例，建筑业的产值利润率只有 3.58%。这造成一个严重的结果，那就是建筑业投资的大幅下滑。

如图 2.14 所示，2016 年建筑业固定资产同比减少 6.5%，2019 年则骤减 19.1%，2018 年又减少 13.9%。至 2019 年，下降趋势依然迅猛，前 7 个月累计同比减少 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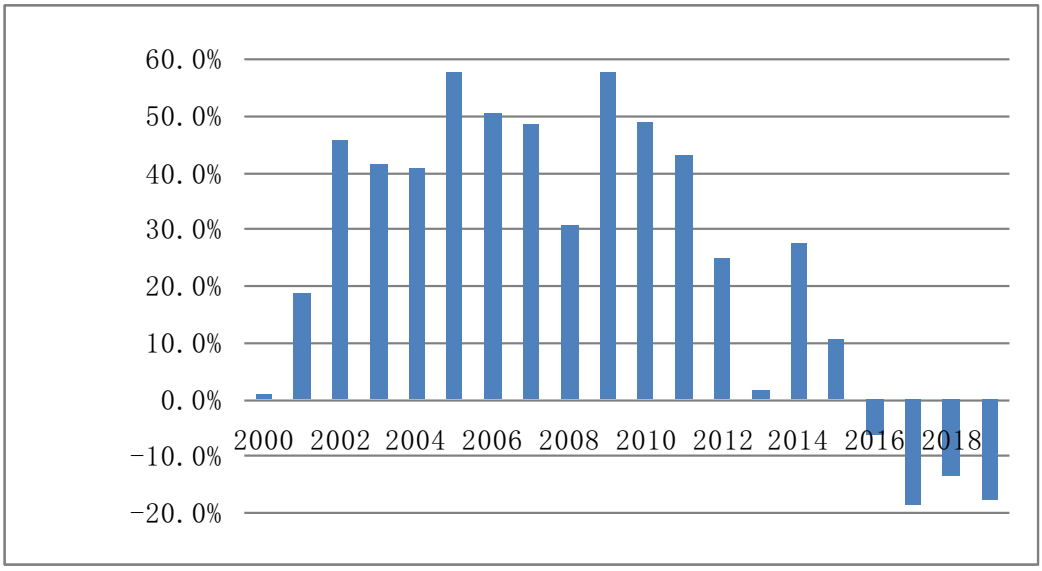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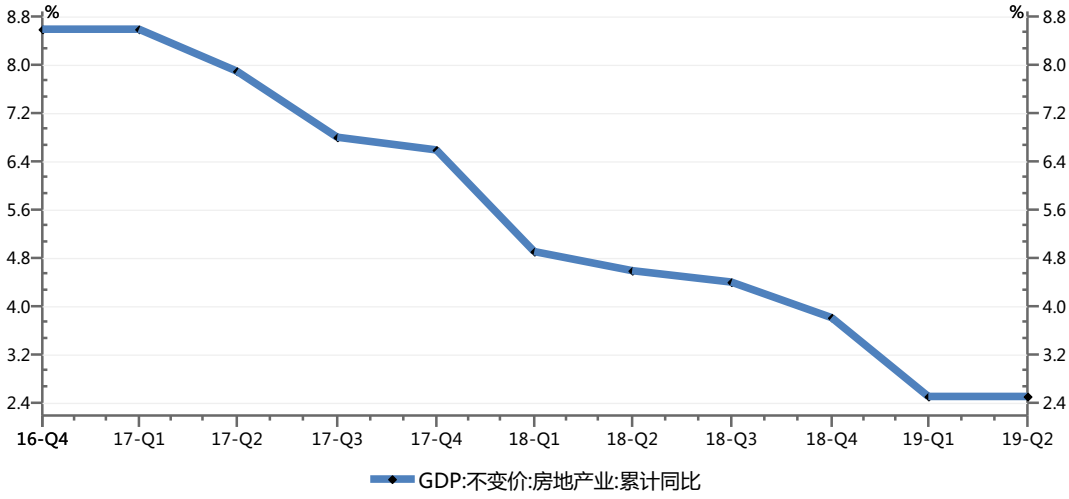
图 2.14 建筑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2000-2019Q2）

5、房地产业受严格调控，难有起色，就业低迷。

房地产业对就业有很大影响。作为服务业的一部分，直接从业人员接近 445 万之巨，另外，房地产业兴衰还会对建筑业就业产生直接影响。

但由于房地产业的特殊属性，近年来房地产业受到严格调控，国家三令五申“房住不炒”，2019 年 7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房住不炒”，并首次提出“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在此前后央行两次对房地产行业点名，在 7 月 29 日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结构调整优化座谈会上点名房地产行业占用信贷资源较多，要合理控制房地产贷款投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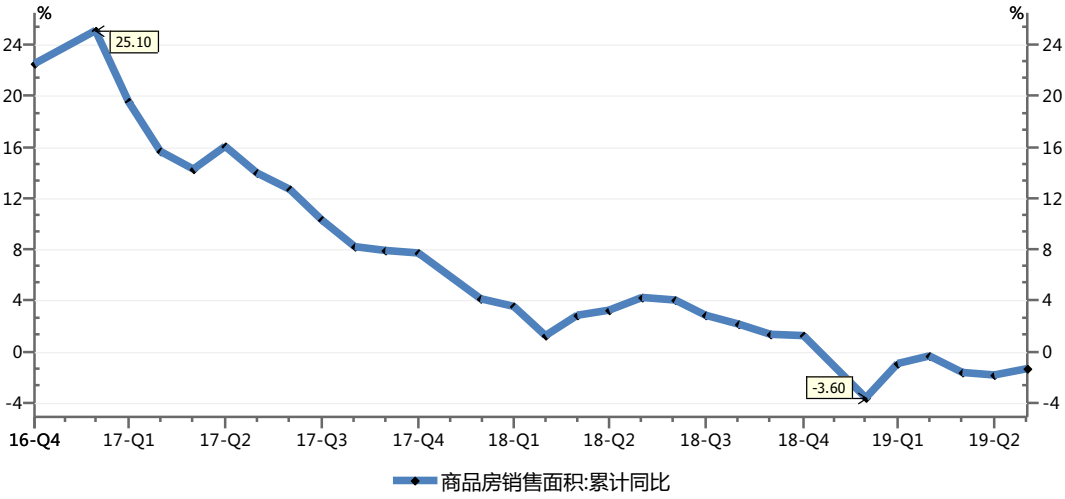
在此背景下，房地产业 GDP 增速不断放缓。如图 2.15 所示，2017 年之前尚能维持在 6.6%以上的水平，2018 年之后降到 5%以下，2019 年上半年则降到 2.5%。



数据来源：Wind

图 2.15 房地产业 GDP 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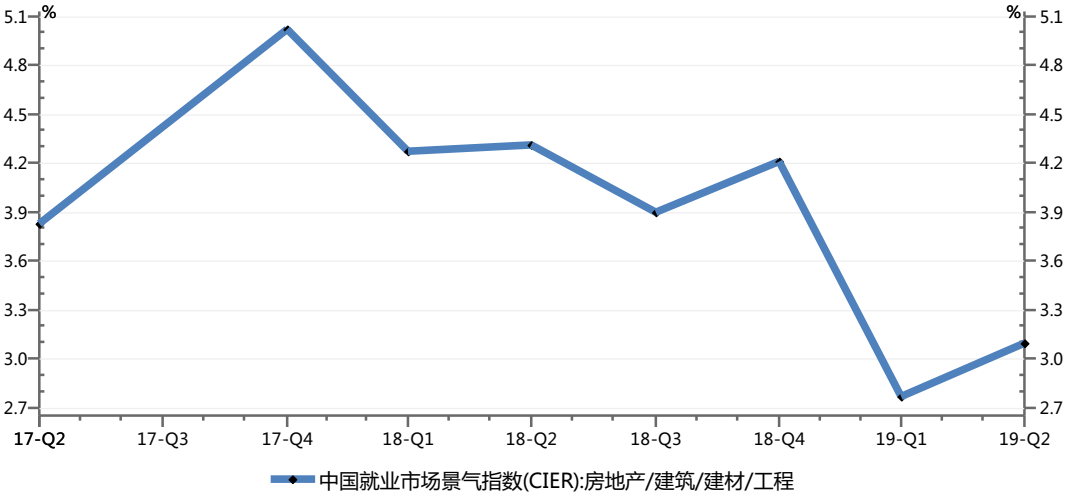
如图 2.16 所示，2017 年之前商品房销售面积基本上呈两位数以上增长，2018 年降为个位数，2019 年直接降为负数，2019 年前 7 个月累计同比下降 1.3%。



数据来源：Wind

图 2.16 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同比

图 2.17 显示，房地产/建筑/建材/工程领域的就业景气度指数呈大幅下滑态势，在 2017 年 12 月时高达 5.02，此后便一路下降，2018 年底降至 4，2019 年一季度降到 2.77，二季度略升至 3.1。



数据来源：Wind

图 2.17 房地产/建筑/建材/工程就业景气度

6、新经济回归常态化，信息服务业就业景气度下滑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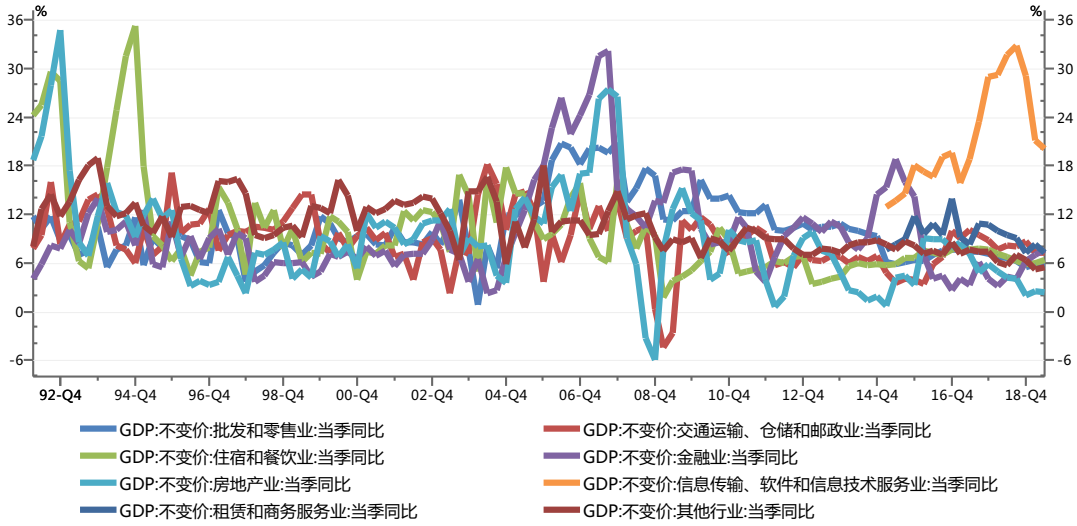
信息服务业的全称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生产性服务业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要格外引起关注，它是这一轮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如图 2.18 所示。

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服务业中共有四股力量先后扮演了引擎角色，第一股是房地产业。1992 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后，房地产的投资热潮催生了房地产业的崛起，但随着宏观调控，它又很快冷却下去。第二股是住宿和餐饮业，这是改革后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需要，它大约在 1994 年前后异军突起，此后消费服务业进入了稳定的发展期。第三股力量是金融业，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金融的支撑，金融业的崛起大约发生于 2006 年前后，股市井喷是个标志性事件。另外，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房地产业又东山再起，时间比金融业井喷大概晚一年，此间房价的快速上涨是个标志。

第四股力量就是当下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大约从 2015 年开始它就一骑绝尘、拔地而起，成为服务业发展的新动能。这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的大环境有关，也与工业部门自身的改造升级需求有关。

2018 年 9 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季度同比增速达到峰值，为 32.8%，而排第二位的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只有 9%。至 2019 年 6 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仍然是服务业中发展最快的产业，当季同比增速仍高达 20.1%，而其他服务业门类都在个位数之内。

但图 2.18 同样显示了令人担忧的一面，那就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已出现掉头向下的趋势。2018 年 12 月，该产业的当季同比增速回落至 30%之内，2019 年 2 月更是跌至 20%左右。如前所述，这与互联网泡沫破灭、信息产业回归常态化有关。



数据来源：Wi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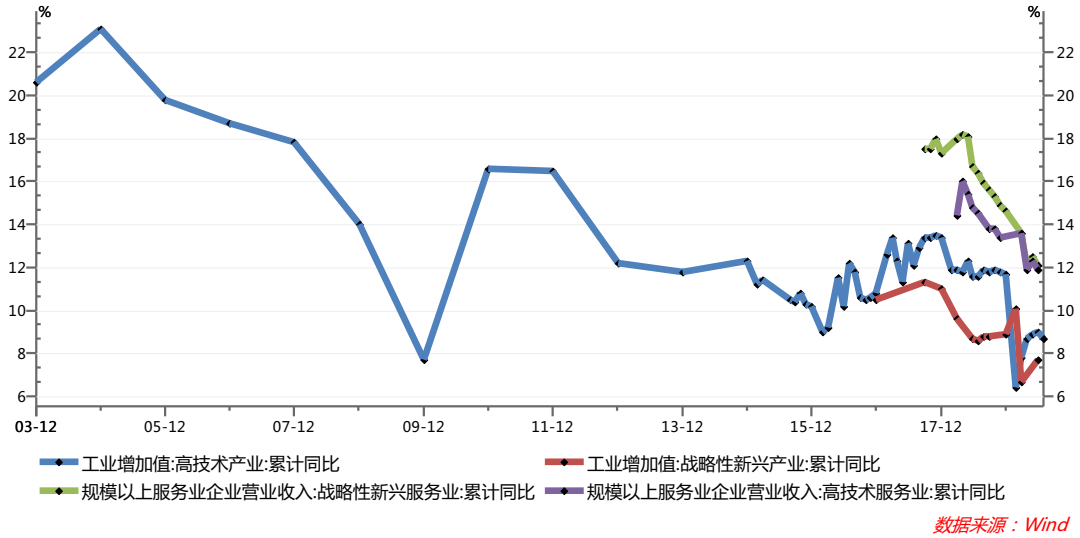
图 2.18 服务业中四股主导力量的继起

从理论上说，此次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异军突起是技术内生变化的结果，是一种供给力量在主导，这与过去其他服务业崛起不同。我们知道，在历史长河中，最经久不衰的驱动力就是技术。这一次肇始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也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时间跨度会超过过去任何一次服务业门类的崛起，但短期内它仍会受制于多种因素制约。

2019 年最大的冲击是新经济泡沫破裂，新经济回归常态化，包括互联网和科技公司不断的裁员，数字经济模式运行异化等，势必会冲击到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进而波及到就业。

新经济泡沫破灭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次数字经济革命与蒸汽机、电气化和信息革命不同，数字经济会全面变革企业的盈利逻辑，这使得传统对企业估值的方法失灵，盲目的新方法导致了前期新经济企业估值虚高，在发现新经济企业无法兑现利润前景之后，新经济估值泡沫破裂，企业融资困难。新经济企业在自身业务回归常态化之后，只能通过裁员等方式来维持。随着政府补贴、资本风口退潮，新经济泡沫回归常态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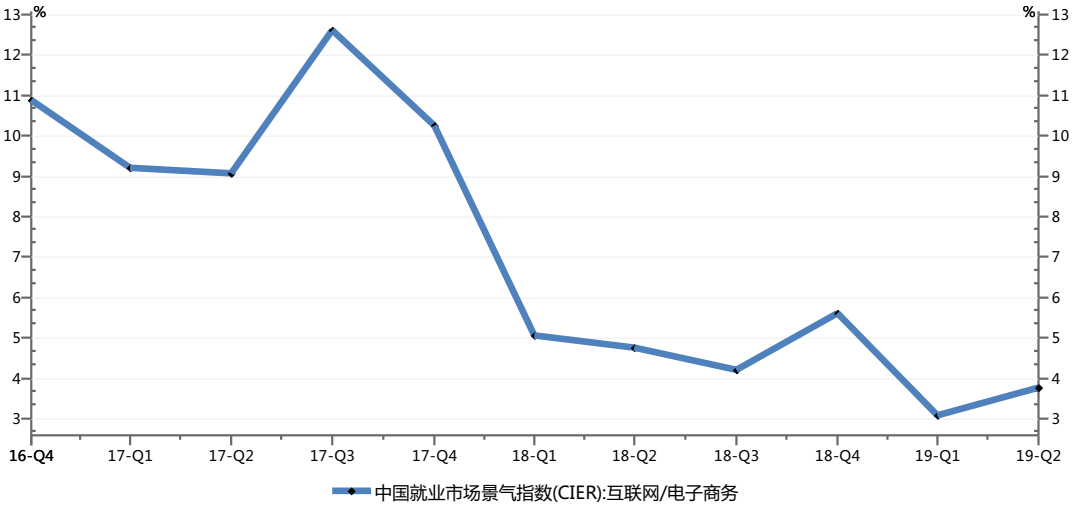
新兴产业近年表现不理想。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新兴制造业增速快速回落，战略新兴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增速也呈现快速回落态势。如图 2.19 所示。



数据来源：Wind

图 2.19 新经济回归常态化

从图 2.20 可以看出，以互联网/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就业景气指数呈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从 2017 年 9 月的峰值 12.62 降至 2019 年一季度的 3.08，二季度开始虽有所回升，但也只有 3.78。



数据来源：Wind

图 2.20 互联网/电子商务就业景气指数

另外，从招聘需求人数人数也可以看出类似的趋势。统计数据表明，2019 二季度互联网/电子商务岗位招聘需求同比减少 13.6%，另外， IT 服务（系统/数据/维护）、计算机硬件行业同比分别下降 13.3%和 15.9%。

二、分地区来看，东北和京津冀地区就业形势最吃紧，三线四线城市就业相对宽松，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就业承压更重。

1、在四大地区中，中部地区发展速度最快，而东部地区就业景气度最高，东北地区经济形势最差，就业形势也最严峻。

我们计算各地区所包括的省、直辖市 GDP 增速的简单平均数，作为表征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图 2.21 显示，近年来东部地区发展最快，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再次之，东北最差。就以 2018 年为例，中部地区 GDP 增速均值为 7.8%，西部地区为 7.3%，东部地区为 6.5%，东北只有 5%。2019 年上半年，这一态势得以延续，中部、西部、东部、东北地区的 GDP 增速分别为 7.8%、6.8%、6.3%和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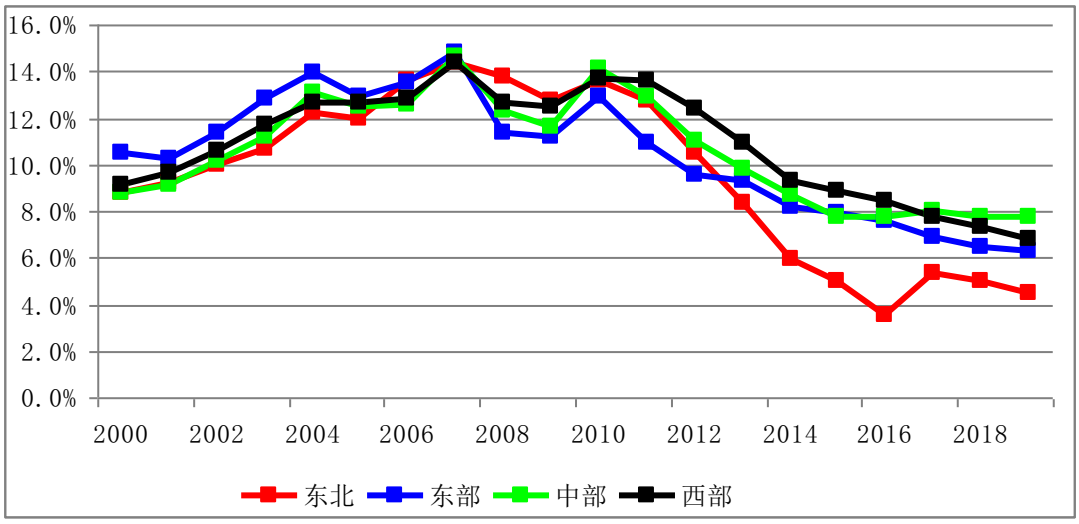


图 2.21 各地区 GDP 增速

进一步分产业解剖，2018 年中部、西部、东部、东北地区第二产业的 GDP 增速分别为 7.1%、7.5%、4.8%、4.5%，当时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发展超过了中部地区，但到 2019 年上半年，中部地区再次反超，四个地区第二产业增速分别为 8.1%、5.8%、4.7%和 2.3%，东北下滑严重，工业形势再次告急。如图 2.2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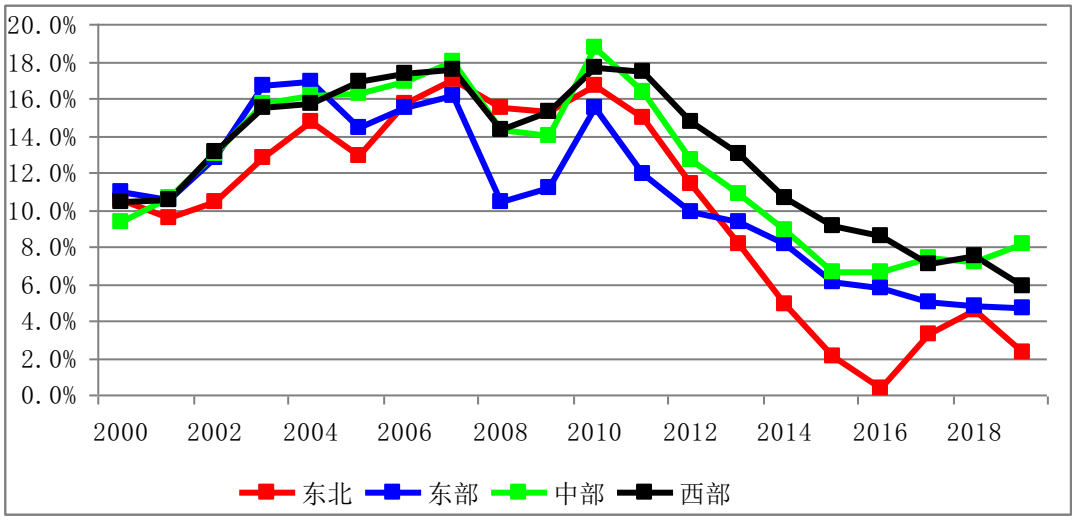


图 2.22 各地区第二产业 GDP 增速

再看服务业的发展。2018 年中部、西部、东部、东北地区第三产业的 GDP 增速分别为 9.3%、7.9%、7.9%、5.6%，到 2019 年上半年变为 8.2%、6.5%、7.6%、

1.8%，东北服务业下滑的更加严重，如图 2.2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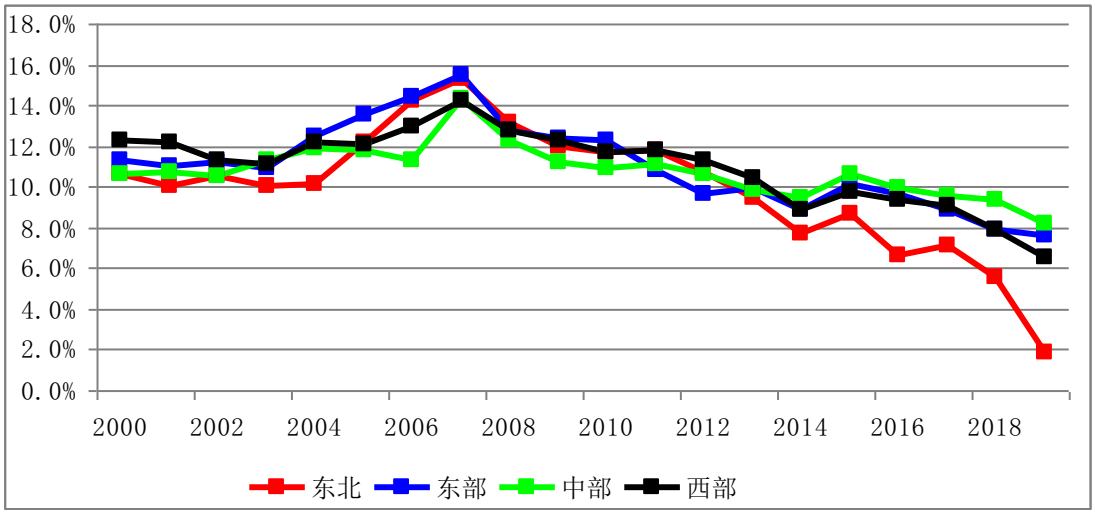


图 2.23 各地区第三产业 GDP 增速

我们以城镇单位与个体私营口径来统计上述四个地区的非农就业人数，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 2.3 四个地区非农就业人数（万人）

年份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2008	2380	12808	5185	5500
2009	2525	13847	5558	5836
2010	2666	14546	6124	6141
2011	2897	16018	6958	6839
2012	3073	17051	7497	7539
2013	3338	19701	8288	8638
2014	**3363**	21429	9224	9237
2015	3151	23322	9721	9945
2016	3113	25296	9835	10504
2017	3284	27040	10469	10958

注：计算口径为城镇单位就业+个体私营就业人数。

从表 2.3 可以看出，除中部地区在 2016 年出现一定程度的停滞外，东中西三地非农就业人数基本上每年都能维持稳步的增长，年涨幅一般都在 5%以上。唯有东北地区在 2015-2016 年连续两年绝对减少，相较于 2014 年，累计减少 250 万人。2017 年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回复，但就业形势仍不容乐观。

表 2.4 各地区就业景气度指数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2018 年第二季度	1.46	1.33	1.11	0.73
2019 年第一季度	0.96	0.91	0.77	0.53
2019 年第二季度	1.18	1.14	0.92	0.66

注：数据源自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19 年第二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下同。

从表 2.4 可以看出，2019 年第二季度，东北地区就业景气度只有 0.66，虽比上一季度有所回升，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仍要低出 0.07 个百分点。

目前，在四个地区中东部地区就业景气度最高，为 1.18，中部地区次之，为 1.14，西部地区为 0.92，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三个地区就业景气度均有较明显的下滑，说明总体上就业形势在走弱。

2、在三大城市群中，京津冀就业形势最吃紧，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相对更繁荣一些。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京津冀地区推进力度较大，也付出了一些经济增长的代价，就以天津为例，2017-2018 年连续两年 GDP 增速只有 3.6%，远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2019 年上半年虽有所回复，但也还在 4.6%的地位徘徊，经济的萎靡对就业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相对而言，长三角的经济发展要更稳健一些，近年来江浙沪的经济增长都在中高位水平，就以浙江为例，2017-2018 年经济增速都在 7%以上，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9 年上半年这一态势仍得以延续，浙江经济增速仍高达 7.1%。

近年来，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势头也非常迅猛，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历史机遇实现快速发展。就以深圳为例，2018 年 GDP 增速达到 7.8%，2019 年上半

年仍维持 7.4%的高位，GDP 总量已突破 1.2 万亿。

与上述经济背景相对应，三大城市群的就业景气指数如下表所示。

表 2.5 三大城市群的就业景气指数

	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
2018 年第二季度	0.78	1.65	1.54
2019 年第一季度	0.52	1.07	0.97
2019 年第二季度	0.65	1.37	1.13

从表 2.5 可见，2019 二季度长三角就业景气指数最高，为 1.37；珠三角次之，为 1.13；京津冀最差，只有 0.65。当然，与上年同期相比，这三个城市群的就业景气指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这也再次验证了就业形势走弱的信号。

据统计，目前长三角地区的就业增长动力主要来自杭州、温州宁波和嘉兴；珠三角地区则主要来自广州、珠海、佛山、惠州等。

3、三四线城市就业相对宽松，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则承压较重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19 年第二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的划分标准，在 55 个样本城市中，一线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新一线城市包括成都、杭州、重庆、武汉、西安、苏州、天津、南京、长沙、郑州、东莞、青岛、沈阳、宁波、昆明；二线城市包括常州、大连、佛山、福州、贵阳、哈尔滨、合肥、惠州、济南、嘉兴、南昌、南宁、南通、泉州、厦门、石家庄、太原、温州、无锡、徐州、烟台、扬州、长春、中山、珠海；包头、大庆、呼和浩特、淮安、临沂、洛阳、秦皇岛、威海、潍坊、咸阳、镇江。三线城市主要指地级市或百强县。

表 2.6 不同规模城市的就业景气度指数

	一线城市	新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2018 年第二季度	0.71	1.01	1.51	1.53
2019 年第一季度	0.51	0.75	0.97	1.00
2019 年第二季度	0.60	0.94	1.18	1.25

图 2.6 显示，2019 年二季度的就业景气指数呈一线、新一线、二线、三线城市依次递增的趋势。其中，一线城市的 CIER 指数为 0.60，就业竞争激烈；新一线城市的 CIER 指数为 0.94；二线城市的 CIER 指数回升到 1.18，三线城市 CIER 指数上升至 1.25，就业市场相对宽松。

表 2.7 不同规模城市若干岗位的招聘需求增长率

	总量	一线	新一线	二线	三线
物流/仓储	-5.5%	-23.3%	0.7%	-10.1%	43.5%
酒店/餐饮	-1.7%	-8.2%	2.1%	-1.8%	22.9%
零售/批发	-7.4%	-8.8%	-9.3%	-2.5%	15.1%
旅游/度假	-10.2%	-16.4%	-11.1%	-3.9%	11.3%
房地产/建筑/建材/工程	-7.1%	-8.9%	-4.0%	-5.2%	10.3%

表 2.7 显示，2019 年上半年，物流仓储、酒店餐饮、批发零售、旅游度假、房地产、建筑建材、工程等相关岗位的招聘需求，一线、新一线、二线城市几乎全部呈递减趋势，其中一线城市减幅最大。就以物流仓储为例，一线城市减幅达 23.3%，旅游度假相应岗位则减少 16.4%。与此相反，三线城市各类岗位招聘需求则呈大幅增加的趋势，物流仓储岗位的增幅达 43.%，酒店餐饮岗位也达 22.9%，其他岗位涨幅均在 10%以上。

三、分所有制来看，国有企业在不断地排斥劳动力，且呈加速趋势，唯有私营个体经济是吸纳就业的主阵地。但需警惕的是，近五年来民营企业的就业增长已大幅放缓，其就业海绵功能已出现明显的弱化趋势。

1、对国有企业来说，即便在 2017 年超预期繁荣的背景下，它也没有停止排斥劳动力的步伐，2018 年随着经济回落，就业排斥的速度再次加速。

就以工业企业为例，2014-2019 年上半年，不同所有制企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如表 2.8 所示，2017 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国有企业特别是上游部门国企出现了超预期反弹，增加值同比增速达到 6.5%。各项指标明显好转。

表 2.8 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增加值的增长率

年份	国有及国有控股	私营个体	集体	股份合作	股份制	外商及港澳台
2014	4.9%	10.2%	1.7%	7.2%	9.7%	6.3%
2015	1.4%	8.6%	1.2%	4.6%	7.3%	3.7%
2016	2.0%	7.5%	-1.3%	6.2%	6.9%	4.5%
2017	6.5%	5.9%	0.6%	-4.6%	6.6%	6.9%
2018	6.2%	6.2%	-1.2%	1.0%	6.6%	4.8%
2019	5.0%	8.7%			7.3%	1.4%

再以销售利润增长率为例，2017 年国企销售利润率猛增至 11.4%，仅次于 2010 年的历史峰值 13.9%。



图 2.24 国有企业销售利润增长率

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仍未停止排斥劳动力的步伐，如表 2.9 所示，2017 年国企就业人数比上年减少 1.7%。2018 年随着各项指标的再次回落，排斥劳动力速度又开始加大，达到 5.2%。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国企集中于上游产业，多为资本密集型，产值或经济指标增加难以传导到劳动需求上，另外，国企的技术进步在不断加快，

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要素特征愈发明显。

表 2.9 不同所有制企业就业量的增长率

年份	国有及国有控股	私营个体	外资及港澳台	其他所有制
2014	-0.8%	17.3%	-0.3%	-6.1%
2015	-1.6%	12.5%	-5.6%	-6.1%
2016	-0.6%	9.1%	-4.4%	-6.1%
2017	-1.7%	9.5%	-3.2%	-8.0%
2018	-5.2%	7.6%		

注：2018 年的就业数据根据工资总额与平均工资推算得出。

虽然国企总体来说是排斥劳动力的，但 2019 年上半年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它在计算机硬件、IT 服务等新兴岗位中的招聘需求居然逆势增长，且超过了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及外资企业，甚至股份制企业。

表 2.10 各类企业在 IT 及计算机领域的就业增长（2019Q2）

	IT 服务（系统/数据/维护）	计算机硬件
总量	-13.3%	-15.9%
国企	2.6%	9.7%
合资	-0.8%	-42.1%
外商独资	-7.4%	-40.8%
民营	-8.9%	-10.0%
股份制企业	-32.0%	-24.0%
上市公司	-33.3%	-21.6%

注：数据源自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19 年第二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

如表 2.10 所示，二季度 IT 服务（系统/数据/维护）、计算机硬件等岗位的招聘职位数分别同比下降 13.3%和 15.9%，但国企却逆势上涨，分别提高 2.6%和

9.7%，而其他所有制企业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其中，尤其是股份制企业和上市公司尤甚。这可能与近年来国企越来越重视科技投入特别是 IT 投入有关，中美贸易摩擦等外生因素加速了 IT 的国产化，国企首当其冲，带动了对 IT、计算机人才的需求。

2、民营企业仍承载着就业海绵功能，但就业增幅的大幅放缓需引起注意，其就业景气度指数的急跌更令人震惊。

我们知道，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就业海绵，吸纳了75%以上的就业，现在依然如此。即便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民营企业的就业量仍在稳步扩张。如表 2.9 所示，2017 年民营企业的就业总量比上年增长 9.5%，2018 年随着经济回落，增速有所减少，但也有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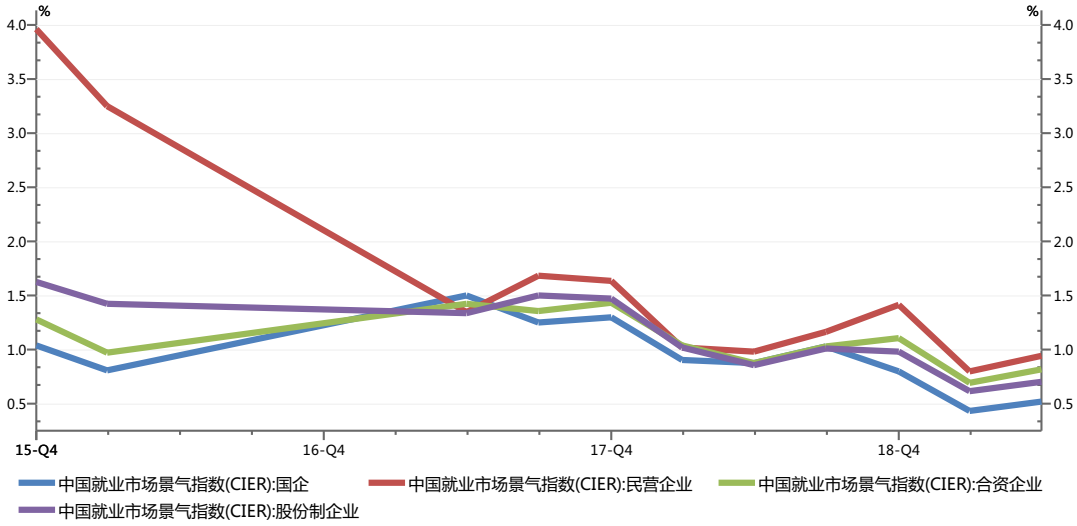
近五年来，在各类企业中，民营企业是唯一一直保持就业扩张的企业类型，其他企业则无一例外地一直排斥劳动力。从这里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对中国就业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近五年来，民营企业的就业增长速度也出现了极大的放缓。2014 年民营企业就业总量的同比增速为 14.3%，2015 年降为 12.5%，2016 年则降到 10%以下，2018 年只有 7.6%，五年间增速降了近一半。

上述判断，也能得到就业景气指数的验证。从图 2.25 可以看出：

首先，不管经济形势好坏，民营企业的就业景气度指数一直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则相反，一直低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即便在 2017 年国企较繁荣的情况下，就业景气指数也是低于民营企业的，当年前者为 1.3，后者为 1.63。

其次，自 2015 年以来，民营企业的就业景气度指数出现了大幅下跌，这是其他所有制企业所没有的。急跌发生在 2017 年上半年，它从 2015 年底的 3.96 跌至 2017 年 6 月的 1.34，直至 2019 年 6 月的 0.94，跌幅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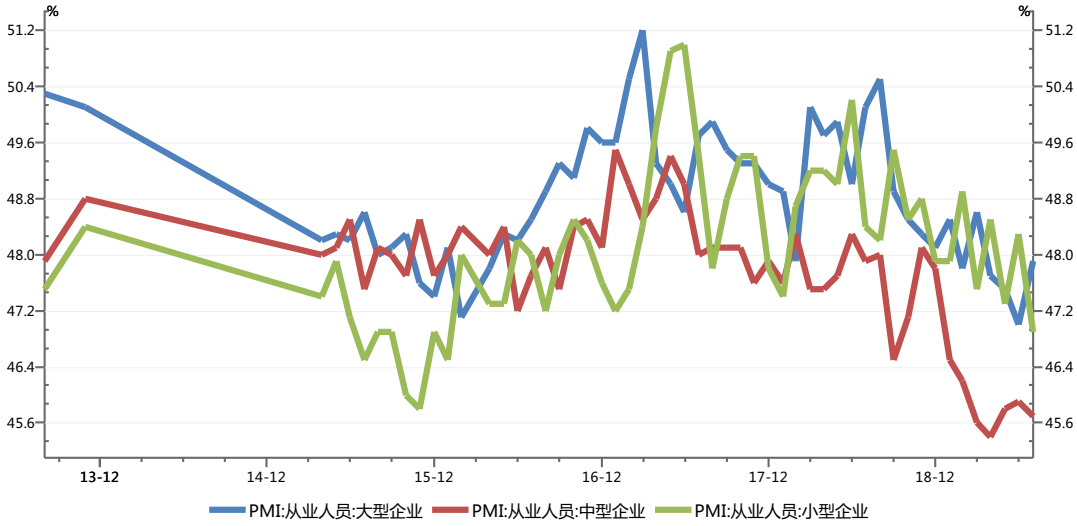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Wind

图 2.25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就业景气指数

四、分规模来看，自 2017 年以来，中小微企业的就业 PMI 指数和就业景气指数都在下降，2019 年以来更呈加速下降态势，微型企业就业低迷。

如图 2.26 所示，大型制造业企业就业 PMI 指数在 2018 年 8 月为 50.5，此后便开始下降，至 2019 年 6 月跌至最低值 47，但在 7 月份又有所回升，至 47.9。小型企业大约从 2018 年 6 月开始下降，当时为 50.2，此后也是呈一路下降趋势，2019 年 5 月降至 47.3，7 月份又进一步跌至 47 以下，只有 4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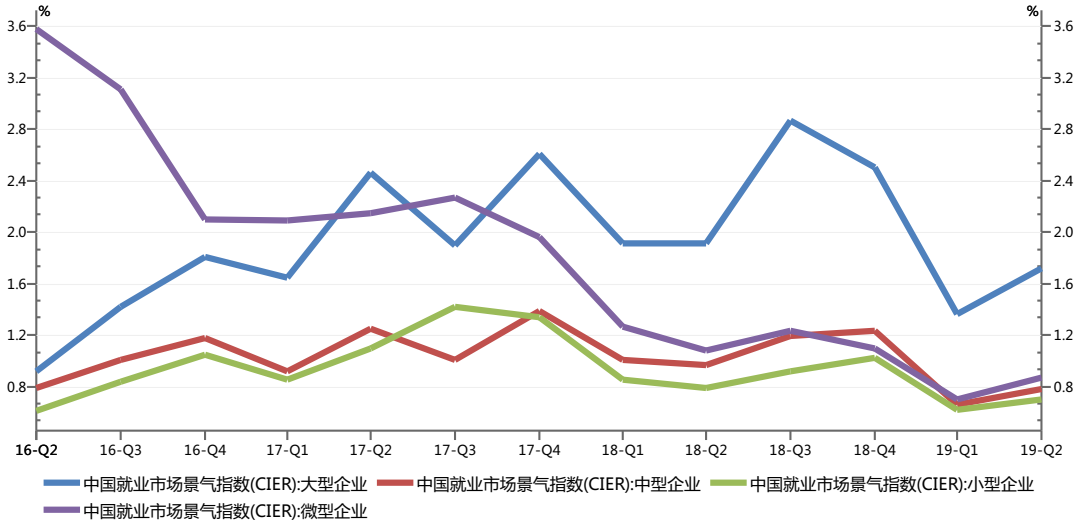
跌幅最明显的是中型企业，中型企业就业一直不是很景气，自 2013 年以来一直都在荣枯线以下，2018 年底以来更是出现了一次急跌，当时就业 PMI 指数尚有 48.1，到 2019 年 4 月份就只有 45.4，7 月份虽略有一点回升，也只有 45.7。



数据来源：Wind

图 2.26 不同规模制造业企业的就业 PMI 指数

从就业景气度指数也能看出这一趋势，从如图 2.27 我们可以看出三条规律：第一，自 2016 年以来，微型企业的就业景气度指数急剧下滑，从 2016 年 6 月的 3.6 一路急跌至 2019 年 3 月的 0.7，二季度虽有所回升，但也只有 0.87。第二，中小微企业的就业景气度指数现在都很萎靡，2019 年 3 月份，中小企业分别为 0.66 和 0.62，与微型企业类似，都是半斤八两。第三，唯有大型企业的就业景气指数还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2019 年 3 月份为 1.36，6 月份为 1.72。但与 2018 年比，也有较大回落。



数据来源：Wind

图 2.27 不同规模制造业企业的就业 PMI 指数

中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要场所，其就业 PMI 指数或就业景气度指数的低迷在很大程度上能说明当前就业形势的吃紧。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呢？如下几张图将说明，经济资源和利润向大型企业集中，大企业发展形势相对较好，但它并不是吸纳就业的主场所；相反，中小微企业虽是吸纳就业的主场所，发展却受到挤压。

如图 2.28 所示，自 2013 年以来大型制造业企业的生产 PMI 指数一直维持在荣枯线以上，峰值出现在 2016 年 11 月，达 57.1，2018 年 5 月份尚能达到 56.4，此后虽有所下降，但至 2019 年 7 月份也还能达到 53.5 的相对高位。

小型企业则比较惨淡一些，一直在荣枯线上下挣扎，且多数时候都在荣枯线之下运行。其峰值出现在 2018 年 9 月份，也只有 52.2，此后开始下降，2019 年 2 月居然急跌至 43.4，这与当时中国就业形势出现一次突然的恶化是不谋而合的。此后虽有所回升，但直至目前也还在 50 以下的相对低位运行。中型企业则大概处于居中状态。不再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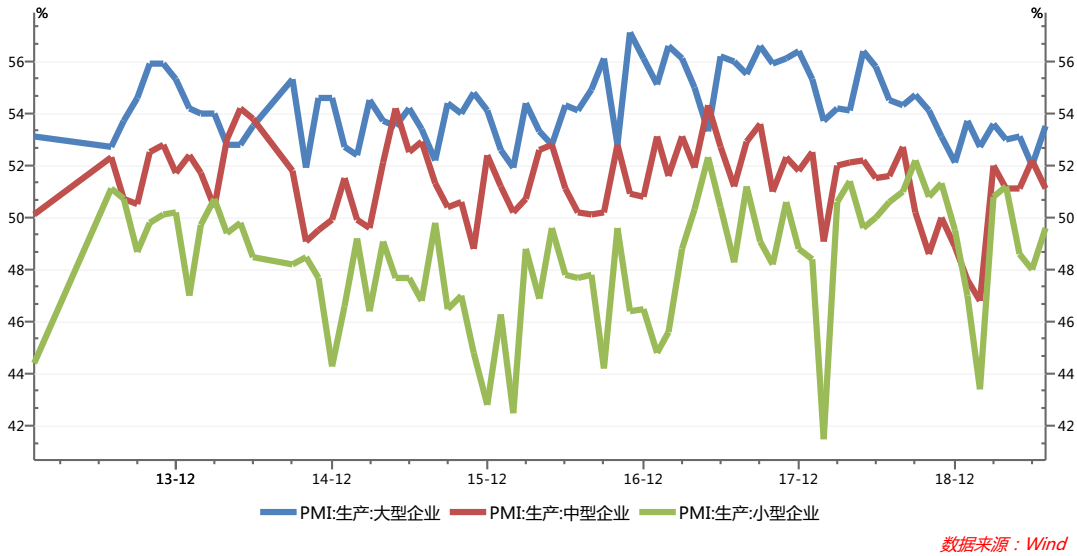


图 2.28 不同规模制造业企业的生产 PMI 指数

图 2.29 显示，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并不好，2016-2017 年，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首次出现下降，分别从 28.6 万亿元降到 26.9 万亿元、43.6

万亿元降到 41.2 万亿元，降幅分别达 6%和 5.5%。大型企业则相反，主营业务收入近年来呈大幅上升的趋势，2015-2017 年从 42.2 万亿元增加到 45.2 万亿元，增幅达 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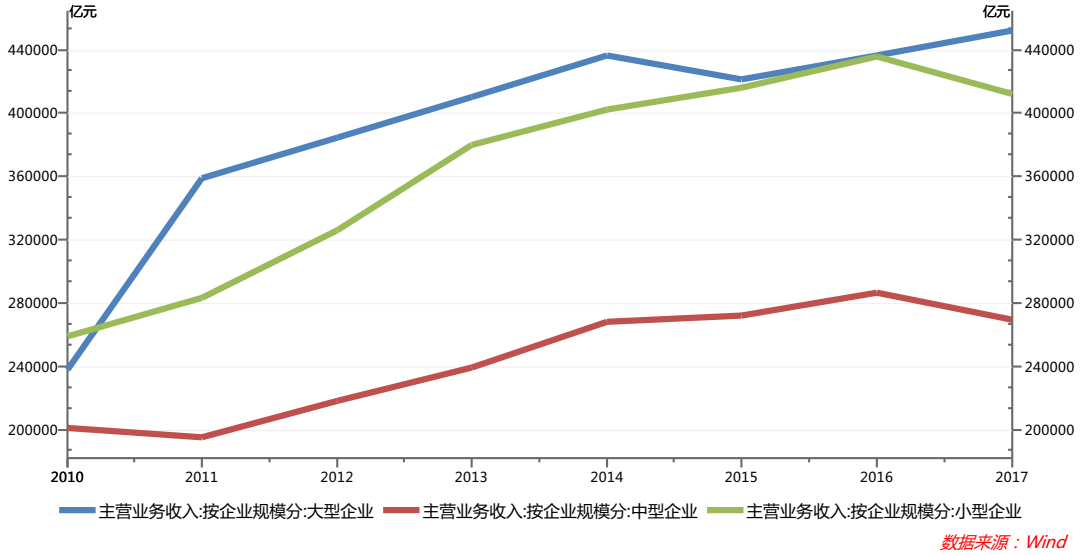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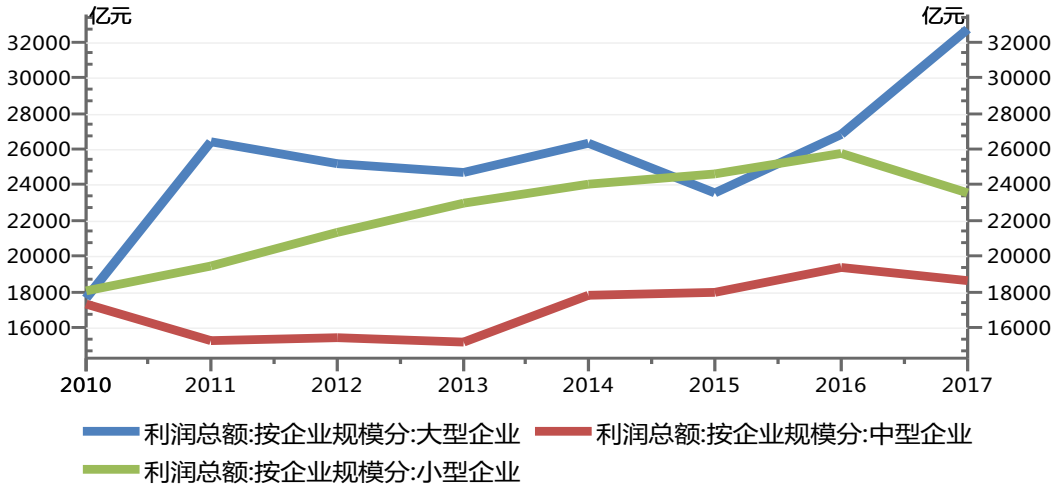


图 2.29 不同规模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图 2.30 则从利润维度显示了中小企业的经营困境，2016-2017 年，小型企业的利润总额从 2.57 万亿元降至 2.36 万亿元，降幅达 8.2%；中型企业从 1.94 万亿降至 1.86 万亿，降幅达 4.1%；大型企业则从 2.68 万亿元增加到 3.27 万亿元，增幅达 22%。

从这里可以看出，资源和利润都在向大企业集中，但它并不是就业的主场所，这种发展差异从总体上拉低了国民经济的就业吸纳能力。



数据来源：Wind

图 2.30 不同规模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亿元）

五、分就业形式看，双创企业进入死亡危险期，这会直接冲击自雇佣就业；另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灵活就业人数锐减，蓬勃发展的新就业形态能否成为促进灵活就业的新引擎，尚需观察。

1、创业企业进入五年死亡危险期，这会直接冲击自雇佣就业人数。

自雇佣就业主要源自创业，一个创业企业至少有一个老板甚至几个合伙人，如果他们专职于此，那就属于自雇佣型就业，所以，自雇佣就业数量与新创企业数量休戚相关。

2014 年在“双创”政策的感召下，我国新创企业如雨后春笋冒出来，如图 2.28 所示，当年新创企业数比上年增加 45.84%，达 365 万家，几乎每天一万家。2015-2016 年也尚能维持 20%以上的增长，但到了 2017 年则迅速降到 10%以内，2018 年也勉强维持在 10%左右，新创企业数为 670 万家。新创企业增速放缓与这几年经济形势不景气有关，另外，就是双创政策红利递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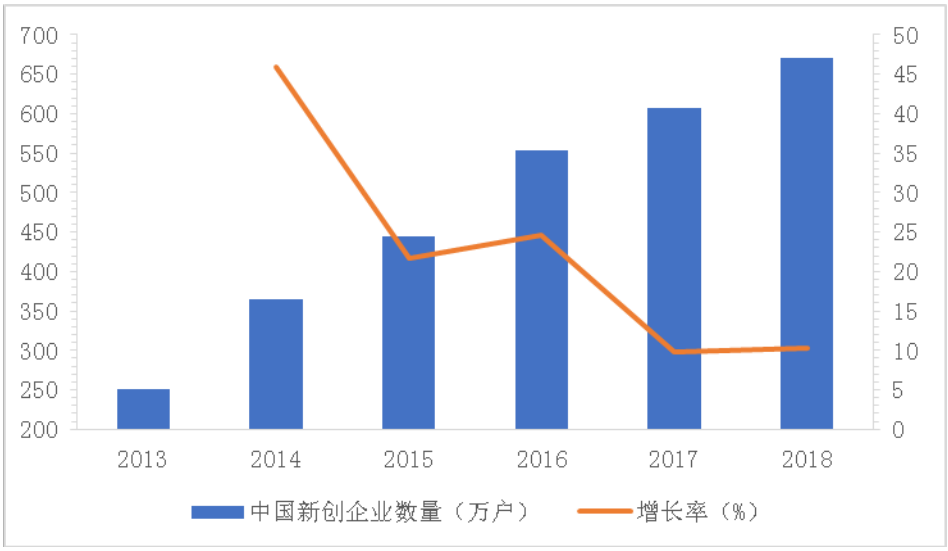


图 2.31 新创企业数量及其增长率

创业有很大的风险，死亡率超过 95%，特别是五年时间是死亡率的高峰期。很多创业者当初都是追风口，盲目上马项目，但商业模式并不清晰，短期内很难盈利，当首批资金耗尽后投资者不愿再追加投资，现金流断，就只能关门大吉。

自 2014 年李克强总理提出双创以来，五年过去了，现在很多双创企业正在迎来死亡考验，对此已有很多报道案例，不再赘述。

2、近年来传统意义上的灵活就业人数锐减，比如取缔街头商贩。

灵活就业是解决特殊群体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比如家庭妇女，再比如没有工作技能的困难群体，摆个地摊、接个零活，讨生活。

灵活就业人员主要由六类人员构成：1、农民工；2、失业或离岗人员；3、部分退休人员；4、勤工俭学的大中专学生；5、从事第二职业的兼职人员；6、临时性或阶段性就业的家庭主妇等。

由于灵活就业的概念比较模糊，且统计难度大，我国对它并无明确的界定，参考学术界的处理办法，我们用城镇就业人数与单位就业人数之差来做代替。

图 2.32 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人数自 2010 年以来出现了大幅下降，当时灵活就业人数达到 1.56 亿人，占总就业人口的 45%，此后便开始下降，2013 年出现一次断崖式下跌，从 2012 年的 1.43 亿人降为 1.19 亿人，最低值出现在 2015 年，只有 1.12 亿人，后来虽有所回复，但改变不大，至 2017 年也只有 1.15 亿人，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只有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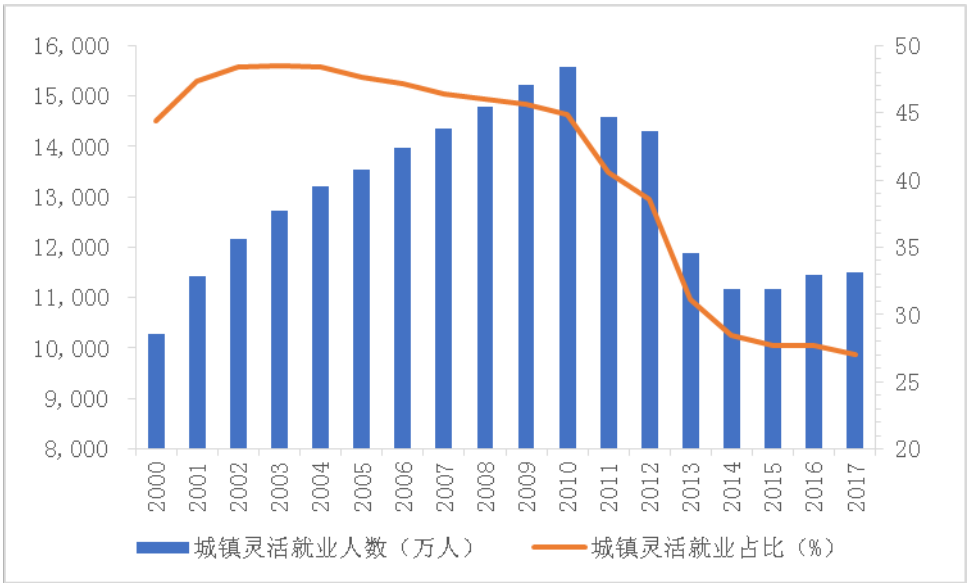


图 2.32 城镇灵活就业人数及其占比

这个判断准吗？我们可以用另一个指标来进行侧面验证，那就是城市居民中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员中灵活就业人数。

从图 2.33 可以看出，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人中灵活就业人数在 2013 年前后也出现了一次断崖式的下降，从 2013 年的峰值 462 万人降至 2014 年的 425 万人，2016 年降至 300 万人，2017 年则只有 265 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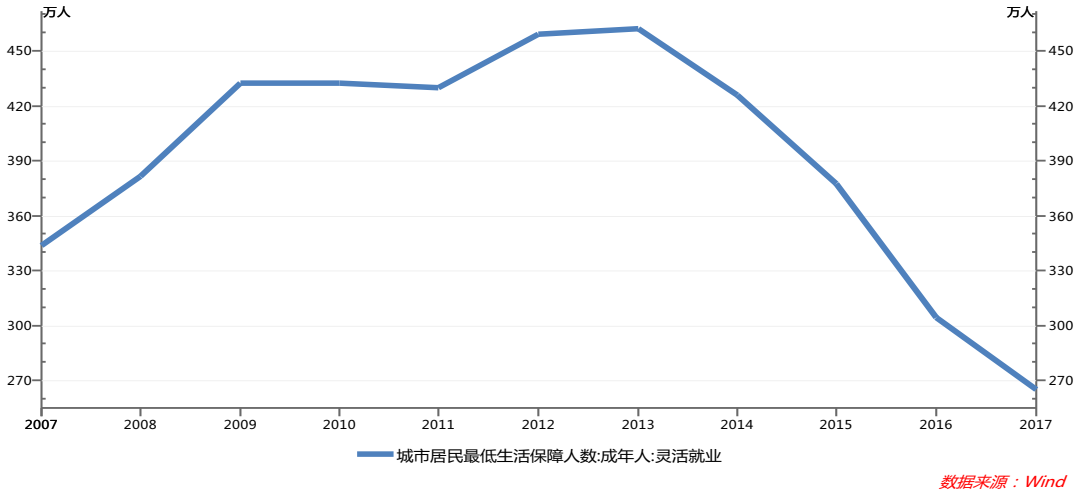


图 2.33 城市居民中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灵活就业人数

灵活就业人数的减少有两种可能：一是正规就业机会多了，过去从事灵活就业的人员到正规单位上班了，毕竟，灵活就业的工资和劳动利益难以得到保证，只要有机会，多数人还是愿意从事正规工作的。二是灵活就业的机会少了，灵活就业的空间被挤占了，比如严格的城市管理取缔街头商贩，摆摊设点的机会没了。

那么，到底属于哪一种情况呢？

从图 2.33 中可以看出多有可能是属于第二种情况，因为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人一般是没有正规工作的，灵活就业大多是他们的唯一就业，所以灵活就业的减少不是源于正规工作的代替，而是灵活就业的空间减少了，比如强化城市管理取消摊贩、取消夜间经济，不让摆摊设点。

从时间节点上讲，2013 年前后恰恰也是中国城市管理开始强化的时候。2010 年广州市为确保亚运会的顺利举行，决定取消某些区域的摆摊设点；2011 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纪录片《城管来了》；2012 年四川省和安徽省合肥市开始限制流动经营；2014 年深圳市和武汉市开始限制场外经营的无照商贩、夜间烧烤、路边食品摆卖；2015 年北京市、重庆市、陕西省开始取缔无照游商、无照经营、路边烧烤、临时摊点等。

3、蓬勃发展的新就业形态能否促进新的灵活就业，仍有待观察。

当然，在讲灵活就业时可能有统计遗漏，那就是新就业形态，新就业形态已成为一股重要力量弥补传统的灵活就业。

新就业形态是指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手段，通过互联网平台为社会提供商品或服务并获取劳动报酬的新型就业创业方式。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三新经济”不断涌现，新就业形态也层出不穷。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新就业形态对于创造就业岗位、 改善就业结构、激发市场活力具有重要作用。

与传统就业形态相比，新就业形态主要是依托网络平台实现自主、自助式的就业或创业，普遍以无组织、无雇主、无单位的方式进行，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网络平台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提供了极大便利：有利于满足需求方对不同层次、不同时长、不同数量的用工需求；也有利于满足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技能水平、不同年龄、性别、身份、地域等的劳动者的就业需要。

平台企业往往只发挥中介作用，与劳动者不签订劳动合同，不构成雇佣关系。平台企业和劳动者是合作伙伴、利益共同体。劳动者可以根据自身的专业技能、时间地点等自主选择一家或是多家平台组织进行合作。

新就业形态与劳务派遣、灵活就业、非全日制就业等就业方式相融合，或将非全日制工作全日制化，或将全日制工作零工化，并衍生出许多新的职业。

新就业形态的发展潜力巨大，如果引导的好，甚至能打造成新的就业引擎。从表 2.11 可以看出，“三新经济”在非农产业特别是服务业中的占比已达到较为可观的程度，2018 年在服务业中的 GDP 占比已达 8.5%，在第二产业 GDP 的占比也接近 7%。

表 2.11 “三新经济”增加值及占比（亿元，%）

年份	增加值	GDP 占比	在第一产业占比	在第二产业占比	在第三产业占比
2016	113587	15.30	0.80	6.50	8.00
2017	129578	15.70	0.70	6.60	8.40
2018	145369	16.10	0.70	6.90	8.50

注：数据源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据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为共享经济提供服务的人数为 7500 万人，占全国就业人数 77586 万人的 9.7%，比上年增加约 500 万人，同比增长 7.1%。平台员工数为 598 万人，同比增长 7.5%。阿里、美团、滴滴、58 同城、中华英才等互联网平台快速兴起，提供了大量新就业形态就业创业机会。

根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9》的数据，2016-2018 年，共享经济分别提供了 6000 万、7000 万、7500 万就业岗位。

生活服务类平台创造了包括外卖骑手、商户推广运营师、美业大学培训师、点评达人、试吃官等大量的新就业岗位。

就以美团外卖为例，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生活服务平台就业生态体系与美团点评就业机会测算报告》， 2018 年美团外卖有单骑手数量达到 270 多万，比 2017 年增加近 50 万，增加了 22.7%。35%的美团骑手有其他收入来源，比如工厂工人、企事业单位、自己做小生意或创业、厨师 /服务员、其他

外卖平台配送、快递员、保安、建筑工人等工作。骑手工作时间的灵活性为兼做两份工作增加收入提供了可能。根据骑手每天工作时长分布，每天工作 4 个小时以下骑手占 52%，工作 4-8 个小时的占比 39%，由于时间的灵活性，吸引了大量就业，调查显示，上班时间灵活、收入有保障、时间自由是选择做美团骑手最重要的原因。

再以网约车为例，《2017 年滴滴出行就业研究报告》指出，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共有 2108 万人在滴滴平台获得收入，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共有 3066 万人在滴滴平台获得收入，增速明显。

网络主播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新就业形式，用户规模数呈快速增长态势，如表 2.12 所示，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在 2017 年有一个较快增长的过程，从之前的 3.4 亿人增加到 4.2 亿人，增幅达 23.5%，直播用户占全体网民数近一半，2018 年直播用户数量有所下降，但仍接近 4 亿人。用户规模的增加刺激了网络主播职业的发展。中国互联网数据中心的数据显示，2018 年网络主播的数量已超过 2000 万。根据陌陌发布的《2018 主播职业报告》，网络主播以兼职的业余主播为主，全职的专业主播仅占 19%。

表 2.12 网络直播用户规模（万人）

指标名称	用户规模:网络直播服务
2016-06	32476
2016-12	34408
2017-06	34259
2017-12	42209
2018-06	42503
2018-12	39676

注：数据源自陌陌《2018 主播职业报告》。

最后看快递员，根据《2018 快递员群体洞察报告》的数据，2016-2018 年，中国快递员数量增加了 50%，目前已突破 300 万人。快递员平均月薪达 6200 元，主要是通过超过 8 小时的辛勤劳动来提高收入。

近年来，快递员增速出现一定的放缓趋势，这主要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快递业务量的增速出现了放缓的趋势。如图 2.34 所示，在 2016 年之前增速一般都能维持在 50%以上，但 2017 年降到 28%，2018 年进一步下跌至 26.6%。这主要是由于快递业务量的基数已十分庞大所造成的，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连续四年居世界第一，2018 年超过 500 亿件，比美国三倍还多，超过美国、日本和欧盟的综述，在这种情形下再维持高速增长不太现实。二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可能会替代人工快递员，比如京东宣布将在未来十年内用人工智能取代近半快递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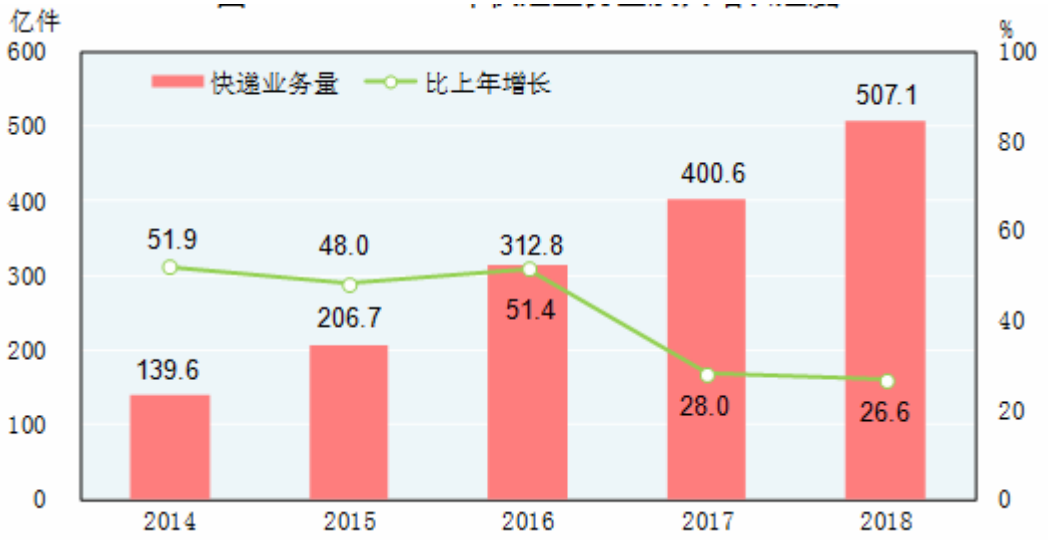


图 2.34 快递业务量及增速

可见：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的不断演进，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技术发展可能又会遏制数量的扩张。新就业形态究竟会怎样演进，能否成为促进新的灵活就业的引擎，还需时间检验。

六、分群体看，农民工就业需要高度警惕，但尚未出现大的问题；大学生就业压力较往年更大，但已接近洪峰尾声。

目前中国就业最引人注目的四个群体是农民工、大学生、城镇就业困难人员、退伍军人，其中退伍军人比较特殊，数据难以获取，我们主要关注前三个。

1、近来农民工就业人数的增长近乎停滞，实属正常。

2010 年农民工就业人数为 2.42 亿人，比上年增长 5.4%，此后增速逐年下降，2011 年为 4.4%，2013 年降至 4%以下，只有 3.9%，2014 年降至 2%以下，只有

1.9%，2018 年则降至 1%以下，只有 0.6%，农民工就业人数为 2.88 亿，比上年仅增加 184 万，与之前动辄四五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增量相比，几乎陷入停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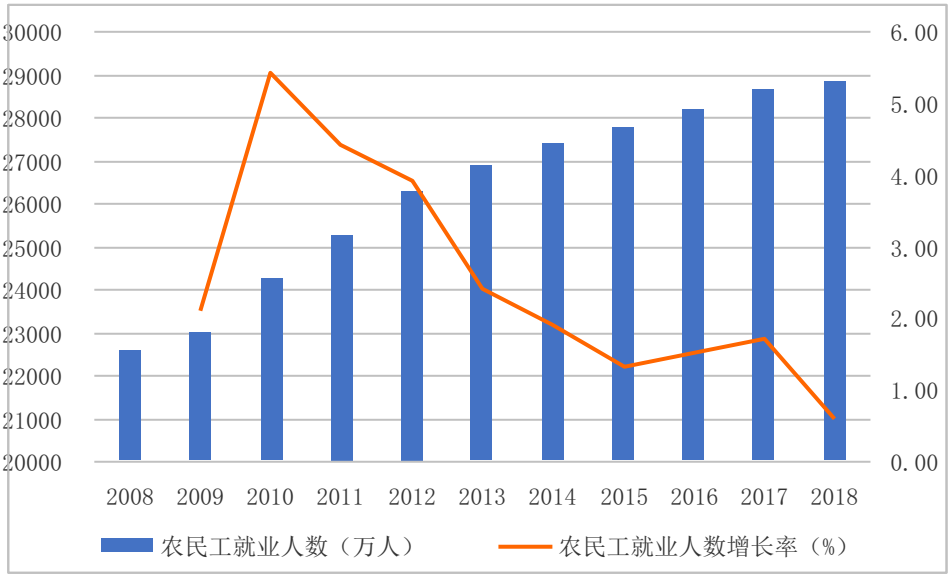


图 2.35 农民工就业人数及其增长率

那么，农民工就业数量为什么会陷入停滞呢？有两种可能性：一是非农产业发展遇到困难，造成劳动力需求停滞。二是劳动力供给停滞。这两种情形的工资结果是截然相反的：前者会造成工资下降；后者会造成工资上涨。实际情况是，2018 年以来农民工工资仍维持强劲的上涨趋势，用工荒现象也一直在蔓延。

如图 2.36 所示，这些年来农民工工资一直维持较快的增长态势，增速最快的出现在 2011 年，当年农民工名义工资同比上涨达 21.2%，此后增速开始回落，一个重要原因是工资基数在不断上移。2014 年农民工工资增速回落至 10%之内，开始进入平稳增长的区间。2015 年以来基本维持在 6%-7%年增幅之间，2018 年为 6.8%，比 2016 年和 2017 年还要略高。可见，农民工就业数量的增速放缓并不是由于需求端的原因造成的，应该是供给端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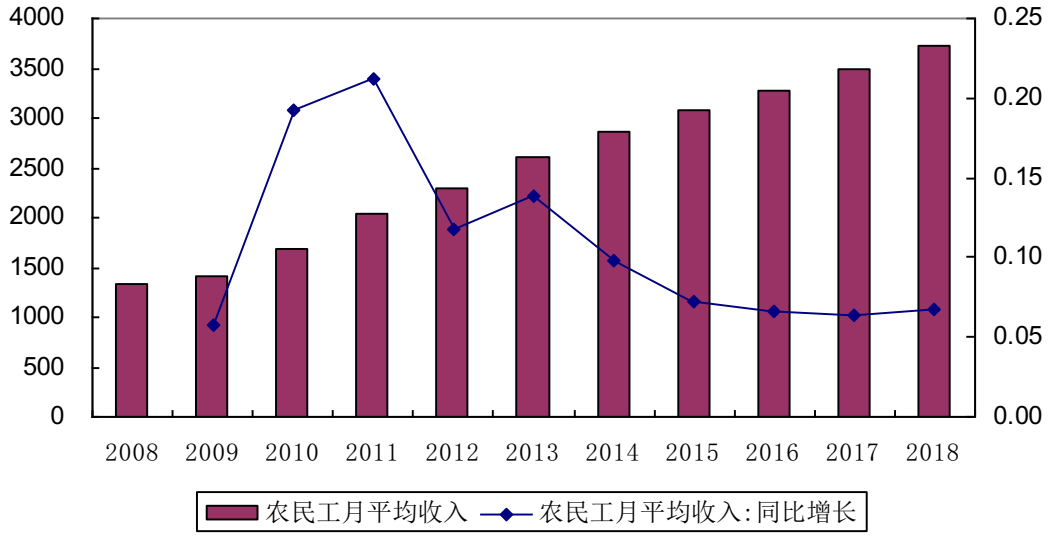


图 2.36 农民工工资及其增长率

供给端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减少。虽然截止 2018 年底，我国农业部门尚有约 2 亿劳动力，但可转移部分并不多，比如年龄大而不能工业部门重体力劳动力，或因家庭原因而无法转移。这是造成自 2004 年以来民工荒蔓延 15 年的重要原因。二是在 2.88 亿的存量农民工中年龄老化问题也很严重。

如表 2.13 所示，2008-2018 年，以 31-40 年龄段为界，之下年龄段的农民工占比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之上的则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具体地，16-20 岁农民工占比已从 10.7%大幅降至 2.4%；21-30 岁的占比从 35.3%降至 25.2%，二者合计减少了近 20 个百分点。相反，41-50 岁的占比从 18.6%提高到 25.5%；50 岁以上的占比从 11.4%提高到 21.3%，二者相加，上升近 20 个百分点。31-40 岁的占比则基本维持不变。这一趋势表明，农民工中精壮劳动力占比在下降，而大龄甚至老龄劳动力比例在上升，他们越来越难适应重负荷工作，进而倒逼企业采取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以减少对劳动要素的依赖度。

表 2.13 农民工年龄结构

年份	16-20 岁	21-30 岁	31-40 岁	41-50 岁	50 岁以上
2008	10.70	35.30	24.00	18.60	11.40
2009	8.50	35.80	23.60	19.90	12.20
2010	6.50	35.90	23.50	21.20	12.90

2011	6.30	32.70	22.70	24.00	14.30
2012	4.90	31.90	22.50	25.60	15.10
2013	4.70	30.80	22.90	26.40	15.20
2014	3.50	30.20	22.80	26.40	17.10
2015	3.70	29.20	22.30	26.90	17.90
2016	3.30	28.60	22.00	27.00	19.20
2017	2.60	27.30	22.50	26.30	21.30
2018	2.40	25.20	24.50	25.50	22.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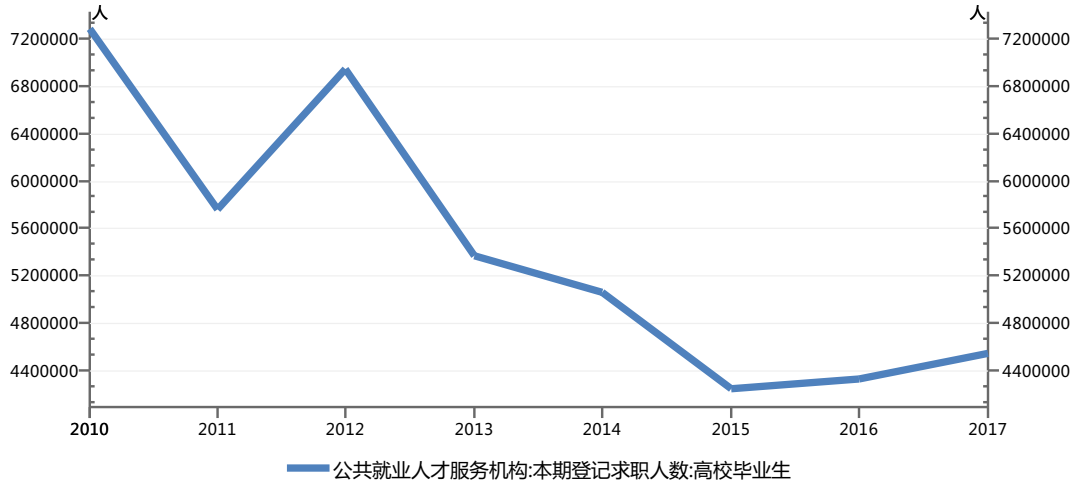
注：数据源自 wind 数据库。

2、今年大学生失业就业压力更大，但多为等待型失业，且已接近洪峰尾期。

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学生就业难是个伪命题，因为很多失业是主动的，比如嫌工资低，想找一份工资更高的工作，所以，很多大学生失业是等待型失业，而不是真的找不到工作。

从实际情况来看，大学生就业一直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如表 2.14 所示，自 2011 年以来，毕业生的半年后就业率一直都在 90%以上。2018 年虽然毕业生有 820 万之巨，就业率仍高达 91.5%。

图 2.37 显示，自 2012 年以来，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求职的高校毕业生人数一直呈下降趋势，2012 年有近 700 万人登记求职，2015 年只有 420 万人；2017 年约为 450 万人。登记求职人数的减少意味着就业形势相对宽松。



数据来源：Wind

图 2.37 登记求职高校毕业生人数

大学生就业之所以引起关注，主要是因为数量大，涉及面广。中国高等教育从 1999 年开始扩张，2002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15%，进入大众化阶段，从 2003 年开始，扩张后第一届大学生毕业，每年毕业生数量快速递增，2008 年突破 500 万，达 512 万，比上年增长 14.3%；2011 年突破 600 万，达 608 万，比上年增加 5.7%；2013 年接近 700 万，比上年增加 11.8%；2017 年接近 800 万，比上年增加 3.9%。大学毕业生数量的不断攀升，带来的就业压力也越来越大。

但随着高等教育的连续多年扩张，毕业生就业压力现正接近尾声。2018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45.7%，已接近普及化阶段，高校毕业生人数虽然还在增加，但增速明显放缓，2018 年毕业生为 820 万，比上年增加 3.1%，2019 为 834 万，比上年只增加 1.7%，几乎不再增长。

表 2.14 大学毕业生数量及就业率

年份	大学毕业生	半年后的就业率
2007	448	88.00%
2008	512	86.00%
2009	531	86.60%
2010	575	89.60%
2011	608	90.20%
2012	625	90.90%
2013	699	91.40%
2014	727	92.10%
2015	749	91.70%
2016	765	91.60%
2017	795	91.90%
2018	820	91.50%
2019	834	——

注：数据源自 wind 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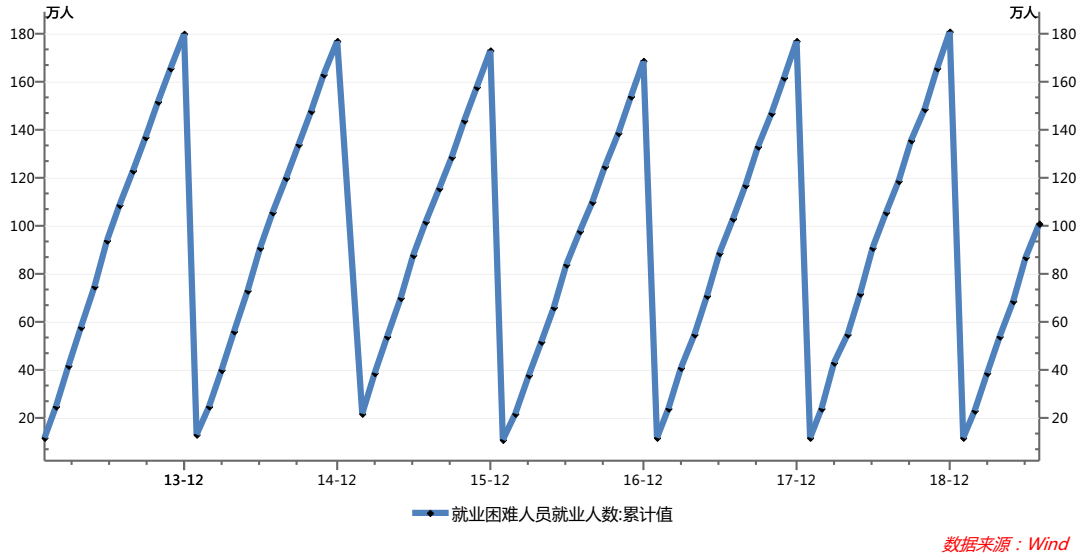
3、困难人员的就业数量在 2019 年初同比下降，这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就业形势的不景气，但下降数量有限，不必过度解读。

困难就业人员通常包括：4050 人员、伤残人士、享受城镇低保家庭的人员、失业超过一年的、失地农民、零就业家庭的人员，他们年龄普遍偏大，缺乏技能，是就业政策的关照重点，也是社会托底的重点。

困难人员就业数量能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就业形势的好坏，如果就业形势差，他们通常更难找到工作。

如图 2.38 所示，这些年来困难就业人员的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年累计数量大约在 180 万左右徘徊，2017 年是 177 万，2018 年是 181 万。自 2017 年以来，每年困难人员就业数量都是同比增加的，但 2019 年以来却出现同比减少的现象，这需要引起注意。2019 年 2 月，困难人员就业数量比上年同期减少 4.17%，3 月降幅进一步扩大到 9.3%，此后降幅又所有收窄，6 月同比降幅为 4.4%。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就业形势还是比较吃紧的，从时间上看，降幅最大的 3 月，与城镇调查失业率上升最快的时间也是基本吻合的。



数据来源：Wind

图 2.38 困难人员的就业数量

当然，我们也不要过度解读这一数据：首先，在历史上，困难人员就业数量的同比下降，也曾屡次出现过，2014-2016 年连续三年，困难人员就业数量都比

上年同期下降的，幅度也都在 4%左右，2015 年 2 月降幅甚至曾一度达到 12%，但当时就业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其次，绝对量并不大，即便 2019 年 3 月降幅达 9.3%，也只比上年同期减少 4 万人，并不能说明多大的问题。

七、失业人口的分布情况是：（1）20-29 岁青年人失业问题最严重，特别是 20-24 岁群体。（2）初中学历者失业占比最大，超 1/3。（3）制造业以及服务业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失业最严重，失业占比近半。（4）分职业看，商业服务人员的失业最严重，其次是生产运输设备的操作人员，二者合计占总失业人口近 2/3。

1、20-29 岁青年人失业问题最严重，占失业总人口 1/3 强，其中，20-24 岁主要是毕业后未工作；25-29 岁主要是因为个人原因而失去工作。从根本上说，人力资本相对不足是内因。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在城镇就业统计口径内，2017 年失业人口中各个年龄段的占比大致如图 2.39 所示。第一位的是 20-24 岁年龄段，占 18.8%；第二位是 25-29 岁，占 14.8%，二者合计占 1/3 强。16-19 岁青少年的占比反而不高，只有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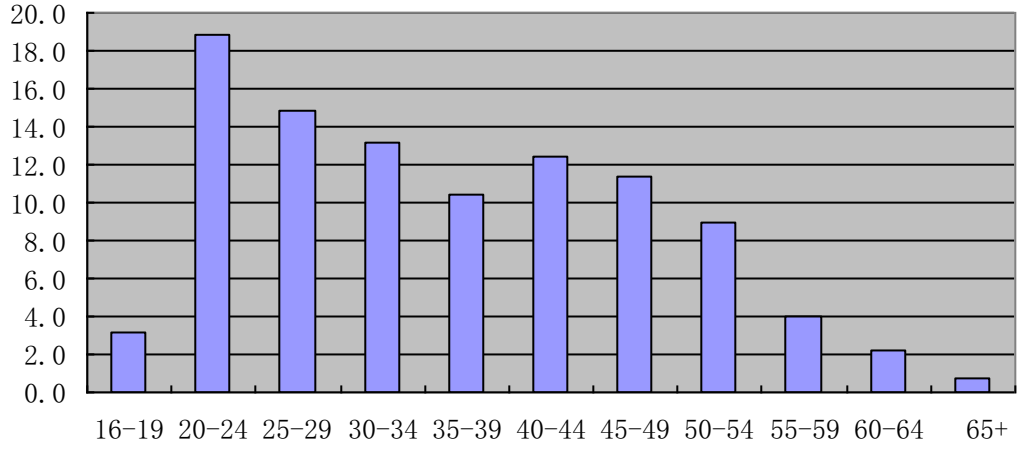


图 2.39 失业人口中各年龄段的占比（2017 年）

当然，失业占比高未必代表失业问题就更严重，举例来说，如果某个群体占总就业人口的 10%，但失业人口只占总失业人口 5%，那么相对来说，这个群体的失业程度并不算高。如图 2.40 所示，25-29 岁群体，本身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

就比较大，达 14.3%，相应地，失业人口占比大一些也算正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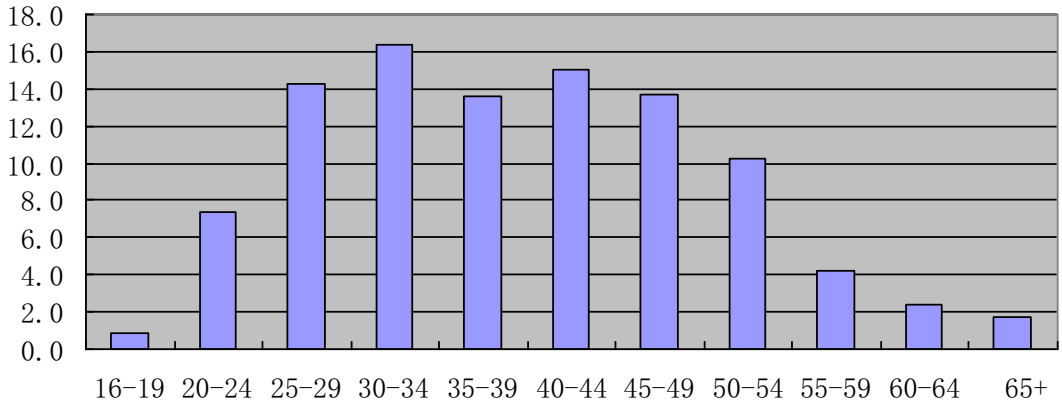


图 2.40 就业人口中各年龄段的占比（2017 年）

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构建一个反应失业强度的指标，用某群体的失业人口占比除以该群体的就业人口占比。指标大于 1，表示相对于平均水平，该群体的失业强大更大；反之亦然。如图 2.41 所示，失业强度最大的是仍是青年群体，20-24 群体为 2.54，远高于 1 这个临界值；25-29 岁为 1.03，接近平均水平，不能算失业严重。值得注意的是 16-19 岁这个群体，失业强度高达 3.56，他们虽然只占总就业人口的 0.9%，却占总失业人口的 3.2%。

总之，20-24 岁是失业最严重的群体：不仅失业强度大，失业总量也是最大的；16-19 岁的虽然失业强度大，但失业总量小；30-34 岁的虽然失业总量大，但失业强度不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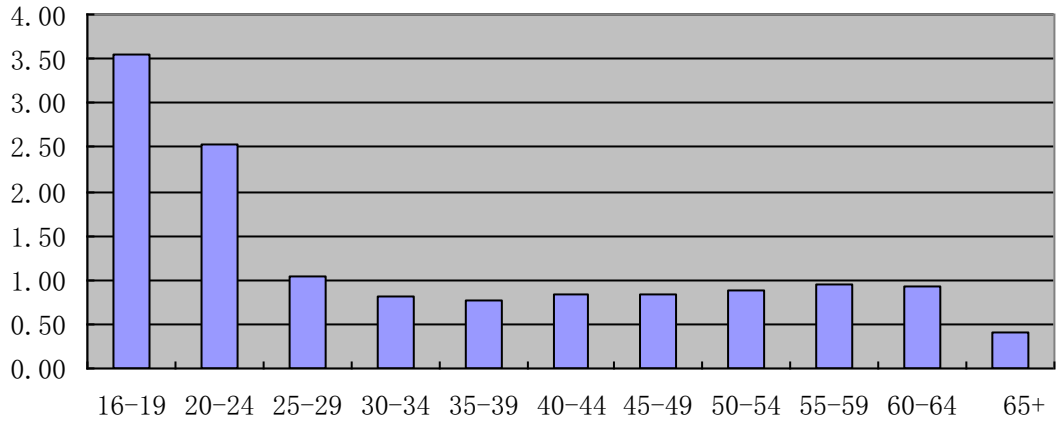


图 2.41 各年龄段劳动力的失业强度（2017 年）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青年人失业问题正在呈强化趋势。如表 2.15 所示，2010-2017 年，16-24 岁劳动力的失业强度呈递增趋势，其中 16-19 岁的从 2.16 上升到 3.56；20-24 岁的从 1.91 上升到 2.54，其他年龄段变化不大。

表 2.15 各年龄段失业强度的演变趋势

年份	16-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60-64	65+
2010	2.16	1.91	1.06	0.79	0.80	0.80	0.89	0.85	0.73	0.46	0.46
2011	1.95	1.90	0.99	0.83	0.81	0.76	0.87	0.97	0.90	0.80	0.43
2012	2.29	1.81	1.05	0.82	0.78	0.77	0.91	0.99	1.04	0.83	0.75
2013	2.25	2.03	1.07	0.80	0.83	0.74	0.80	0.94	0.96	0.92	0.81
2014	2.36	1.88	1.10	0.88	0.78	0.86	0.83	0.91	0.88	0.96	0.53
2015	3.32	2.51	1.11	0.79	0.75	0.72	0.78	0.85	0.80	0.77	0.53
2016	3.71	2.40	1.07	0.79	0.79	0.81	0.85	0.82	0.83	0.76	0.46
2017	3.56	2.54	1.03	0.80	0.76	0.83	0.83	0.87	0.95	0.92	0.41

注：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18》计算得出。

表 2.16 显示了各个年龄段失业人口的失业原因，可以看出：16-24 岁的排第一位的原因是毕业后未工作，这有两种可能：一是等待性失业，比如期望太高；二是确实找不到工作，这可能源于人力资本低。16-19 岁群体对应的是高中毕业，20-24 岁群体对应的是大中专、研究生毕业，他们最大的短板是缺乏经验，这会构成找工作的障碍。对 25-29 岁的失业群体来说，排第一位的失业原因是因个人原因而失业，排除家庭原因（因料理家务的原因单列），那么，就很可能是由于不能胜任，这又涉及到人力资本不足的问题。

所以，总体来看，青年人失业的主要内因可能是人力资本相对不足，即便是等待型失业，也是人力资本相对不足引起的，因为他想获得一份更好的工作，却求而不得，根本上还是条件达不到。

表 2.16 各年龄段的失业原因

	上学	毕业后未工作	单位原因失业	个人原因失业	征地	离退休	料理家务	其他
总计	2.0	15.6	14.6	33.1	1.1	4.0	19.4	10.2
16-19	14.1	54.5	2.1	15.6			3.2	10.6
20-24	7.5	56.7	3.0	21.7	0.1	0.0	3.5	7.5
25-29	1.0	16.6	8.2	41.3	0.6		20.2	12.2
30-34	0.0	3.6	10.2	44.9	0.7		30.5	10.1
35-39		1.2	15.1	41.6	0.9		30.9	10.4
40-44		0.7	23.9	36.6	1.2	0.1	26.6	10.9
45-49	0.0	0.3	28.0	34.3	1.4	2.3	22.8	10.9
50-54		0.1	26.7	26.7	3.0	17.7	16.2	9.7
55-59		0.1	26.4	24.8	2.7	21.3	15.2	9.5
60-64		0.3	10.0	11.3	6.3	44.3	16.1	11.8
65+		0.2	8.8	14.3	4.1	45.0	14.2	13.5

注：数据源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18》。

2、初中学历失业占比最大，超过 1/3。

在城镇就业统计口径内，2017 年失业人口中各学历的占比如图 2.42 所示。排第一位的是初中学历，占 35%；第二位是高中学历，占 19.7%，二者合计超过总失业人口的一半。专科生排第三位，占 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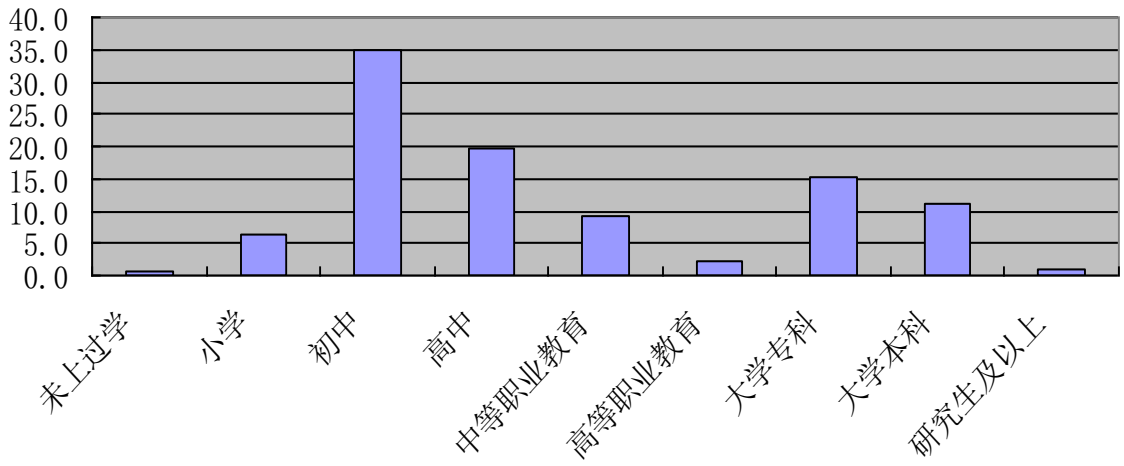


图 2.42 失业人口中各学历群体的占比（2017 年）

类似地，为构建失业强度指标，我们还要看各学历群体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如图 2.43 所示。可见，各学历段的就业占比与失业占比基本一致，失业占比大的学历群体，就业占比也大，比如初中生的就业占比是 33.8%，与其 35%的失业占比基本一样；高中生的就业占比是 16.8%，与其 19.7%的失业占比也差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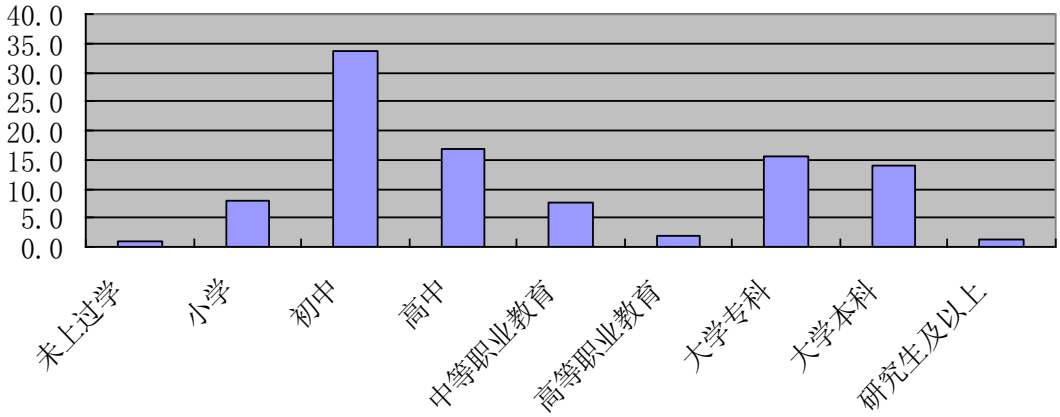


图 2.43 就业人口中各学历群体的占比（2017 年）

因为失业占比与就业占比相近，所以各学历群体的失业强度应该相差不多，都围绕在 1 附近波动，如图 2.44 所示。失业强度最大的是中等职业教育，但也只有 1.2；高中学历次之，为 1.17。失业强度最小的是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这主要源于人力资本的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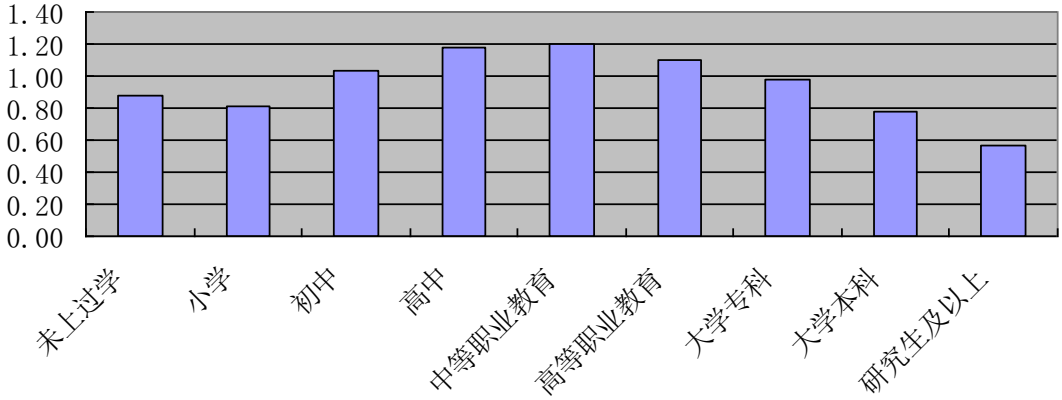


图 2.44 各学历群体的失业强度（2017 年）

各学历群体的失业原因见表 2.17，未上过学的，排第一位的原因是料理家务，对这个群体来说，由于没有文化，工资低，料理家务的机会成本小。对于从小学至专科之间的学历群体来说，排第一位的失业原因是个人原因而失业，随着产业升级的推进，企业对员工的人力资本要求越来越高，这些人力资本水平偏低的人会越来越不适应。对于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来说，排第一位的失业原因是毕业后未工作，如前所述，这些高学历群体可能对工作的期望较高，因而产生等待型失业。

表 2.17 各学历群体的失业原因

	上学	毕业后未工作	单位原因失业	个人原因失业	征地	离退休	料理家务	其他
总计	2.0	15.6	14.6	33.1	1.1	4.0	19.4	10.2
未上过学			12.3	26.3	4.4	3.7	38.4	14.9
小学		1.6	13.8	28.5	4.2	5.1	32.1	14.8
初中	0.1	4.7	16.4	35.2	1.6	4.6	25.6	11.9
高中	0.8	8.9	19.4	33.9	0.9	6.5	18.5	11.0
中等职业教育	1.1	16.7	16.2	36.6	0.6	2.9	17.3	8.6
高等职业教育	3.1	20.7	13.5	32.9		3.8	14.6	11.5
大学专科	3.4	30.3	10.7	34.9	0.0	1.9	12.1	6.8
大学本科	9.5	46.6	6.3	23.7	0.1	1.1	6.6	6.2
研究生	15.4	47.2	1.9	21.6		1.2	4.3	8.4

3、从细分行业看，制造业以及服务业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失业占比最大，二者合计占总失业人口近半。

如图 2.45 所示，2017 年在城镇就业人口的统计口径中，失业占比最大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 24.4%；制造业排第二位，占 23.4%。这两个行业合计占总失业人口的近一半，达 4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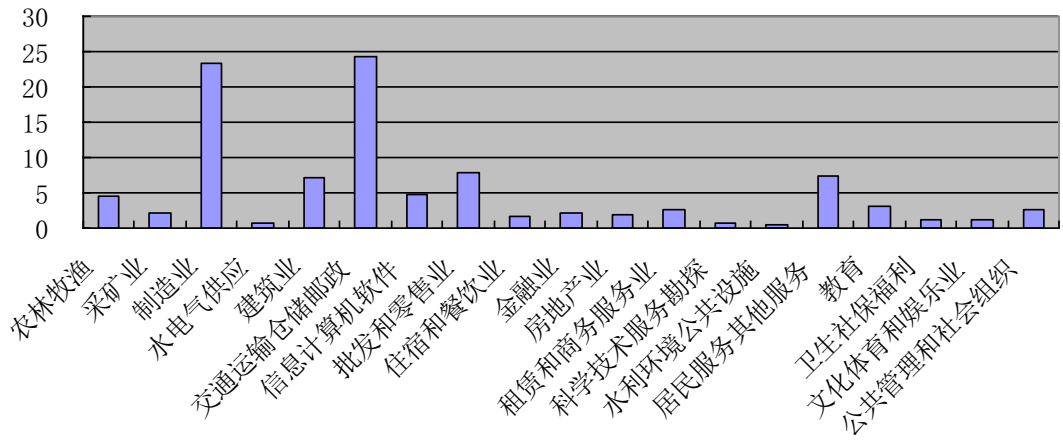


图 2.45 失业人口中各细分行业的占比（2017 年）

从就业人口的占比看，这两个行业也是最大的，制造业排第一位，占 19.3%；排第二位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 18.1%，二者合计只占总就业人口的 37.4%，但失业人口占将近一半，可见失业强度比其他行业的平均水平要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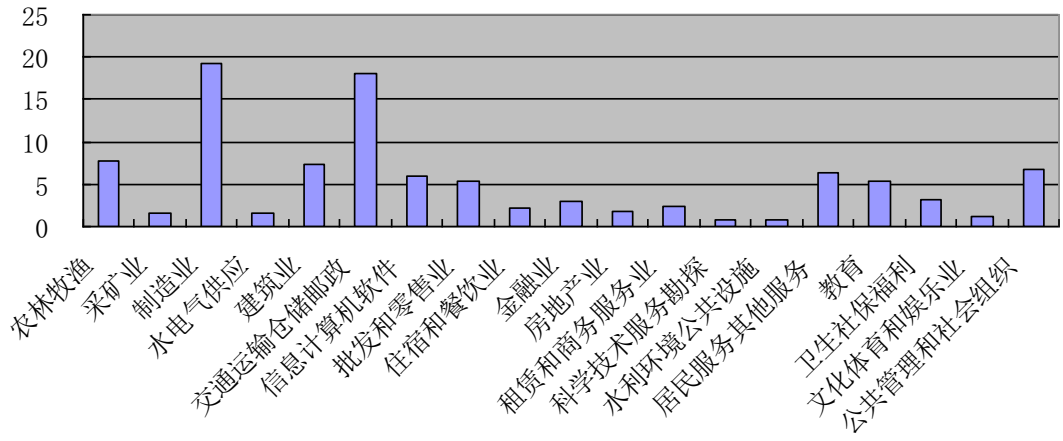


图 2.46 就业人口中各细分行业的占比（2017 年）

各细分行业的失业强度如图 2.47 所示，批发零售业的失业总量虽然不大，只占总失业人口的 7.9%，但失业强度是最大的，达 1.46；其次是采矿业，虽然只占总失业人口的 2.1%，但失业强度也达 1.40；第三位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失业强度为 1.35；制造业的失业强度为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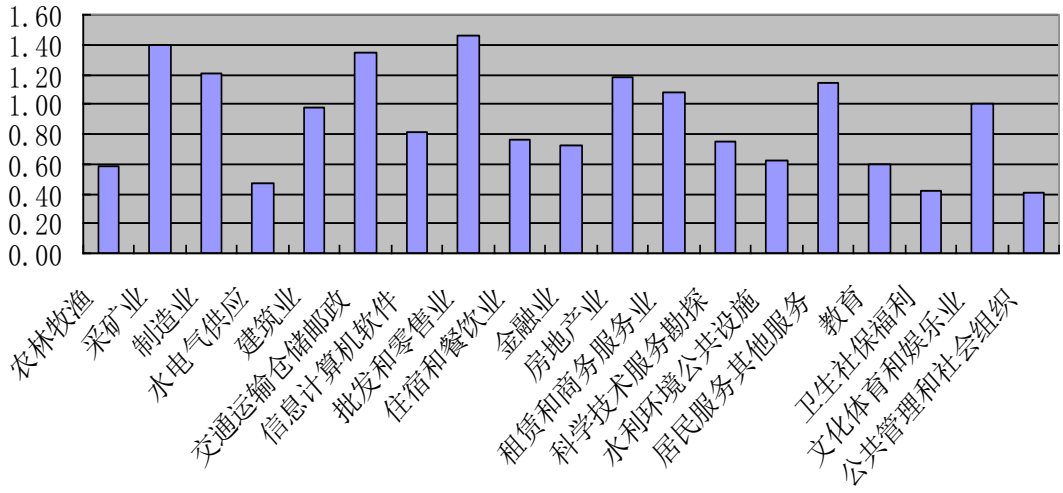


图 2.47 各细分行业的失业强度（2017 年）

总之，在国民经济各细分行业中，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是最应引起关注的，不仅失业占比大，而且失业强度高。

4、分职业看，商业服务人员的失业最严重，其次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它们合计占总失业人口近 2/3。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七个职业分类，去掉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及其他类，只剩下五大类，即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及相关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相关人员。

如图 2.48 所示，在城镇就业统计口径的五类职业中，商业服务人员的失业占比最大，占 48.3%，几近一半。可见，服务业领域的失业问题最严重。其次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相关人员，占 24.5%。二者合计，占总失业人口近 2/3，单位负责人的失业占比最小，仅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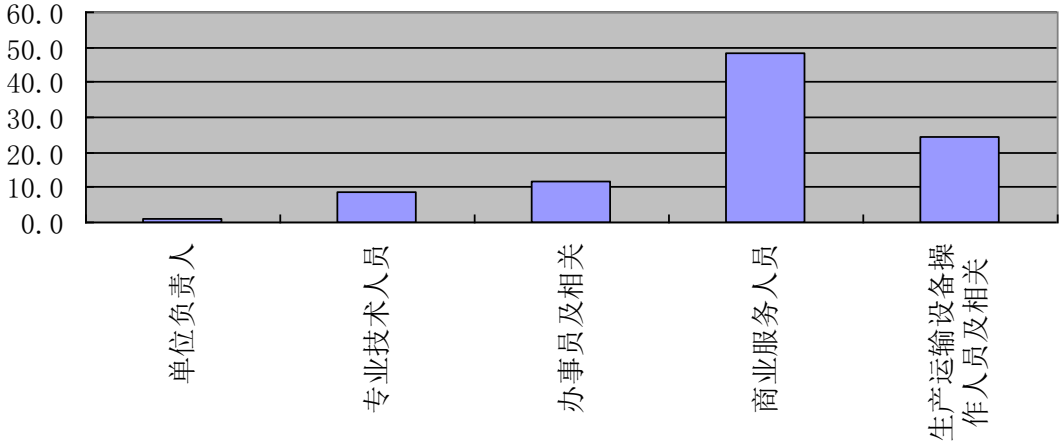


图 2.48 失业人口中各职业的占比（2017 年）

几类职业在总就业人口中的占比如图 2.49 所示，商业服务人员的就业占比最大，为 39.8%；其次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相关人员，占 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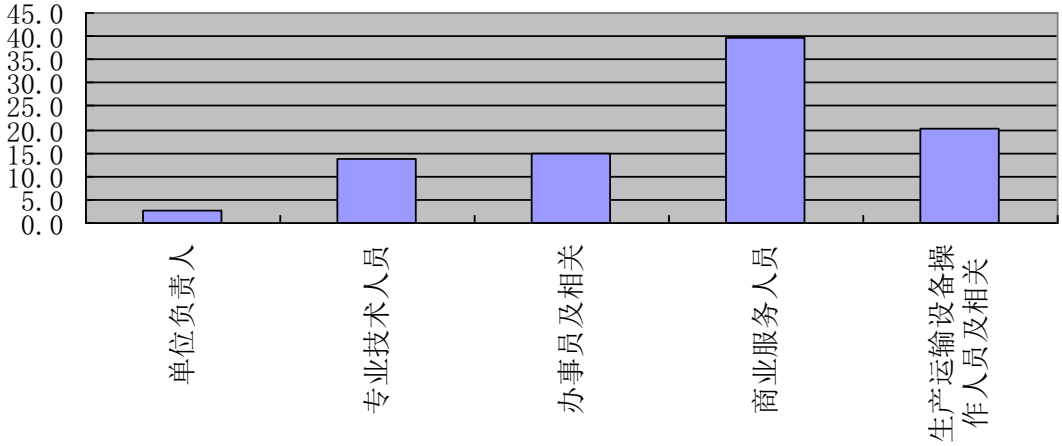


图 2.49 就业人口中各职业的占比（2017 年）

图 2.50 显示了各职业的失业强度，商业服务人员的失业强度最大，为 1.21；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相关人员与之差不多，为 1.20。单位负责人最小，为 0.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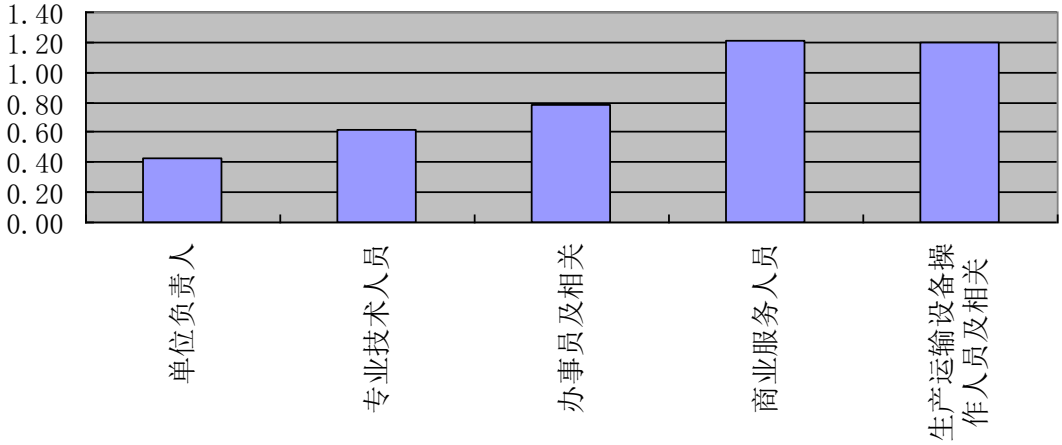


图 2.50 各职业的失业强度（2017 年）

综上所述，商业服务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相关人员的失业问题最严重，不仅失业占比高，失业强度也大。

第三节 近期中国就业的主要风险点

近期中国就业的最大风险点有五：一是中美贸易摩擦的非线性影响，可能会在某个时间、局部行业、局部地区突然拉响就业警报。二是工业企业亏损深化，并进一步引发倒闭潮，集中释放劳动力。三是工业不景气蔓延到生产性服务业，不仅造成就业流失，更会拉低就业质量。四是技术进步可能会在近期内加速排斥劳动力。五是财政压力使政府直接进行就业干预的能力受限。

一、中美贸易摩擦对就业的影响是非线性非均衡的。随着美国打击面扩大和加征幅度抬升，可能会在某一时间、局部行业、局部地区突然引爆失业风险。从目前情况看，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可能在广东佛山东莞、浙江温州宁波、江苏常州等地率先触发。

1、美国在试探中不断扩大打击面、抬升加征幅度，具有极强的策略性。

自 2018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外部不确定性因素。

美国政府屡次单边提高关税税率，不断扩大打击面，并不断地试探性地抬升加征幅度。如表 3.1 所示。

表 3.1 美国加征关税的轨迹

宣布时间	加征范围	加征幅度	开征时间
2018-6-15	340 亿，818 种商品	**25%**	2018-7-6，开始加征
2018-8-7	160 亿，279 种商品		2018-8-23，开始加征
2018-9-17	2000 亿美元产品，6031 项产品	10%	2018-9-24，开始加征
2019-5-9	对上述 2000 亿美元产品，加征税率由上次的 10%追至 25%。	**25%**	2019-5-10，开始加征
2019-8-15	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中国进口的约 3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10%关税，分两批自：2019 年 9 月 1 日对 1250 亿美元开征；12 月 15 日起对 1750 亿美元加征。	10%	
2019-8-24	美国政府宣布对约 55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税率再提高 5%：（1）对已加征 25%关税的 2500 亿美元商品自 10 月 1 日起追至 30%。（2）对拟加征 10%关税的 3000 亿美元商品追至 15%：其中，第一批 1250 亿美	5%	

	元于 9 月 1 日加征；第二批 1750 亿美元 12 月 15 日加征。		
2019-8-28	美国政府宣布，从 9 月 1 日起，把对 3000 亿美元自中国进口产品中的 1250 亿美元商品的关税税率从 10%提高至 15%。	**15%**	2010-9-1，第一批 1250 亿美元已开始加征 15%。

2018 年 6 月 15 日美国政府根据 301 调查结果，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 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25%关税，其中 340 亿美元从 7 月 6 日起实施，160 亿美元自 8 月 23 日起实施，产品主要涉及医疗器械、高铁设备、生物医药、新材料、农机装备、工业机器人、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航空设备等高科技行业。9 月 17 日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 2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10%的关税，这一批商品涉及化学品、纺织品、食品、服饰及手袋、电子产品、金属制品和汽配产品等，此部分已于 2018 年 9 月 24 日实施。2019 年 5 月 9 日，美国政府居然又针对这一批商品，将关税税率从 10%追加至 25%。

如果说第一批加征关税的商品主要涉及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话，那么从第二批开始，贸易战已向劳动密集型行业延伸。根据 HS 口径的一级行业分类，前两批贸易战涉及的重点行业如表 3.2 所示。

表 3.2 前两批贸易战涉及的重点行业及分布比例[①]

编号	商品	在 2500 亿中占比（%）	加征关税覆盖率（%）
1	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	50.2	47.6
2	杂项制品	12	48.2

[①] 资料来源：“详解美国 2500 亿加征关税清单”，搜狐财经，2018 年 7 月 12 日。

3	贱金属及其制品	9.6	66.3
4	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	6.2	94.6
5	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	4.9	60.3
6	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	4.1	65.9

进一步分类表明，在这 2500 亿美元商品中，通信、电子、机械设备、汽车、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最突出的征税领域，比如电话通信设备占比接近 10%，计算机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零附件占 6.3%，车辆及零附件占 5.7%，家具占 4.3%，坐具及零件占 4%，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数据记录机器占 3.8%，塑料及制品占 3.5%，钢铁制品占 3.5%，皮革制品等占 3.0%。

美国政府对各类产品是否征税主要考量三个因素：首先不能对美国民众生活消费产生太大影响，所以像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鞋帽伞等、已加工的羽毛及其制品等的征税覆盖率尚不足 10%。其次是除中国外拥有其他替代产品，正是基于这层考虑，像机电、音像设备及零附件类产品，虽然在 2500 亿美元清单中数值最大，但征税覆盖率并不高，只有 47.6%。最后是压制中国制造业升级，像车辆及其零附件这样的高端制造业，征税覆盖率达到 90%。

从 2019 年 9 月 1 日开始美国又对 125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5%关税，至此已基本延伸到各类产品领域。

图 3.1 显示了 2018 年中国对美出口最大的十大类产品占中国当年总出口量的比重，可以看出，最大的是机电类产品，占 8.90%；其次是家具玩具等杂项，占 2.26%；第三类是纺织原料及制品，占 1.83%；第四类贱金属及制品，占近 1%；第五类是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0.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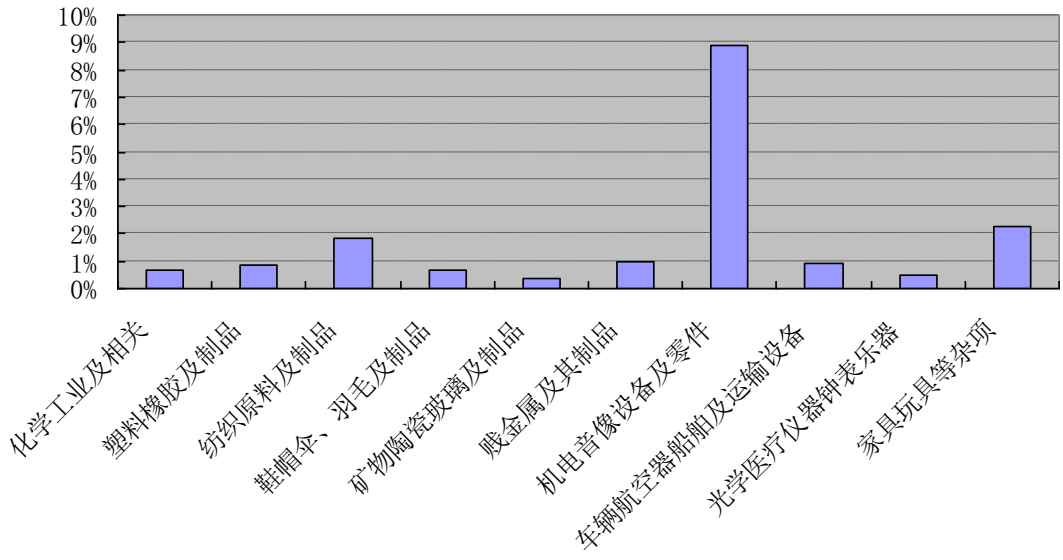


图 3.1 中国对美出口各类产品占总出口额占比（2018 年）

2、如果美国对中国所有商品加征 25%关税，会使中国就业损失 300 万左右，但如果人民币贬值 5%，则能将减幅控制在 165 万左右。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贸易战似乎还没有对就业造成很明显的影响，这可能有多种原因：一，出口企业采取了变通措施，比如通过贴牌等形式从其他国家转口。二是企业自身具有一定的关税消化能力，没有把关税压力转嫁到出口品定价上，企业通过牺牲利润的形式自己兜下来，缓冲对销量的影响。三是汇率贬值抵消了关税的影响，使到岸价涨幅不大。人民币的快速贬值主要发生在 8 月份。

目前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美国政府未来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多数学者认为，美国对中国的限制是国家战略，不管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众议院还是参议院，在这一问题上都达成了战略共识，所以短期内遏制行动不会结束，可能会延续多年，此间美国会不断尝试一些极限施压措施。美国对中国 5500 亿美元全部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几乎是确定性的事件，而且税率会层层加码。

从实际情况来看，美国确实也在不断地制造动作，最典型例子就是 2019 年 8 月 15 日刚刚宣布对中国 3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10%的关税，8 月 28 日又宣布要把加征税率从 10%提高到 15%，8 月 24 日还威胁要对全部 55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再加征 5%的税率，甚至要让美国企业撤离中国。

那么，贸易战全面升级究竟会对中国经济及就业带来多大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其他研究机构的高见。如表 3.3 所示。

表 3.3 相关机构对贸易战影响的预测[①]

		美国对中国所有商品加征关税税率			
		15%	25%	30%	45%
摩根斯坦利	中国对美国出口	-21%		-46%	-72%
	中国总出口	-4%		-8%	-13%
摩根大通	对中国 GDP		-1.3%[②]		
	就业人数（万）		-300~ -550[③]		
兴业证券	中国对美国出口	-21%		-46.5%	-72%
	中国总出口	-3.9%		-8.6%	-13.3%
	对中国 GDP			-0.64%	
	对工业增加值			-1.39%	
	对就业人数			-0.55%	
清华大学	中国对美出口		-11%		
	对中国 GDP		-0.4%		
中金公司	中国总出口			-8%	
社科院	对中国 GDP		-0.52%		
中国农大			-1.008%		

由表 3.3 可见，除清华大学外，众多机构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国全部商品加征 30%关税，中国对美出口将减少近 46%，并使中国总出口减少近 8%，最终拖累中国经济增速 0.64-1.3 个百分点。摩根斯坦利等是根据 15%、30%、45%等三档假设的加征税率做出的。结合多种因素，一般认为美国不太可能加征 45%的关税税率，加征 25%税率是最有可能的，如确实如此，那么结果将与加征 30%关税税率下的结果相接近。

关于就业影响，摩根大通预测如果美国对全部中国商品加征 25%关税，中国将损失 300-550 万就业岗位。兴业证券预测了加征 30%关税下的情形，据估算，

① 资料来源：“我们并非无比强大，但也绝非不堪一击”，搜狐科技，2018 年 7 月 16 日。
② 资料来源：“中美贸易战对就业的影响分析”，恒信贵金属，2018 年 9 月 26 日。
③ 资料来源：“中美贸易战对就业的影响分析”，恒信贵金属，2018 年 9 月 26 日。

将会造成 0.55%的就业岗位损失，这些岗位主要集中于非农就业岗位上，就以2018 年为例，当年我国非农就业人数为 5.73 亿人，0.55%的就业损失也就意味着近 315 万就业岗位流失。

但需注意，汇率会对贸易战的后果产生调节性影响。如果人民币汇率贬值，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冲掉以美元计价的到岸价上涨压力。

下面我们将测算贸易战对就业的具体影响，并分货币竞争性贬值和不竞争性贬值两种情况进行比较。

2018 年中国直接从事对美出口生产经营活动的就业人数大约为 1200 万人，这构成后续计算的基础。假如美国政府对全部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25%关税。下面我们将通过三步推导来计算其影响。

（1）从加征关税到出口品价格

即使加征关税，出口商也未必会全部转嫁到价格上。按学术界的普遍测算，关税对出口商品价格的传导率大约是 13%-30%，考虑到目前中国出口行业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利润率薄，只有将关税中相当大一部分成本转嫁到价格中才能实现正常利润，为保险起见，我们取 50%，那么出口品价格将上涨 25%*50%=12.5%。

（2）从出口品价格到出口需求

根据需求法则，当商品价格上涨时美国对进口品的需求会下降，但反应程度究竟有多大？人们对此并无定论。从理论上说，像服装、食品这样的生活必需品，需求价格弹性应该比较小；像电机、机械、汽车等附加值较高的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应该较大。实证计算结果表明，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分布较广，最低的近乎为 0，最高的接近于-2，甚至更高。同样，按最坏原理，我们取-2 作为出口需求弹性，那么中国对美出口商品数量将减少 12.5%*2=25%。

（3）从出口下降到就业减少

劳动需求是引致性需求，对美出口数量减少势必会导致就业岗位流失，假设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内不会发生明显的技术变化，要素投入结构不变，那么就业人数的降幅应该与出口商品量的减幅相当，即也减少 25%，以 1200 万人为基数，共减少 300 万人。这只是从事对美出口生产的就业人数减少幅度，是直接效应，尚未考虑它对其他产业所带来的波及效应。

以上结果与目前流行的贸易战使中国损失 300 万就业岗位的结论基本接近，但这个结果是可以控制的，那就是货币的竞争性贬值。加征关税通过出口品价格来影响出口，相应地，我们也可以通过让人民币贬值来平抑这种加价效应。

如果人民币贬值 5%，即从 2018 年 6.88 的均值水平上涨到 7.22 左右，且能一直维持下去，（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截至 2018 年 9 月 3 日已经到了 7.18），那么上述测算结果就要改写：

第一步，从加征关税到出口品价格

仍令美国对全部中国商品加征 25%关税，它对出口品价格的传导率为 0.5，则当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5%时，出口品价格的涨幅变为（1+0.25*0.5）*（1-0.05）-1=6.88%，把原来的价格涨幅消化掉一大半。

第二步，从出口品价格到出口需求

仍令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为-2，则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将减少 6.88%*2=13.67%。

第三步，从出口下降到就业减少

在要素投入结构不变的前提下，中国直接从事对美出口产品生产的人数也将减少 13.67%，以 1200 万人为基数，合计减少 165 万人。

这个结果与摩根大通的研究报告相近，他们指出，如果美国对 2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25%关税，中国将损失 300 万就业岗位，如果中国以人民币贬值 5%作为报复，就业岗位损失量将降到 70 万个。[①]我们是以美国对中国全部商品加征 25%关税为前提进行测算的，所以冲击程度与摩根大通报告基本一致。

但如果加征关税达到 30%、35%甚至更高呢？再考虑到其他连锁反应，就业损失可能就可能要重新评估了，所以风险大小要视美国的下一步行动。

美国是个崇尚拳击运动的国家，它们的拳击风格是先用次拳挑衅对方，令其恼怒不已，但一开始不会施加致命打击，当对手麻痹且习以为常时，再一记重拳把他放倒。美国著名的拳击运动员，像梅威瑟、金童霍亚、霍普金斯，都是沿袭这个风格。我们相信，在贸易战上它们也会采取这个策略。

3、谨防贸易战在某一时点、局部行业、局部地区突然引爆失业风险。目前

[①] 资料来源：“摩根大通称贸易战可能让中国付出 70 万工作岗位流失的代价”，彭博网，2018 年 9 月 13 日。

有四大行业可能已触发雷区，它们主要分布在广东等四省若干地区。

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是非线性的、非均衡的。

非线性是指一开始加征效应不明显，但随着时间推移，加征幅度越来越大，效应越来越强，从量变到质量，突然拉响失业警报。就以 2018 年 9 月 17 日美国对 2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10%关税为例，在这个税率下，很多企业可能还有足够的利润空间自己消化而不必转移到出口产品价格上，因此不会对出口和产出产生影响。但 2019 年 5 月 9 日美国将这批商品的加征幅度进一步提高到 25%，这时一部分企业就不能自己消化了，必须转嫁到价格上，对出口的冲击开始显现；如果企业不提价，就只能亏损，亏损到一定程度时只能关张，就业冲击更大。

非均衡是指美国加征关税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不同。同样加征 25%，有些行业利润率高，企业能自己消化，对出口、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就小；相反，有些行业利润率薄，就只能转嫁到价格上，对出口、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就大。

那么哪些行业值得关注呢？当美国把这些行业的关税加征到多少时，可能会触发其失业风险？进一步，这些风险会在哪些地区率先引爆呢？

（1）有九大对美出口行业值得关注

这些行业对美出口量大，就业人数多。美国加征关税是按 HS 编码进行的，为便于计算，我们按对应的口径转换为国家统计局的行业编码。

按 2018 年对美出口额，排名前十的行业从高到低分别为：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家具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纺织服装及服饰业、塑料和塑料制品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纺织业、汽车制造业，这十个行业的对美出口额合计为 3078 亿美元，占当年对美出口总额的 80%。在这十个行业中直接从事对美出口生产经营活动人数超过 50 万的为前九个，人数合计达 834 万，占对美出口就业总人数的近 70%。

这九个行业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其对应的各项指标列于表 3.4 中。

表 3.4 对美出口就业人数超过 50 万的前九个行业（2018 年）

行业名称	通用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家具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对美出口额（亿美元)	974	455	237	230	220

对美出口就业人数(万人)		231	99	85	54	101
销售利润率		6.7%	6.0%	6.1%	4.7%	5.9%
加征临界点（未贬值）	停产点(-20%)	33%	33%	33%	31%	32%
	停产点(-15%)	26%	25%	25%	23%	25%
	停产点(-10%)	19%	18%	18%	16%	18%
加征临界点（贬值 5%）	停产点(-20%)	38%	38%	38%	36%	37%
	停产点(-15%)	31%	30%	30%	28%	30%
	停产点(-10%)	**24%**	**23%**	23%	**21%**	23%
实际加征税率		**25%**	**25%**	15%	**25%**	15%
典型分布地区		江苏无锡常州、山东青岛临沂、浙江温州宁波	江苏苏州常州、山东济南、广东佛山东莞	广东广州中山佛山、山东烟台、浙江杭州	浙江金华、江苏无锡常州、广东佛山东莞	江苏南通常熟吴江、山东淄博临淄、河南郑州

行业名称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纺织业
对美出口额（亿美元)		214	212	207	191
对美出口就业人数(万人)		56	89	67	53
营业利润率		5.6%	6.3%	5.4%	4.2%
销售利润率		5.1%	6.0%	5.3%	4.6%
加征临界点（未贬值）	停产点(-20%)	31%	32%	32%	31%
	停产点(-15%)	24%	25%	24%	23%
	停产点(-10%)	17%	18%	17%	16%
加征临界点（贬值 5%）	停产点(-20%)	36%	37%	37%	36%
	停产点(-15%)	29%	30%	29%	28%
	停产点(-10%)	**22%**	23%	22%	21%
实际加征税率		**25%**	15%	15%	15%

典型分布地区	浙江宁波台州温州、广东佛山东莞	浙江温州海宁、福建石狮泉州	广东佛山东莞、浙江宁波温州、福建石狮	江苏苏州无锡南通、山东烟台、河南郑州

注：数据经整理得出。

（2）引爆失业风险的关税加征临界点大约在略低于25%的水平

对各行业来说，在何种情况下可能会引爆失业风险？基本原理是：如果关税加征到一定幅度，企业利润空间已不允许其自身消化而必须转移到产品定价上，如果企业自己承受，就会亏到停产点。一般情况下，企业亏损未必会停产，只要能收回可变成本，就不会停产。如果加征的关税幅度使企业亏损到停产点，它将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停产，就业冲击会在一瞬间集中释放；要么把加征关税转嫁到产品价格上，这时销量会减少，同样会冲击就业。

那么当关税加征到多少时会触发这个临界点呢？这与销售利润率有关。我们根据2018年工业部门各个行业的销售利润率计算了临界点，并区分三种情况，即亏损20%时停产、亏损15%时停产、亏10%时停产。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到汇率问题，当人民币贬值时，企业把对应于贬值幅度的加征关税转嫁到价格上而不会引起需求下降，只有超过贬值幅度的加征关税才会面临如下选择，即以牺牲利润为代价自己承担还是以牺牲销售量为代价让消费者承担。

测算结果如表3.4所示，可见对于上述九大行业来说，对应于5%的人民币贬值率，引爆失业风险的关税加征临界值大约就是略低于25%的水平：最高的是通用设备制造业，为24%；其次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纺织服装及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制品和制鞋业，为23%；再次是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为22%；金属制品业、纺织业，为21%。

（3）有四个出口行业可能已触发失业风险点，它们主要分布在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四省的若干地区。

对应于目前美国加征关税的幅度，有四个行业可能已触发失业风险点，它们分别是：通用设备制造业（典型产品如机床、锅炉）、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典型产品如电机、照明器具）、金属制品业（典型产品如金属门窗、集装箱）、橡胶

和塑料制品业（典型产品如塑料薄膜）。在货币贬值 5%的情况下（自 2018 年以来人民币大约贬值 5%），若以亏损 10%作为停产点，这四个行业加征关税的临界点分别是：24%、23%、21%、22%，目前这四个行业实际加征幅度为 25%，均已突破其临界值。这四个行业直接从事对美出口生产的人员数约为 440 万人，占对美出口总人数的 1/3 强，若排斥 20%的劳动力，数量应接近百万人。

从地域分布看，对美出口的通用设备制造业典型地分布在：江苏无锡、常州，山东青岛、临沂，浙江温州、宁波等地；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典型地分布在：江苏苏州、常州，山东济南，广东佛山、东莞等地；金属制品业典型地分布在：浙江金华，江苏无锡、常州，广东佛山、东莞等地；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典型地分布在：浙江宁波、台州、温州，广东佛山、东莞等地。

上述地方应提高警惕，做好出口行业的失业风险防范工作。

（4）其他行业尚有 6-8 个点的关税加征空间。

对尚未触发失业风险的五个行业，即家具制造业、纺织服装及服饰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纺织业等来说，距离最保守的停业点尚有 6-8 个点的关税加征空间，换句话说，只要接下来美国对这些行业继续加征关税的幅度不超过此，就不会出现大面积的失业问题。

二、企业经营成本压力大，困难重重，另一方面，需求端乏力，成本压力难以通过产品定价转嫁出去，利润被迅速吞噬掉。2019 年出现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工业企业亏损总额的增速远远超过亏损企业数的增速，亏损深化迹象明显，这可能会触发弱质企业的倒闭潮，并开启劳动力集中释放的窗口。

1、成本压力大是当前企业反映的最大困境，它甚至超过贸易战的影响。

2019 年暑假《中国失业率调查 2019 专项调查：中美贸易摩擦对就业的影响》课题组对广东、福建、浙江等三省制造业企业进行了集中调研，企业界普遍反映现在最大的经营困难是成本压力大，特别是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税费成本、劳动力成本等压力大，它甚至暂时超过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影响。

很多企业反映土地成本上升过快是企业面临的最大压力。我们用房地产企业土地成交价款除以土地成交面积得出土地成交均价，如图 3.2 所示，这些年来土地价格节节攀升，几乎每隔几年就上一个新台阶：2008 年越过 1000 元/平方米；

2010 年越过 2000 元/平方米；2015 年越过 3000 元/平方米；2016 年越过 4000 元/平方米，最高峰出现在 2018 年 12 月，达到 5500 元/平方米，随后虽有所回落，但截至 2019 年 7 月份，最新成交均价仍维持在近 5000 元/平方米的历史高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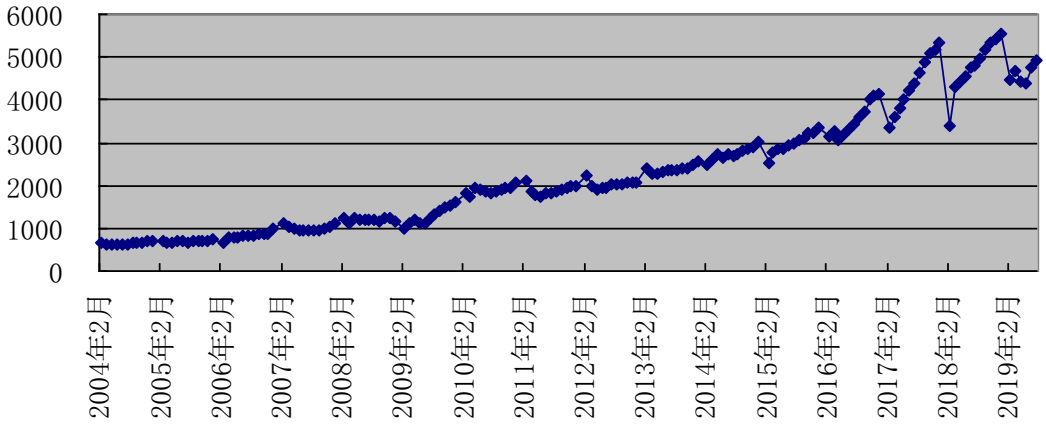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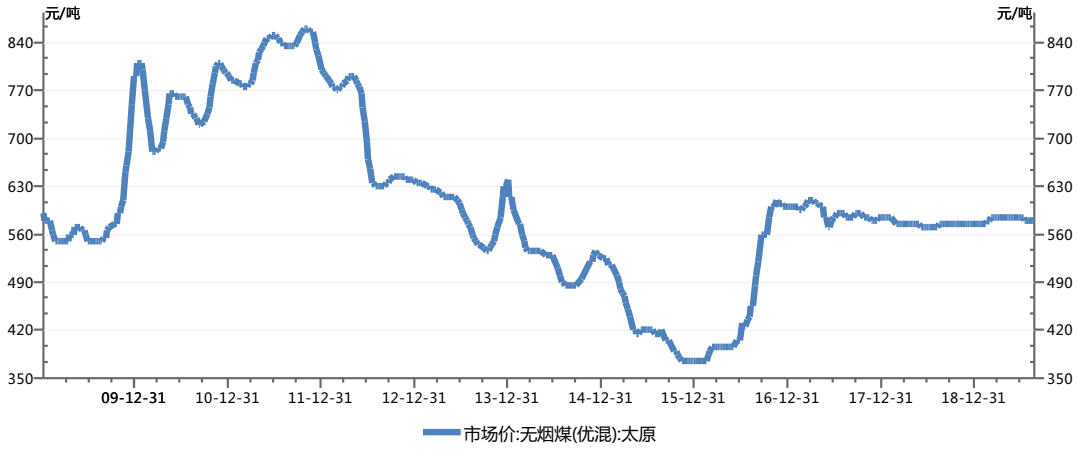


图 3.2 土地成交均价（元/平方米）

其次是原材料价格，以煤炭、钢铁、石油为例，分别见图 2.56-2.58，它们的拐点均出现在 2015 年 12 月，原材料价格的急涨令企业措手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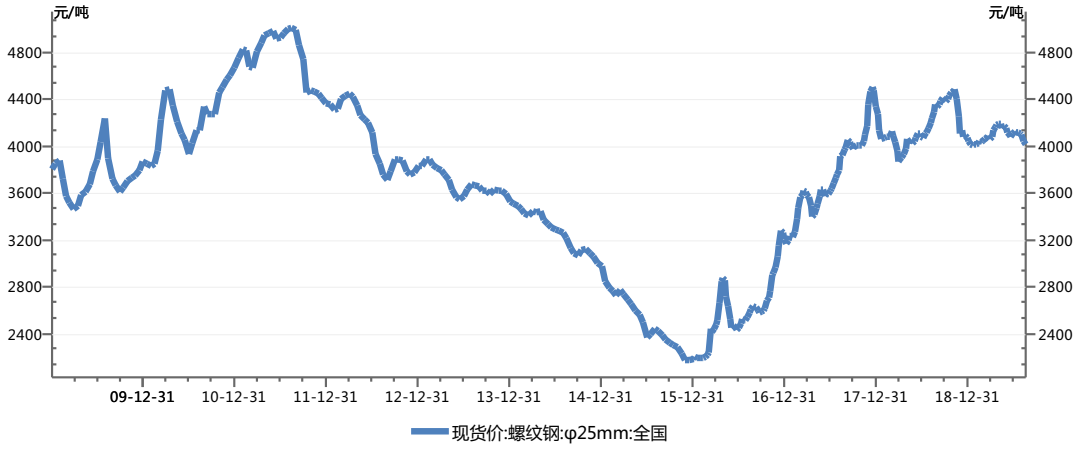
图 3.3 显示了煤炭接个的变化趋势。以太原优混无烟煤为例，低谷出现在 2015 年底，当时为 375 元/吨，此后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小煤窑的关停，煤炭产量下降带动煤价迅速上扬，至 2016 年 6 月，已突破 400 元/吨，仅仅 3 个月后，即 2016 年 9 月即突破 500 元/吨，10 月突破 600 元/吨，此后就横盘在这个价位附近一直至今。短短 10 个月内煤价涨幅超过 6 成，令下游企业措手不及。



数据来源：Wind

图 3.3 太原优混无烟煤价（元/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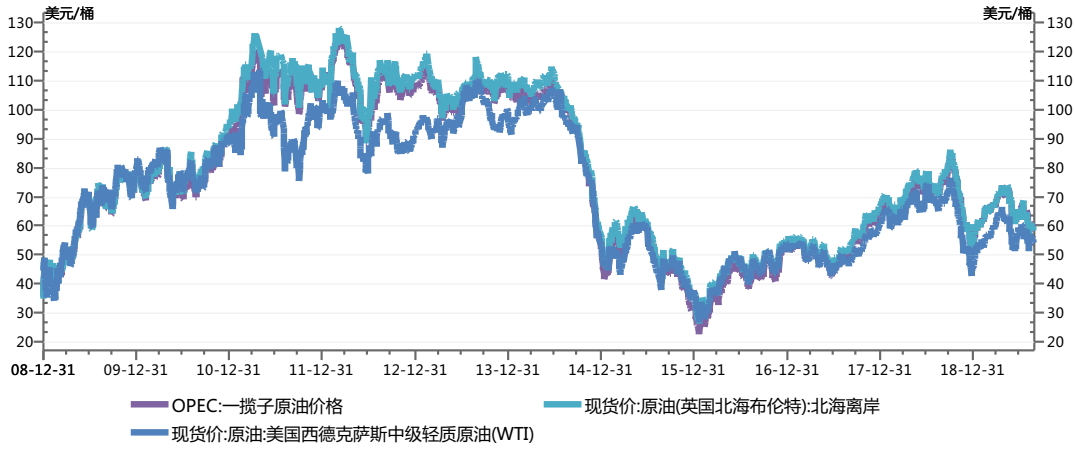
再来看钢价，以 25mm 螺纹钢为例，如图 3.4 所示，与媒体价格基本一致，拐点也是发生在 2015 年 12 月，当时尚不足 2200 元/吨，从 2016 年开始，随着关闭地条钢和小钢厂，钢铁供应骤减带动钢价上涨，至 2016 年 4 月，钢价突破 2500 元/吨，至 2016 年年底突破 3000 元/吨，2017 年 9 月突破 4000 元/吨，2018 年 11 月接近 4500 元/吨，此后虽有所波动，但仍维持在 4000 元/吨以上的高位。



数据来源：Wind

图 3.4 25mm 螺纹钢现货价（元/吨）

最后看石油价格，在石油工业时代，油价对企业经营成本的影响不言而喻。因中国是主要的石油进口国，进口依赖度超过 50%，国内外油价联动效应明显，我们看三大国际油价的波动趋势，即 OPEC、英国的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美国轻质原油价格。如图 3.5 所示，三者具有高度一致性的波动趋势，且拐点也是出现在 2015 年底，就以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为例，当时只有 26 美元/桶，此后出现 V 字型反转，2016 年 3 月越过 40 美元/桶，8 月越过 50 美元/桶，2017 年 10 月越过 60 美元/桶，12 月越过 65 美元/桶，2018 年 1 月越过 70 美元/桶，5 月越过 75 美元/桶，9 月越过 80 美元/桶，10 月越过 85 美元/桶，此后有所回落，目前维持在 60 美元/桶左右的水平。



数据来源：Wind

图 3.5 石油价格的波动趋势（美元/桶）

税收是企业的另一大成本，工业部门主要是流转税，尤其以增值税为代表。虽然 2016 年全面实行营改增改革，但对多数工业企业来讲，多为一般纳税人，营改增影响不大。这也是我们这次调研时制造业企业普遍反应没有感受到明显的减税效应的原因。我们以广东、浙江、山东、河南、四川等五个工业大省为例，计算了增值税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如图 3.6 所示。

在 2016 年营改增之后，增值税占工业 GDP 的比重大幅提升，就以广东为例，2015 年为 4.43%，2016 年猛增至 7.9%，2018 年进一步增长到 10.44%；浙江省 2015 年为 4.70%，2017 年猛增至 11.26%；四川省 2015 年为 2.94%，2018 年猛增至 9.2%。其他省份也有类似的迹象。

增值税占比提高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企业税负特别是工业企业税负的加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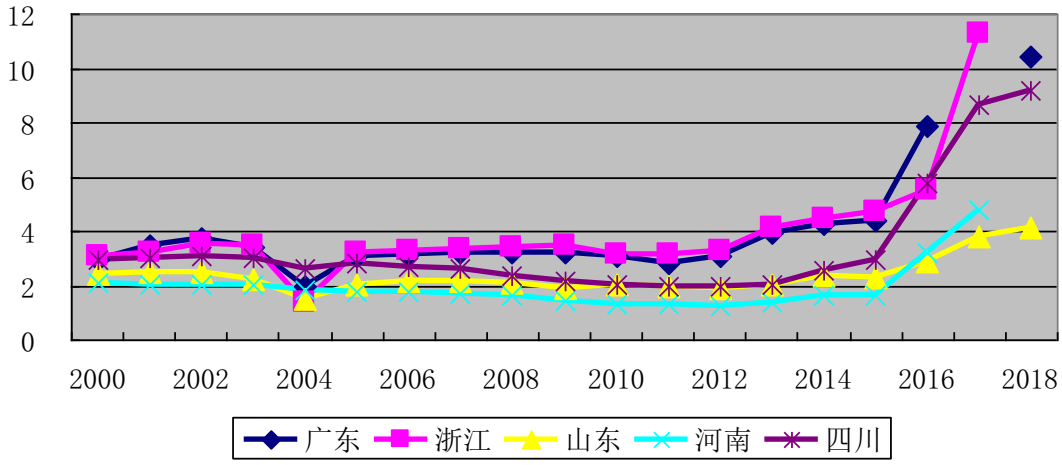


图 3.6 增值税占工业增加值比例

企业另一大成本就是劳动力成本。中国企业家智库发布的《两会百名企业家调查报告》指出，超六成（61.54%）企业家认为近一年来人工成本上升最快，而后才是税负成本（15.38%）、融资成本（13.46%）。超过七成（73.08%）企业家感到近一年来人工成本明显上涨，23.08%的企业家认为有所上涨，仅有 3.84%的企业家认为变化不大或有所下降。

关于人工成本上升的问题，后面还会述及，这里不再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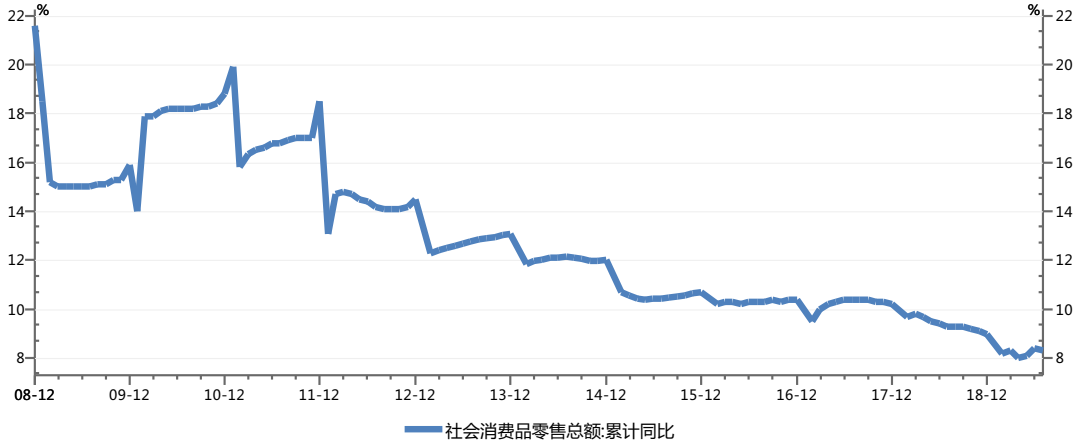
2、需求端乏力遏制了企业转嫁成本的能力，PPI 指数难改走低的趋势。

在成本不断抬升的同时，需求一直得不到有效的不振，成本压力难以转嫁到产品定价上。需求不振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收入不振；二是居民杠杆率提高，关于这个问题前已述及，不再赘述。

消费疲态从图 3.7 中一览无余，从 2009 年开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累计同比增速就在不断下降，2018 年 12 月曾达到 21%的峰值，此后开始渐次下移，2009 年 12 月降为 15.9%，此后在 4 万亿投资计划的刺激下有所有回升，但很快又进入到下降通道，从 2015 年开始降到 10%略强的水平，2018 年跌至 10%以下，2019 年则跌入 9%以下，前 7 个月累计同比增长仅 8.3%。

这里需要提一下的是 2019 年 6 月份消费反弹的假象，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9.8%，比上年同期增速 9%还高 0.8 个百分点，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一些短期的促销政策，比如 618 促销、汽车清仓式促销等的作用结果，带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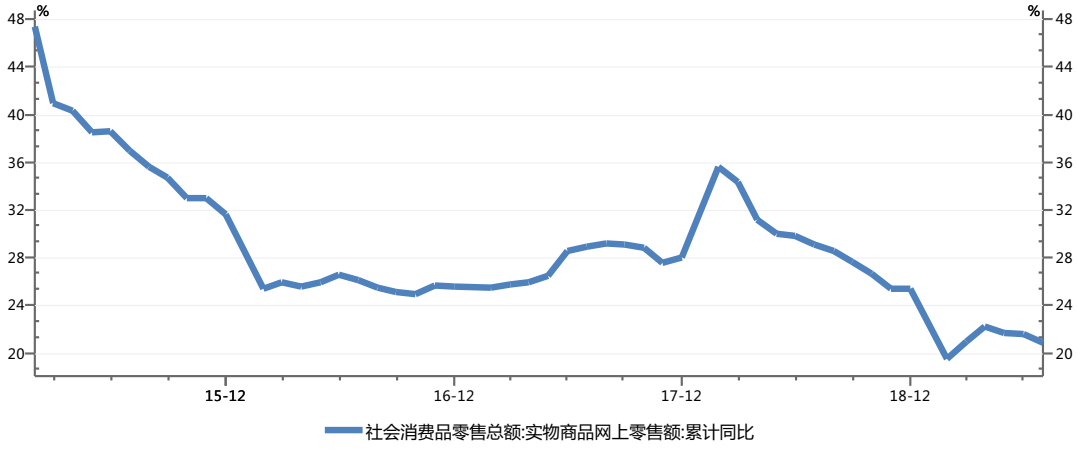
透支性质，并不意味着消费回暖。7 月份数据很快证明这一点，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 7.6%，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仅 5.7%。



数据来源：Wind

图 3.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速

近年来，网上消费被视作驱动消费的新生力量，但这股驱动力也出现下降的趋势。如图 3.8 所示，自 2018 年以来，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的累计同比增速开始明显放缓，2018 年 2 月为 35.6%，6 月份跌至 30%以下，年底跌至 25%左右，2019 年初猛跌至 20%左右，后来虽有所回升，但 7 月份也只有 20.9%，比上年同期增速低 8.2 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Wind

图 3.8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速

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更惨。如图 3.9 所示。非实物商品主要指门票、游

戏、打车、看电影、保洁等服务型需求。源于早期基数较低，一开始，非实物网上消费经历了野蛮式生长，增速令人啧舌。2017 年前基本都维持在 50%以上的高速增长，此后开始断崖式下降，到 2018 年底，仅仅时隔 1 年，就降到 20%以下，2019 年初则变为负值，后面有所回升，前 7 个月累计同比增加仅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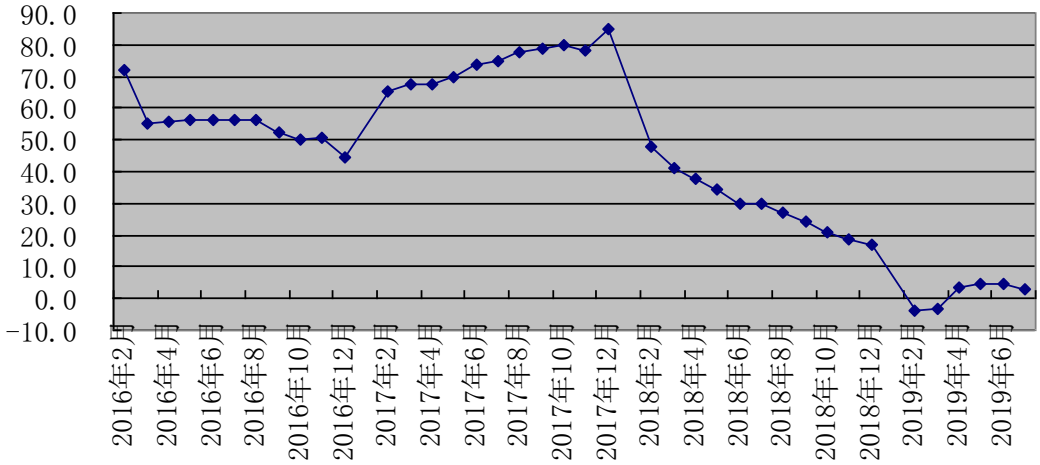


图 3.9 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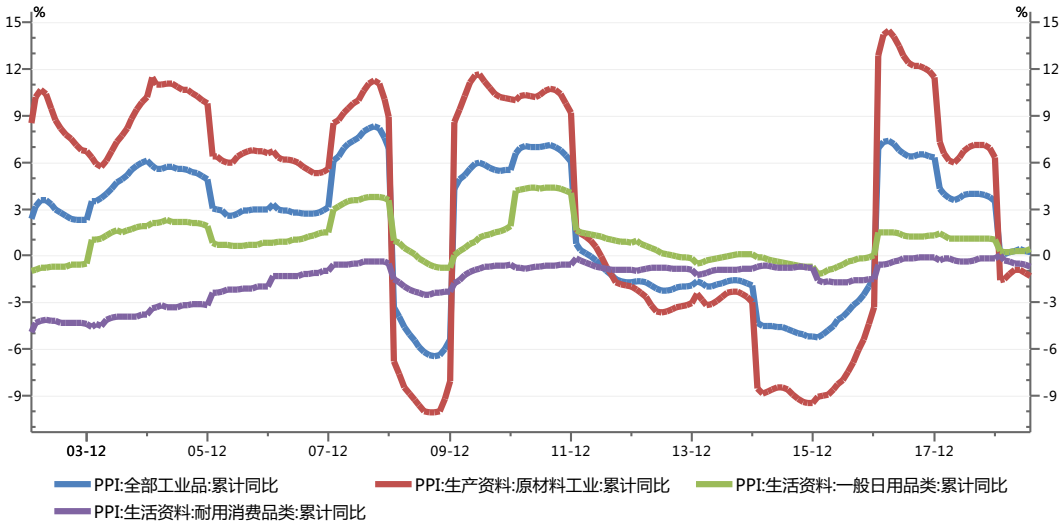
需求乏力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工业品出厂价格的萎靡。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代表供求关系的力量对比，如果需求乏力，出厂价格就没有上涨动力，甚至回落。如图 3.10 所示，PPI 的谷底出现在 2015 年底，约为-5.3%，从 2017 年 1 月开始 PPI 指数突然结束连续近 5 年为负的局面而转为正值，一举达到 6.9%，这与供给侧改革关闭高耗能高污染小企业，造成供给减少有关，而未必是源于需求增加的原因。PPI 峰值出现在 2017 年 3 月，为 7.4%。

但很快 PPI 指数又迅速走低，有三个原因：一是在利润走强的刺激下，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国企开足马力，供给迅速跟上；二是出厂价的基数效应越来越大；三是需求端乏力。2018 年 PPI 又降到 5%以下，2019 年 1 月迅疾降至 1%以下，只有 0.1%，至 7 月份为 0.2%，出厂价格几乎停滞。

需注意的是，在 PPI 指数的上述演进轨迹中，原材料工业部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起大落主要是由它掀起的，供给侧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原材料部类，而下游的加工部类并没有受益多少，反而受原材料成本上升挤压。图 3.10 显示，在消费资料部类中，一般日用消费品部门的 PPI 指数波动较小，特别是 2012 年以来基本在 0 上下波动，即便在 2017 年初的巅峰时期，峰值水平也只有 1.5%。

耐用消费品部门就更是如此，这些年就一直为负数，从来没有大于 0 的。



数据来源：Wi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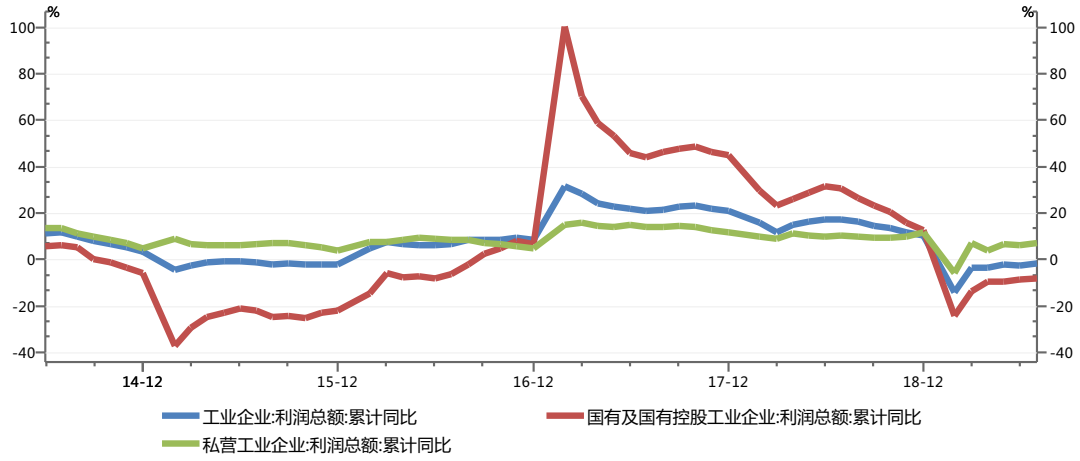
图 3.10 各工业部类的 PPI 指数

3、在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夹击下，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亏损深化现象明显，如果持续下去，可能会诱发弱质企业的倒闭潮。

成本上升叠加价格疲软使工业企业的利润空间不断压缩。如图 3.11 所示，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在 2017 年 2 月出现了一次跳跃，从此前的个位数跳涨到 31.5%，此后开始下行，2018 年 2 月回落至 20%以内，2018 年底将至 10%左右，2019 年 2 月突然跌至-14%，此后跌幅虽有所收窄，但一直在负值区间，7 月为-1.7%。利润总额的同比下降还是反应出当前工业运营的困境，改革的政策效应曾掩盖了这种困境，但随着政策效应的递减，运营困境下的利润困境暴露无遗。

这种效应典型地表现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上，需知道，2017 年 2 月的那次利润总额跳涨主要还是国企带动的，当时国企利润总额的增长率从 6.7%一夜之间跳涨到 100.2%，此后利润总额增长率开始回落，并带动了整个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长率回落。2019 年 2 月国企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24.2%，降幅与当年的涨幅一样是惊人的，至 7 月，同比降幅仍达 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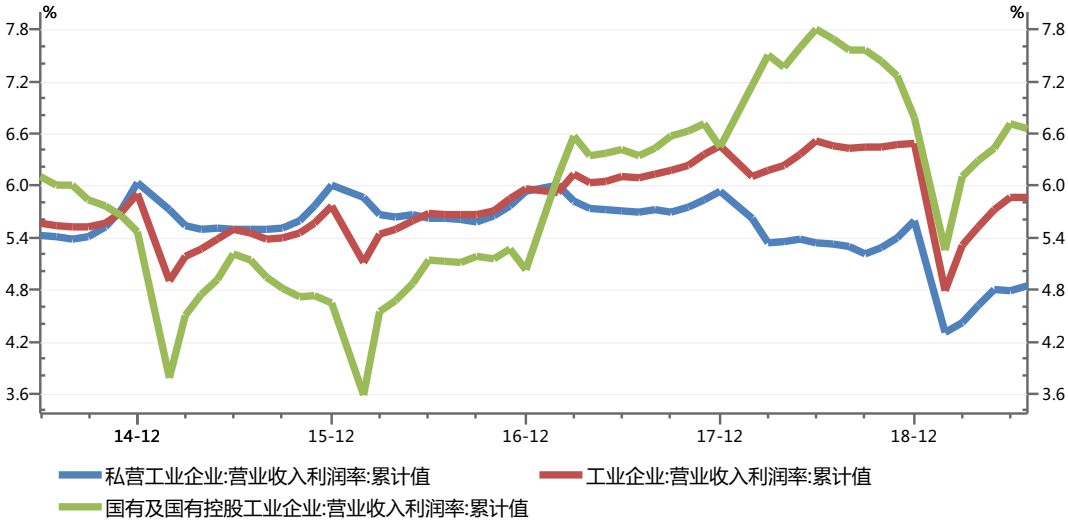
相对而言，私营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变动小一些，2017 年 2 月，利润总额的同比增速从 4.8%提高至 14.9%，此后也开始经历下滑的过程，至 2018 年基本维持在 10%左右的水平，2019 年也突然猛跌至-5.8%，此后有所回升，7 月为 7%。



数据来源：Wind

图 3.11 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

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不仅要看利润总额，更要看利润率。如图 3.12 所示，2019 年 2 月各类工业企业均出现了营业收入利润率猛烈下降的过程，这大致能反应出企业经营的困难。



数据来源：Wind

图 3.12 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

就全部工业企业而言，利润率的峰值出现在 2018 年 6 月，当时为 6.51%，横亘在这个水平上约半年时间，2019 年 2 月突然下沉到 4.79%，降低了 1.72 个百分点。此后有所回升，7 月为 5.87%，比上年同期 6.46%仍低出 0.59 个百分点。

分所有制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下滑趋势最严重，但相对水平仍最高。

得益于供给侧改革，国有企业在 2015 年之后经历了利润率的华丽转身。2016 年 2 月利润率只有 3.59%，此后快速攀升，6 月即突破 5%，至 2017 年 2 月突破 6%，2018 年 2 月突破 7%，峰值出现在 2018 年 6 月，达到 7.8%，此后，随着供给侧效应的递减，利润率开始单边下滑，2019 年 2 月急跌至 5.26%，此后又逐渐回升，7 月为 6.66%，比上年同期降低 1.03 个多百分点。

相对而言，私营企业是最艰难的，在 2016 年 12 月之前，其利润率一直高于国企，但从 2017 年 2 月开始一举被后者反超，在国企利润率高歌猛进的同时，私营企业利润率却一路走低，从 2017 年 2 月的 6.01%一路降到 2018 年 12 月的 5.59%，2019 年 2 月又急跌至 4.32%，此后略有回升，7 月为 4.85%。

目前中央人民银行 1-5 年的中长期贷款基准利率 4.75%，这也意味着，即便按基准利率执行，如果靠中长期贷款来维持运营，私营企业目前 4.85%的利润率也仅够偿还贷款利息的，根本没有结余。但现实中很多私营企业很难拿不到银行贷款，更别提基准利率了，它们更多地是从民间借贷渠道筹资，利息负担惊人。就以温州民间借贷为例，2019 年 7 月综合利率高达 15.9%，这还是近年来随经济下行下调后的水平，峰值时年息曾一度超过 2 分，如图 3.1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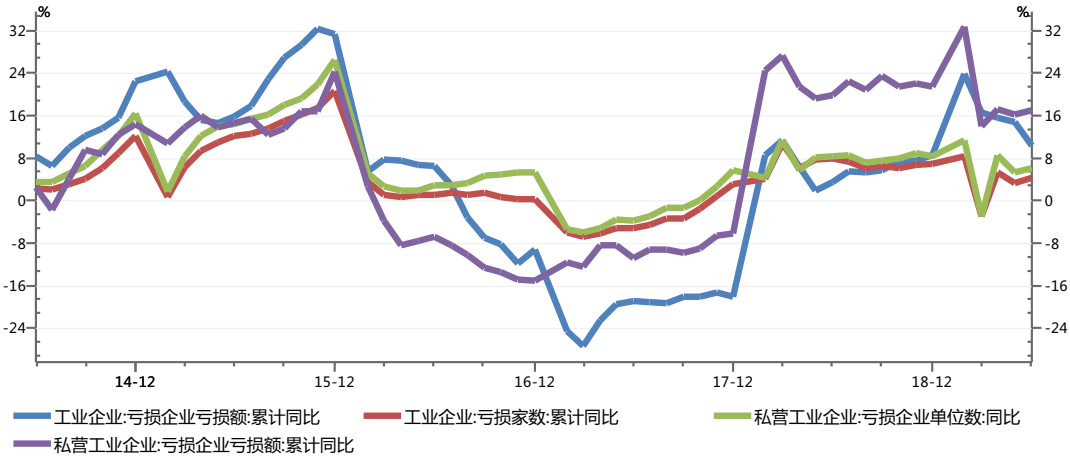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Wind

图 3.13 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

当工业企业经营困境不断向纵深维度演绎时，会从一开始的亏损面扩大转向亏损度加深。图 3.14 显示，自 2017 年 2 月以来亏损工业企业的亏损额大幅减少，当月同比减幅达 24.6%，此后一直维持近 20%的减幅直至 2018 年初，同一期间，亏损企业数也在减少，但减幅只有 5%左右。从 2018 年 2 月开始亏损企业的亏损

总额和亏损企业数都再拾升势，且亏损企业数的增幅超过亏损企业亏损额增幅，2018 年 9 月，前者为 6.6%，后者为 5.8%，但此后开始逆转，亏损企业亏损额的增幅超过亏损企业数的增幅，并在 2019 年 2 月发生巨变，当月亏损额增幅高达 23.9%，亏损企业数增幅只有 8.4%，至 6 月，二者数字分别为 10.4%和 4.3%。这说明总体上工业企业的亏损程度在加深。



数据来源：Wi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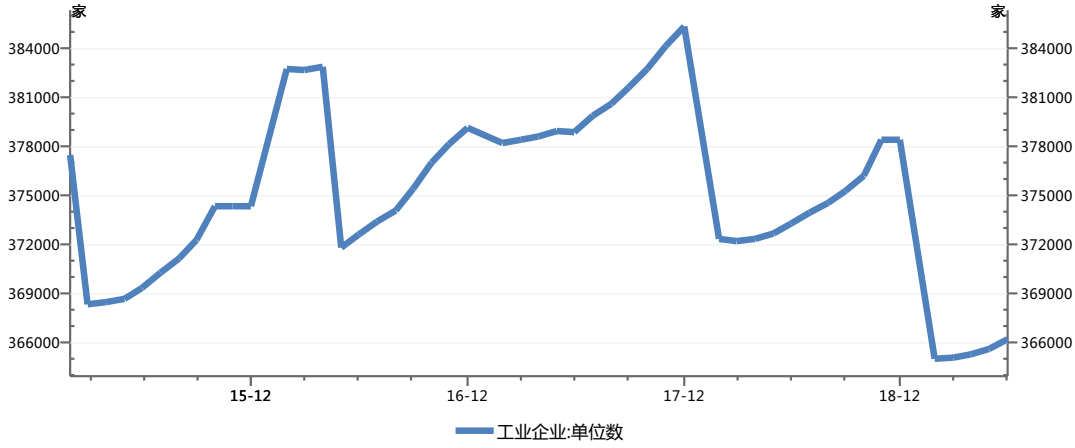
图 3.14 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和亏损企业数同比增速

图 3.14 还显示，私营企业亏损加深的问题更严重。其亏损加深问题大约从 2018 年 2 月就开始了，此前虽然亏损企业数在小幅增加，但亏损额却在减少，且多数月份的同比减幅都在 10%以上，但从 2018 年 2 月开始亏损企业亏损额的同比增幅却突然大幅攀升，达 24.4%，并远远超过亏损企业数的同比增幅，后者仅为 4.4%，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各月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同比增幅都基本维持在 15%以上，而亏损企业数的增幅都在 10%，最严重的也是 2019 年 2 月，当月亏损额增幅猛增至 32.7%，亏损企业数增速为 11.4%。至 6 月，二者分别为 17%和 6.1%。

从这里可以看出，私营工业企业的亏损深化问题已持续了近 1 年半的时间，这应引起警惕。长期亏损，特别是长期的亏损深化，造成的严重结果就是“亏死”，那些抗风险能力弱的企业会撑不下去而关张。这会在企业数量上反应出来。

就以工业企业单位数为例，如图 3.15 所示，目前已降至 2015 年以来的最低，比最艰难的 2015 年 2 月还要少。工业企业单位数的峰值出现在 2017 年 12 月，当时超过 38.5 万家，此后随着经营形势恶化，数量逐渐减少，最严重的出现在

2019 年 2 月，从 37.8 万家骤减至 36.5 万家，短短 1 个月内减少了 13 万多家，此后数量无太大变化，至 6 月份仍只有 36.6 万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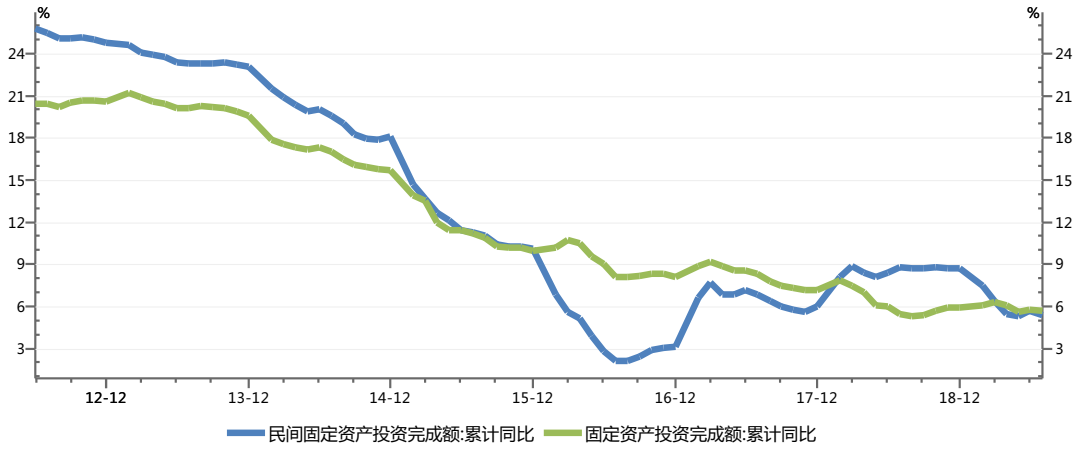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Wind

图 3.15 工业企业单位数

亏损深化带来的另一个影响就是投资放缓，特别是民间投资的放缓。

如图 3.16 所示，自 2012 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几乎呈单边下降的趋势，2013 年之前基本维持 20%以上，此后降到 20%以下，2015 年开始降到 15%以下，2016 年骤降至 5%以下，2016 年降到 10%以下，2018 年以后降到 5%左右，至 2019 年 7 月仍维持在 5.7%左右的较低水平。

利润下滑、无利可图，民间投资会率先知晓并止步。从图 3.16 也可以看出，民间投资在 2016 年年中时已几乎停滞，7 月份同比增速只有 2.11%，随后开始反弹，2018 年 3 月达到阶段性的峰值，为 8.88%，此后又开始回落，至 2019 年 7 月只有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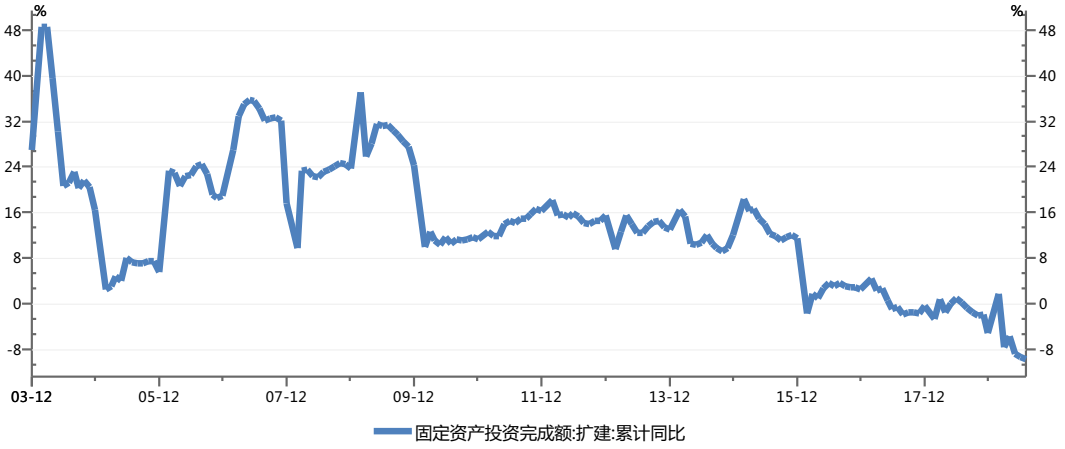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Wind

图 3.16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从投资构成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新建、扩建、改建三部分，扩建部分代表扩大产能，如果经营困难，扩建部分将会放缓甚至减少。

图 3.17 显示，目前扩建型固定资产投资已陷入严重的萎缩状态。在 2015 年之前扩建型投资尚能保持 10%以上的同比增速，2016 年后降至 5%内，2017 年则在 0 上下浮动，从 2018 年底开始大幅下跌，至 2019 年 7 月同比减少 9.8%。扩建型投资的大幅萎缩在相当程度上反应了当前企业经营信心不足。



数据来源：Wind

图 3.17 扩建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劳动需求是引致性需求，企业经营困境终将传导到用工需求上，不论是企业关张还是减产，只不过，前者是一次性释放劳动力，后者稍微缓和些。

未来一段时间内如果企业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很可能会在减产的基础上叠加弱质企业的倒闭潮，而每关掉一家企业，员工就会全部抛出去。

三、工业经营困境会进一步传导到生产性服务业。从历史经验看，生产性服务业对工业兴衰非常敏感，工业不振极易导致生产性服务业的过度衰退。

1、生产性服务业对工业波动十分敏感，反应弹性高达数倍。

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为工业生产提供信息与保障服务的服务行业，是一种新兴的服务业。具体而言，生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等几大行业。与传统的消费服务业不同，它具有技术性强、生产率高的特点，能为工业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生产性服务业依附于工业企业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与工业发展休戚相关。

就以制造业为例，我们根据各个季度制造业、各生产性服务业的当季增加值，计算出它们的相关系数，如表 3.5 所示。

表 3.5 制造业 GDP 与各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关系数

	当季	滞后 1 季	滞后 2 季	滞后 3 季	滞后 4 季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	0.980	0.764	0.819	0.711	0.975
租赁与商业服务业	0.932	0.767	0.774	0.838	0.911
信息传输、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0.829	0.811	0.921	0.802	0.709
金融业	0.700	0.879	0.799	0.870	0.717

注：数据为整理计算得出。

表 3.5 显示，制造业增加值与各服务业门类都密切相关，且持续时间较长，滞后四个季度的影响都很明显。就以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为例，当季其增加值与制造业的相关系数高达 0.98，几乎是一对一的传导，滞后三个季度虽有所下降，但仍在 0.7 以上，滞后四个季度又达到 0.975。类似地，租赁与商业服务业与制

造业增加值的当季相关系数为 0.932，滞后三个季度也有所下滑，但仍维持在高位，滞后四季度又回升到 0.911。

对信息传输、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而言，与制造业的相关系数基本维持在 0.8 以上，峰值出现在滞后三个季度，为 0.921。它之所以会出现明显的滞后，与它的产业属性有关，它不像交通运输或租赁服务那样与制造业产出结果挂钩那么紧密，产出越多，对物流运输的需求量越大，对仓储和租赁服务的需求量也越大，但对信息传输等需求量未必会立即反应出来，它有一定的间接性，更多地是影响生产过程而不是产出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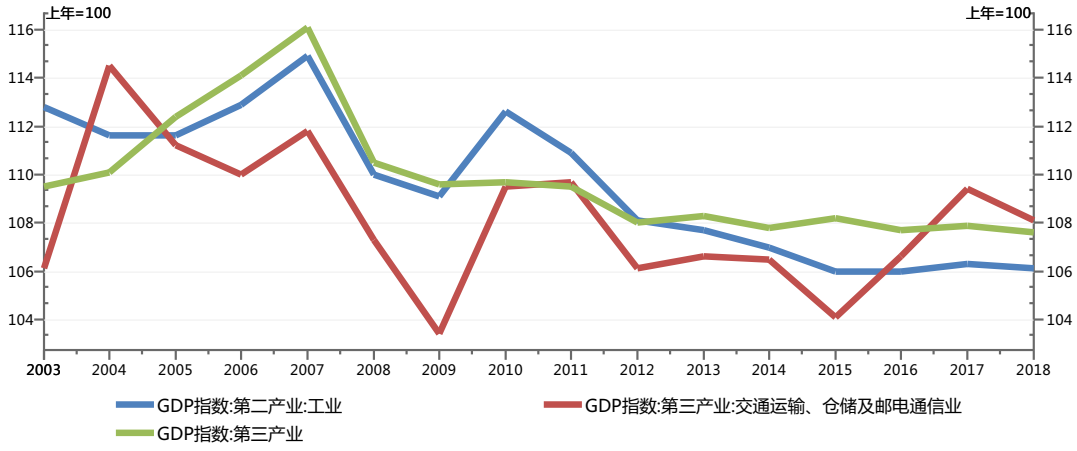
在生产性服务业中，与制造业增加值相关性最小的是金融业，其当季及滞后四个季度的相关系数没有超过 0.9 的，峰值是在滞后两个季度，为 0.879。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金融业与实体经济挂钩不紧的问题。

进一步，从历史经验看，生产性服务业不仅与工业 GDP 保持基本一致的运动轨迹，而且反应更敏感，跳跃性更大。

我们以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代表，如图 3.18 所示，至少从 2006 年起，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 GDP 增速基本呈一致的波动形态。二者的波谷都出现在 2009 年，当时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工业 GDP 首次落至 10%之内，从 10%降至 9.1%，降幅为 9%；生产性服务业则从 7.3%降至 3.4%，跌幅达 53%。此后随着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刺激，二者均出现一定的回升。

第二次低谷出现在 2015 年，如前所述，这是工业部门最困难的一年，工业 GDP 增速从 7%降为 6%，降幅为 14%；生产性服务业则从 6.5%降至 4.1%，降幅达到 37%；2017 年工业形势好转，工业 GDP 增速从 6%升至 6.3%，增幅为 5%；生产性服务业则从 6.6%到 9.4%，涨幅为 42%。2018 年工业形势再次转弱，工业 GDP 增速从 6.3%降为 6.1%，降幅为 3.2%；生产性服务业则从 9.4%降至 8.1%，降幅达 14%。可见，生产性服务业对工业波动的反应弹性高达数倍。

可以说，生产性服务业对工业增速的过度反应，是一个常态化的现象。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担心，如果工业企业的经营困境继续蔓延，极可能会造成生产性服务业的过度衰退。



数据来源：Wind

图 3.18 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 GDP 增速

那么，生产性服务业为什么会对工业增速反应过度呢？这有点类似于供应链管理中的鞭子效应。所谓的鞭子效应是指当下游总装厂产出变化时，会造成上游各个环节供应链企业产出的数倍的变化，这就像甩鞭子，当稍微抖动一下鞭子的根部时，末梢就会一跃而起。

生产性服务业的鞭子效应主要源于高加工度化下的分工细化和服务外包。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工业化将从重化工业化转向高加工度化，后者的典型特征就是生产方式更加迂回，专业化分工更加精细，其中，很多的生产性服务环节外包，以获得生产率的分工优势，比如，设计、咨询、金融、信息、采购、物流、销售、售后服务、人力资源等，这会催生一大堆的生产性服务公司。它们仰仗工业企业的鼻息而生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家大型企业的周围通常会聚拢数十家、上百家甚至成千上万家的供应链服务企业，它要打个喷嚏，一群企业跟着颤抖。

2、工业困境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传导已初步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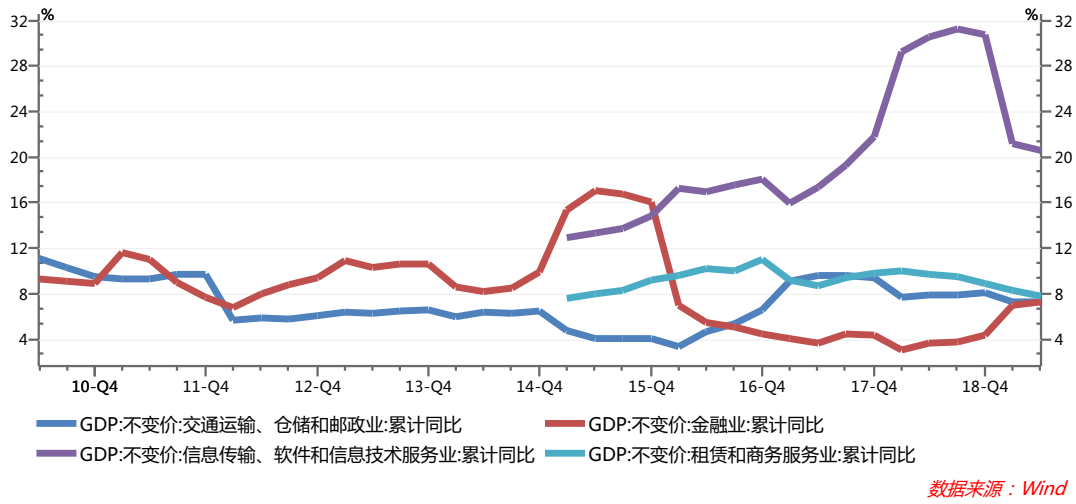
从图 3.18 还可以看出，近年来生产性服务业对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它有一个转变过程。

在 2016 年之前的十多年时间里生产性服务业增速一直都慢于服务业增速，说明当时服务业发展主要靠消费服务业等的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则相对滞后。2015 年服务业整体增速为 8.2%，生产性服务业只有 4.1%；2016 年服务业增速为 7.7%，生产性服务业为 6.6%，差距缩小。从 2017 年开始，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速开始超过服务业整体，前者为 9.4%，后者为 7.9%；2018 年二者分别为 8.1%

和 7.6%。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拉动服务业发展的新引擎。

从图 3.19 可以看出，生产服务业四大细分行业的增加值增速在 2019 年出现明显的下滑，特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2018 年上半年该产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速为 30.5%，但到了 2019 年上半年降至 20.6%，整整回落了近 10 个百分点。类似地，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从 2018 年上半年的 9.7%降为 2019 年上半年的 7.8%，回落近 2 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从 2018 年上半年的 7.9%降为 7.3%，降幅相对温和一些，但 2017 年上半年该行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速为 9.6%，所以，它的大幅下降发生在 201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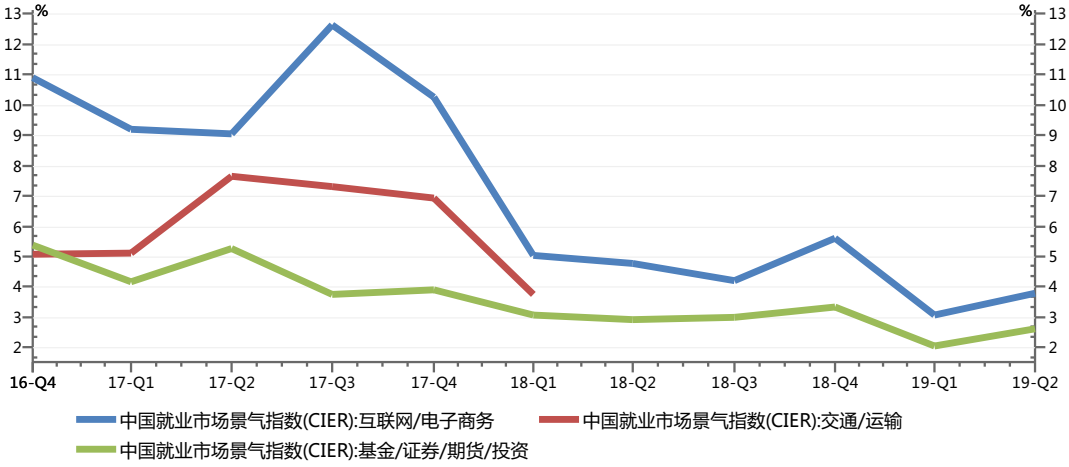
其中，比较特殊的是金融业，2019 年上半年，随着股市走强和银行业利润回升，金融业出现较明显的复苏迹象，增加值同比增长 7.3%，而 2018 年上半年只有 3.7%。但金融业能否持续回暖仍值得怀疑：首先，股市在经历短暂繁荣后又陷入低迷；其次，在实业利润率下降的背景下银行业利润率不可能持续走高。



数据来源：Wind

图 3.19 生产服务业若干细分行业的增加值增速

与之相应的是，生产服务业的就业景气度指数呈现出同步的变化趋势，如图 3.20 所示。



数据来源：Wind

图 3.20 生产服务业若干细分行业的就业景气指数

从图 3.20 可以看出，以互联网/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就业景气指数呈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从 2017 年 9 月的峰值 12.62 降至 2019 年一季度的 3.08，二季度开始有所回升，但也只有 3.78。基金/证券/期货/投资业则从 2016 年 12 月的 5.39 降至 2019 年一季度的 2.07。

3、生产性服务业困境使整个服务业的发展动能衰减。

关于服务业内部构成，按格鲁伯 & 沃克（1989）的经典分类方法，我们可将其分割为生产服务业、消费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三个组成部分。具体地，它们包括如下细分行业。

表 3.6 三大服务业所覆盖的细分行业

	细分行业
生产服务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
消费服务业	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房地产业、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对照上述分类标准，我们可大致刻画出服务业内部就业演变的轨迹。以城镇

单位+个体私营就业人数为统计口径，轨迹如表 3.7 所示。

表 3.7 服务业及三大细分行业的就业人数（万人）

年份	服务业	生产服务业	消费服务业	公共服务业
2004	22725	2199	6025	3337
2005	23439	2334	6484	3413
2006	24143	2474	6881	3482
2007	24404	2622	7321	3548
2008	25087	2801	7872	3630
2009	25857	3066	8831	3746
2010	26332	3192	9488	3862
2011	27282	3448	10915	3995
2012	27690	3998	11482	4158
2013	29636	4393	13101	4283
2014	31364	4850	14881	4406
2015	32839	5433	16492	4489
2016	33757	5820	18035	4538
2017	34872	6402	19776	4622
2018	35938	——	——	——

注：生产服务业、消费服务业、公共服务业人数为按表 3.6 口径分类的细分行业中城镇单位就业+个体私营就业人数计算，因行业与口径不能全覆盖，三者加总得出的就业人数与服务业总就业人数有出入。

表 3.7 显示，近年来服务业就业增长主要靠消费服务业和生产服务业来拉动，公共服务业则一直较为平缓。但自 2012 年峰值以来，生产服务业的就业增速呈逐步下降的趋势；消费服务业就业自 2013 年后也呈增速放缓趋势，但总体还在中高位运行。2017 年在生产服务业强劲反弹的背景下，就业人数也大幅增加，增幅一度超过 10%，甚至反超消费服务业的 9.63%，但进入 2018 年后，情况已不再乐观。

多年来中国服务业的最大问题就是，生产率相对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占比较低，且一直没有什么起色。如图 3.21 所示，自 2005 年以来，直到 2013 年 9 月前，四大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业中的就业占比变化一直不大，自 2013 年 12 月开始才有较明显的提升，从此前的 21.3%提高到 24.8%，此后又经历缓慢的增长，至 2017 年底为 2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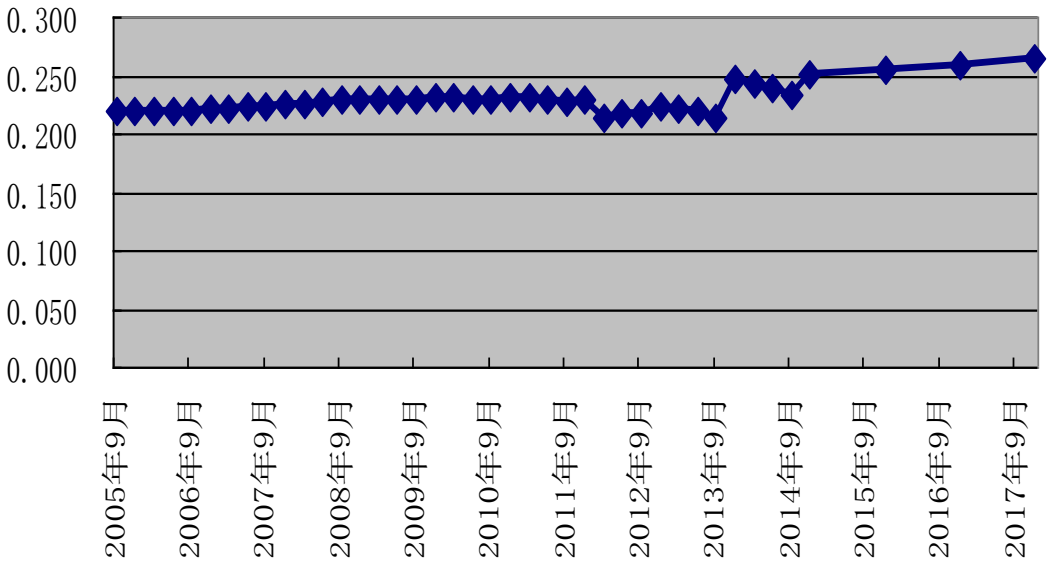


图 3.21 服务业中四大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占比

我们注意到，生产服务业就业占比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信息传输、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占比的提高，它们在时间上是完全吻合的，如图 3.22 所示。在 2013 年 9 月前，该行业在服务业中的就业占比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2013 年 12 月开始大幅提升，从之前的 2.8%提高到 3.8%，至 2017 年 12 月，已逐步提高到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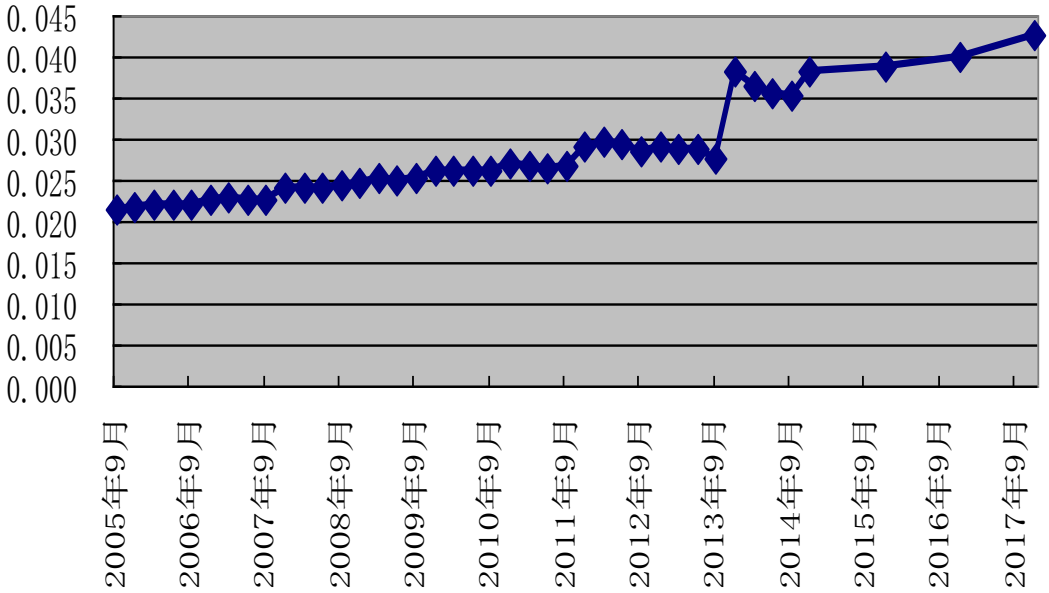


图 3.22 服务业中信息传输、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就业占比

如果以信息传输、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结束了快速增长的势头而步入放缓通道，那么整个服务业的发展动能也会衰减，图 3.23 显示，自 2017 年三季度以来服务业生产指数呈单边下滑趋势，2017 年 9 月-2019 年 6 月，从 8.3 降至 7.3，整整回落了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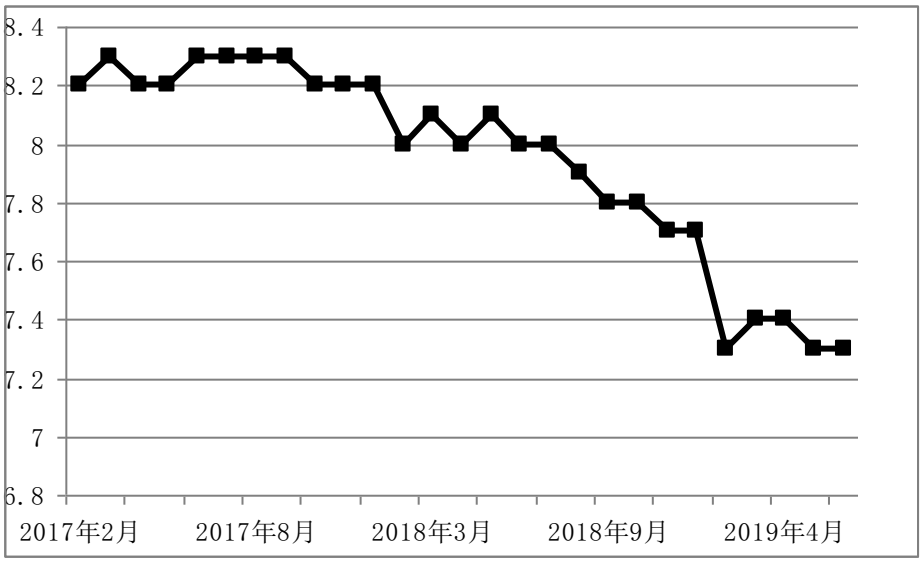


图 3.23 服务业生产指数

4、生产性服务业不景气不仅削弱就业创造能力，更会拉低就业质量。

前者自不必多言，现在来看后者。

就业质量有多个衡量维度，但排第一位的是工资水平，低质量就业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工资低。一般而言，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较高，工资水平也更高；相反，消费服务业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较低，工资水平也较低，其他劳动权益保障也差。

就以 2018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为例，各行业的人员平均年工资如图 3.24 所示，四大生产性服务业的人均工资水平要普遍高于其他行业。

最高的是信息服务、软件和计算机服务业，达 147678 元；其次是金融业，为 129837 元；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居第三位，为 89380 元；租赁和商业服务人员居第四位，为 85147 元。

再来看消费服务业中的两大代表性行业：批发和零售业为 80511 元，居民服务业只有 55343 元，住宿和餐饮业更是只有 48260 元。差距立判。

制造业和建筑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工资差距也非常大，分别为 72088 元和 60501 元，它们只比消费服务业略强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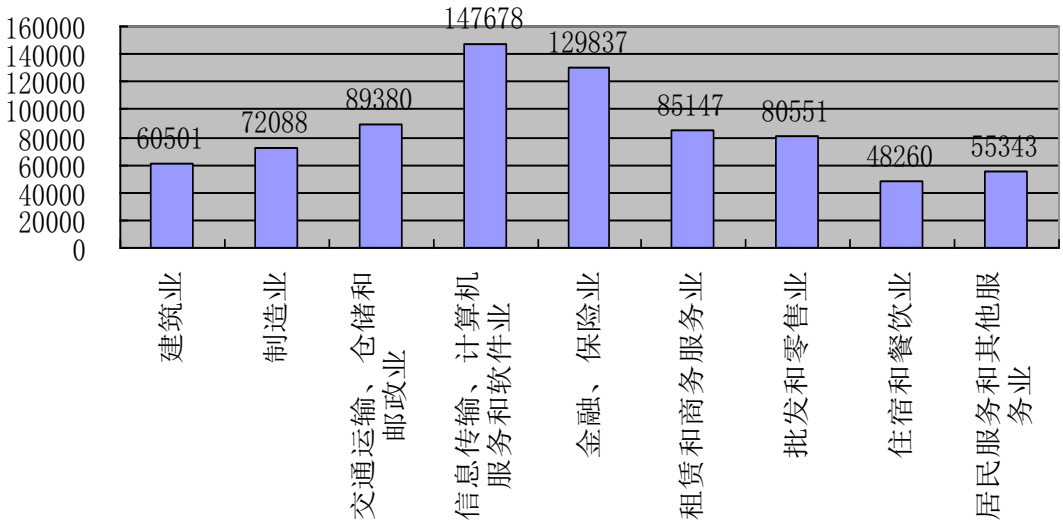


图 3.24 主要行业的工资比较（2018 年）

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进步可能正在加速排斥劳动力。

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是一个长期话题，之所以要把这个话题单独拿出来，是因为在近期内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可能会加快。

1、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是动态的

技术进步是促进潜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但它会不会吞噬就业是人们历来担心的话题。早在 1930 年凯恩斯就引入了技术性失业的概念，并把它称为新疾病，意指技术进步先带来工作破坏，再带来工作创造，而工作破坏的速度往往会超过创造的速度。

但从现有研究来看，长期内，技术进步并没有带来大家所恐惧的破坏结果。在这方面，国际劳工组织 ILO 进行了长期跟踪，并形成了三份有影响力的报告：一是跟踪上个世纪 50 年代机械化生产，发现非但没有导致就业下降，还出现了就业增长。二是 60 年代，再次否定了“自动化恐慌”。当时约翰逊总统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结果发现没有出现“自动化失业”。三是 70 年代，技术创新使就业出现周期性上升。技术失业被不断证伪。

但历史并不都会重演，当前这轮技术进步正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有人称之为“与历史模式最大的背离”，这一轮技术革命是在信息技术和自动化成就的基础上形成的，将它们汇集在一起，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指数级的生产率的增长，由此带来更强的工作替代效应。工业 4.0 在制造、物流等领域带来新一轮的工作整合，自动化和碎片化的整合将无处不在，效率潜力令人生畏。

悲观的学者得出了令人震惊的测算结果，比如，Frey & Osborn（2013）认为，未来 10-20 年美国就业总人数的 47%有被替代的风险，在英国这一比例为 35%，德国、法国相似。东盟地区甚至有近 60%的就业人口存在被替代的风险（Chang & Hyunh, 2016）。

当然，也有人指出技术进步也会创造就业岗位，这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效应，它在摧毁旧岗位的同时也会创造新的岗位，比如，设计和维护人员。二是源于生产率优势，产出扩大效应带动就业岗位扩张。

技术进步对不同工种的影响是不同的，替代顺序大致是：体力劳动中的常规工作——体力劳动中的非常规工作——脑力劳动中的常规工作——脑力劳动中的非常规工作。机器人不会取代人类，但人类工作会越来越集中于那些不能由计算机来执行的任务，工作将变得越来越复杂。

基于此，技术进步排斥劳动力可能呈倒 U 型，一开始需要一个累积，才能开始排斥劳动力，比如在安装机器人之前需要外围投资，这个阶段还不会明显地排斥劳动力，此时排斥劳动力慢，但一旦“万事俱备”，机器就会露出狰狞的面目，

开始大面积地吞噬就业了，那些常规的体力劳动岗位最容易被识别，替代速度会迅速上去。但随着常规岗位被替代完，再去替代那些非常规的工作岗位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替代速度又会放慢，最后才是分步“蚕食”剩下那些难替代的岗位，这会随技术进步的逐渐深化而发生。

我们把这个过程概括为倒 U 型过程，它会有两个临界值，一个是从慢到快的加速临界值，这时破坏的“阀门”开启；一个是从快到慢的减速临界值，这时创造的“阀门”将开启，Perez（2013）所称的“创造就业的黄金时代”将到来。现在关键是在“黄金时代”到来前要挺住破坏的冲击。

2、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自 2013 年之后进入加速发展期

上述的拐点预判，也许是我们的一家之言，但绝非空穴来风。比如国际劳工组织 ILO 就指出，别看现在技术进步还没有对全球劳动力市场造成多大冲击，但它可能已超过临界值，使技术失业率在不久的将来或呈增速上升的趋势。这个预警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世界前列。乌镇智库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显示，全球人工智能企业分布极不平衡，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排名前三的美国旧金山湾区、纽约及中国北京企业数量分别占全球的 16.9%、4.8%与 4.0%。

按乌镇报告，人工智能技术分四个分支：机器学习、机器人、自然语言处理与计算机数学。自 2009 年以来，这四类技术呈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尤其是机器学习最为迅速。图 3.25 显示了全球范围内四类企业数量的发展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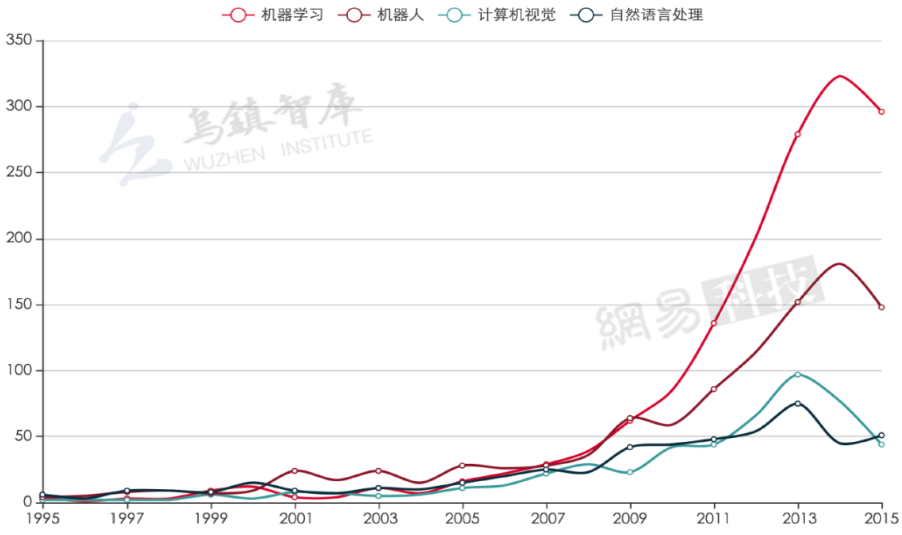


图 3.25 人工智能四类技术的企业数量增长趋势

从图 3.25 可以看出，2009-2013 年四类技术企业呈突发性井喷发展，这可能预示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了一个突破阶段，并迎来某个拐点。

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机器人的快速应用，一个重要诱因是人工成本的不断攀升。根据拉坦-速水佑次郎的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劳动要素价格的相对上涨会诱发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机器人取代人工是个典型代表。

如图 3.26 所示，自 2004 年以来，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实际工资指数与经济增速基本保持同步运动的趋势，时高于之，时低于之，但在 2014 年之后，工资增速开始明显快于经济增速，2017 年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实际工资增速为 8.2%，GDP 增速为 6.7%；2018 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 8.7%和 6.6%，差距进一步扩大。这种强劲的工资增长趋势在很大程度上驱动了机器人等新技术的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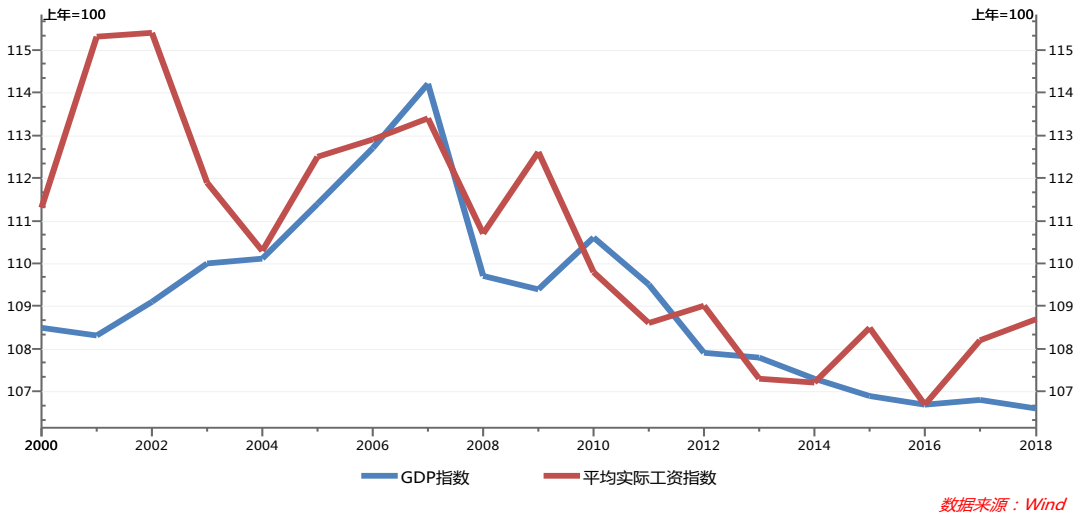


图 3.26 平均实际工资指数与经济增速比较

如图 3.27 所示，在 2013 年之前中国每千名工人所拥有的机器人数量远低于美国、欧盟甚至亚洲平均水平，从 2013 年之后奋起直追，差距不断缩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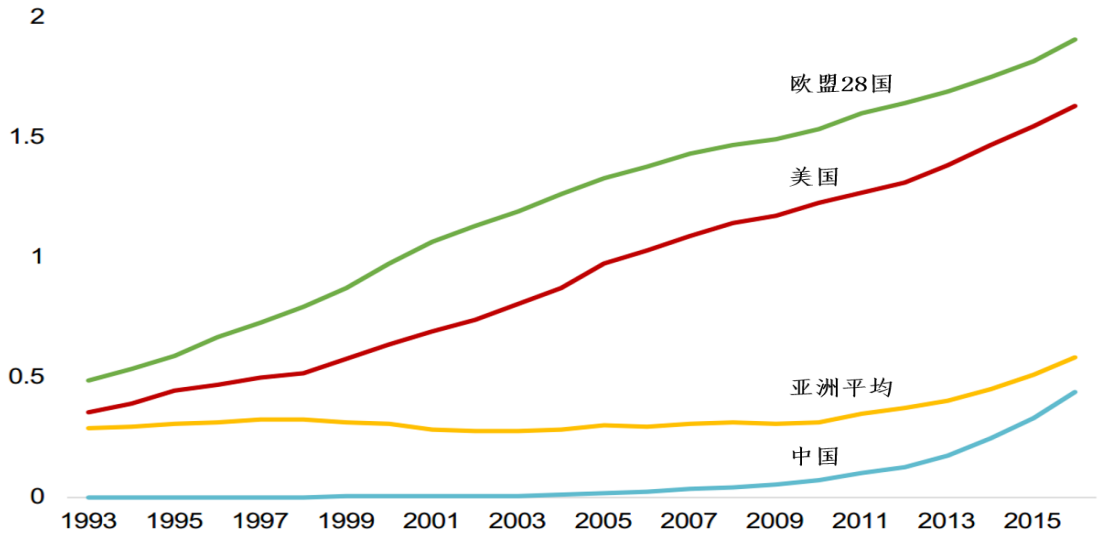


图 3.27 每千名员工机器人拥有量（1994-2016）①

2016 年中国现役机器人数量迅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一。2017 年中国机器人新安装量（13.8 万台）占世界新增的三分之一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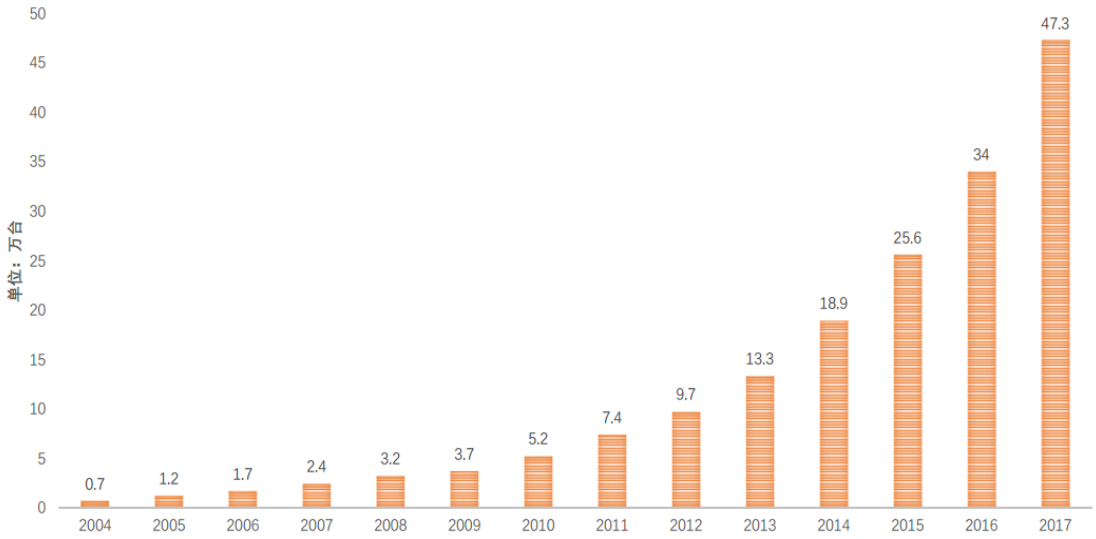


图 3.28 中国机器人运行数量（2004-2017）

中国机器人绝大部分应用在制造业各行业中（2017 年占现役量的 99.2%），使得制造业的机器人密度从 2009 年的 11 台/万人猛增至 2017 年的 97 台/万人，

① 资料来源：Chiacchio et al. (2018)依据 IFR 和 EU-KLEMS 数据计算。

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超过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如图 3.29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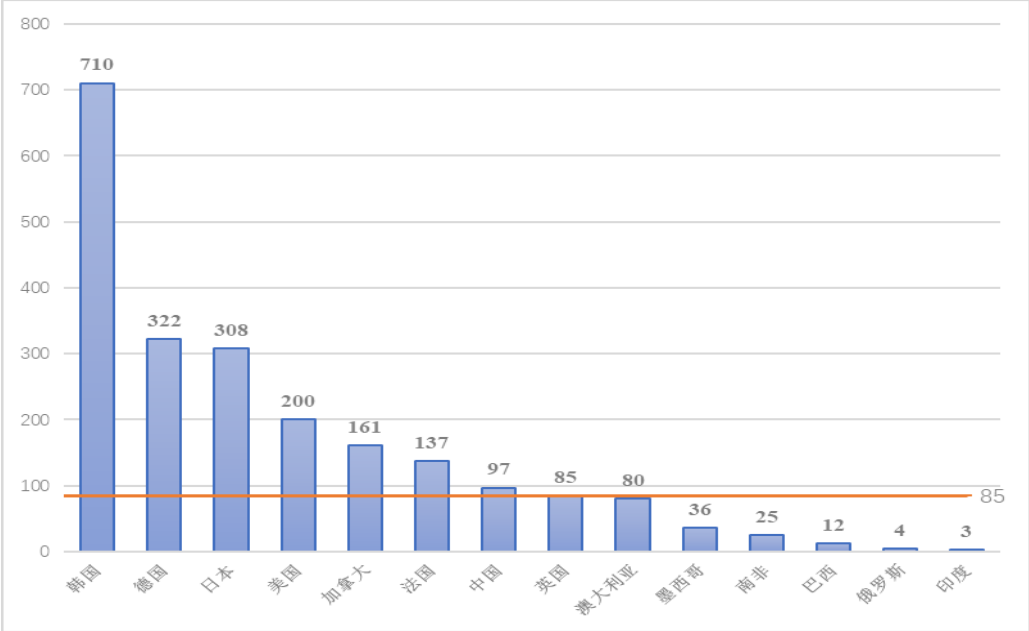


图 3.29 制造业每万名员工拥有机器人数量（红线为全球均值，2017）

3、技术吞噬就业可能正在加快

如此情形下，机器人对就业的替代也可能会加速。如前所述（图 2.3），单以城镇统计口径计，2016-2017 年制造业排斥劳动力数量分别仅 134 万和 269 万，但 2018 年突然猛增至 850 万。

目前技术吞噬就业应该主要还是发生在工业领域：首先，工业部门资本雄厚，有实力投入人工智能，服务业规模普遍较小，投入实力不足。另外，服务业目前主要还是以消费服务业为主，生产率低，工资低，劳动力的替代压力小。

图 3.30 显示，2004-2013 年我国工业部门劳动力是绝对增长的，从 2014 年开始绝对下降，且再也没有增加过，每年减幅大约在 500-700 万之间，2017 年的减幅突然飙升至 927 万，2018 年则有所收窄，至-575 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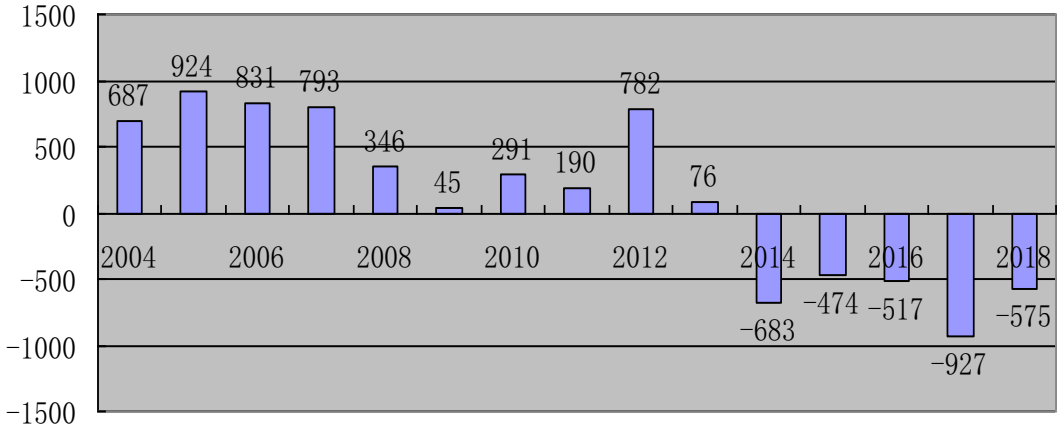


图 3.30 工业部门劳动力排斥速度（万人）

五、不断攀升财政压力使政府进行直接就业干预的能力受限，而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通过基建投资来扩大就业的有效空间也越来越小。

1、随着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大和减税改革，财政赤字率不断攀升。

按凯恩斯给出的药方，当经济不景气或出现失业浪潮时，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可以代替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矫正市场失灵，通过公共投资创造就业岗位，甚至不惜干类似于“洗砖头”这样的工作，但它会带来较大的财政负担。

2008 年金融危机，四万亿投资计划创造了近 900 万就业岗位，带来的财政负担也是明显的，财政赤字率迅速攀升，从上年的 0.35%增加到 2.12%。

今年以来财政政策更加积极：首先是财政支出进一步加大；其次是减税力度也在加大，二者交织发力使财政压力不断攀升。

首先，财政支出在不断加码，但力度已出现边际递减趋势。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今年的财政赤字率拟按 2.8%安排，比去年预算高出 0.2 个百分点。适度提高赤字率，是综合考虑财政收支、专项债券发行等因素的结果。今年财政支出超过 23 万亿元，增长 6.5%。

从实际情况来看，2019 年一季度确实加码很大，公共财政支出的累计同比增速达 15%，比上年同期扩大 4.1 个百分点，比 2018 年全年扩大 6.3 个百分点，但随后出现较快的回落，上半年累计同比增速回落至 10.7%，前 7 个月则进一步回落至 9.9%。与去年同期的 7.3%相比，增速只扩大 2.6 个百分点。扩幅的收窄

趋势说明财政投资的力度先扬后抑，后劲不足，这可能有两个原因：要么是财力跟不上，这是供给端的原因；要么是投资项目的收益不够，这是需求端的原因。我们认为这两方面原因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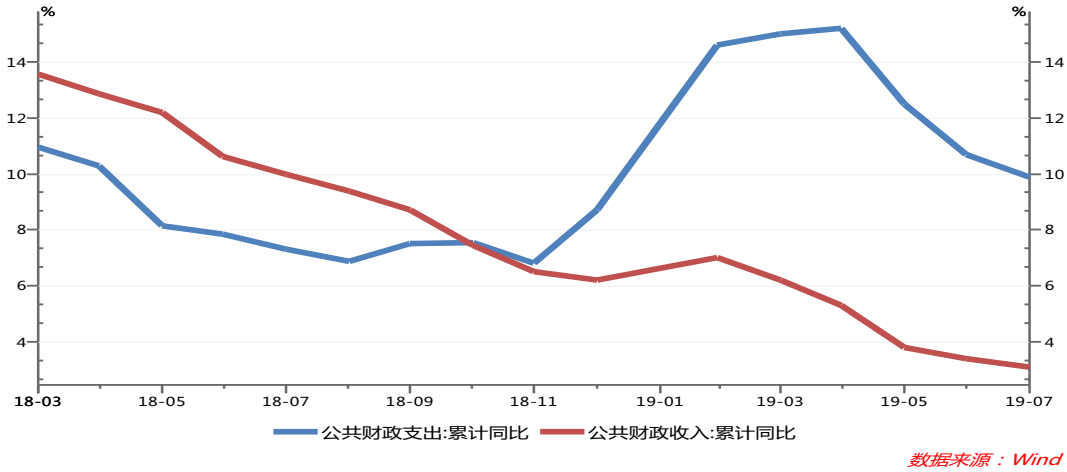


图 3.31 公共财政收支的累计同比

关于财力跟不上，图 3.31 也清晰地显示了这一点。进入 2018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突然放缓，上半年同比增速尚能达到 10.62%，但全年只有 6.2%，说明下半年放缓是很严重的。进入 2019 年以来，增长放缓问题更加严重，一季度财政收入同比增速只有 6.2%，比上年同期的 13.56%降低了 7.36 个百分点；前 7 个月增速进一步降落至 3.1%，比上年同期低 7.52 个百分点。幅度令人咂舌。

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减税改革。从 2018 年起，政府推出了多项减税措施。比如，在增值税方面，2018 年 5 月 1 日起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 17%降至 16%，交通运输、基础电信等行业增值税率将从 11%降至 10%。与此同时，个人所得税改革也在推进，从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起征点提高到 5000 元/月。7000 多万个税纳税人无需再缴税。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光增值税改革，2018 年 5~10 月就合计减税 2980 亿元；个人所得税改革 10 月实施就实现减税 316 亿元；2018 年前 10 个月，落实支持“双创”税收优惠政策共减税 6789 亿元。

2019 年在 2018 年减税降费的基础上又实施了更大规模的减税措施：一是对小微企业实施普惠性的税收减免。二是提高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起征点，把月

销售额的起征点从 3 万元提高到 10 万元。三是放宽小微企业的认定标准，比如资产总额 5000 万以下、从业人数 300 人以下、应纳税所得额 300 万元以下的，都可认定为小微企业。按此条件，认定为小型微利企业户数 1798 万户，占全部纳税企业的比重超过 95%，其中，民营企业占 98%。四是对小规模纳税人交纳的部分地方税种减半征收，包括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五是扩展初创科技型企业优惠政策，对创投企业投向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可按投资额 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六是深化增值税改革，推进实质性减税。七是全面实施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落实好 6 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八是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减轻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同时，清理规范收费，加大对乱收费查处力度。

上述改革在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的同时，也对税收造成较大的冲击，如图 3.32 所示，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个人所得税，2019 年 2 月，个人所得税同比减少 18.1%，前 7 个月则累计减少 30.3%。增值税虽然没有绝对减少，但放缓的步伐很明显。2018 年年初，增值税同比增速还能达到 20%左右，到年底已经降到 10%以下。2019 年增值税增速放缓趋势加剧，前 7 个月的累计同比增速只有 5.4%，比上年同期下降 9.54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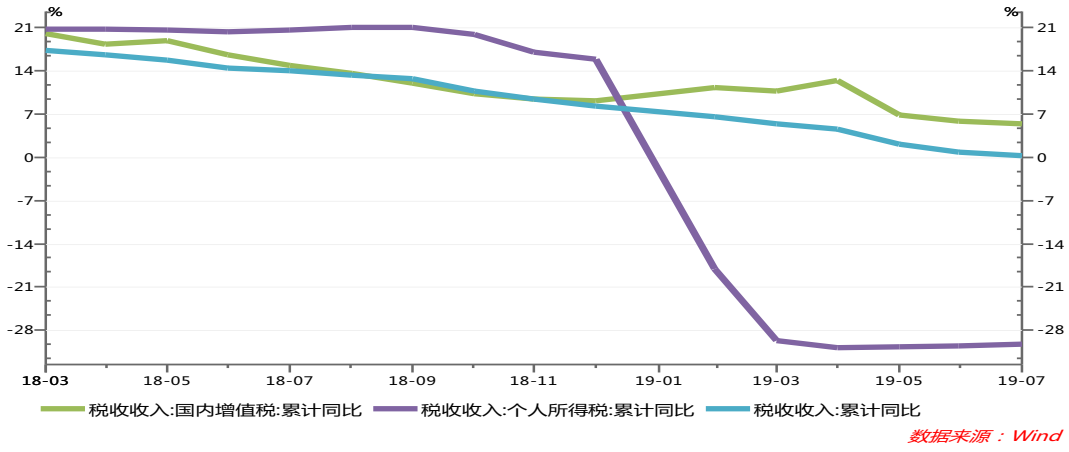


图 3.32 主要税种的累计同比

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反向运动趋势使财政赤字不断扩大，赤字率不断攀升。2019 年一季度财政赤字达到 497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4522 亿元；二季度，赤字规模进一步飙升至 1569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8431 亿元。无论绝对规模

还是相对规模，财政赤字都创下了历史同期水平的新高。

对于赤字率，现在一般用财政收支赤字除以 GDP，这是窄口径的赤字率，它低估了财政的负担程度，若将今年 2.15 万亿专项债考虑在内，那么，今年的广义赤字率预计会达到 4.98%，较 2018 年提高 0.84 个百分点。

在这种情形下，未来要进一步通过财政投资等手段来进行就业干预，其空间必然会受到限制。

2、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公共投资的边际效益不断递减。

财政收入放缓从供给端限制公共投资能力，另一方面，从需求端来看，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有投资回报价值的公共投资项目越来越少，投资边际收益递减会遏制投资的内在冲动。

就以公共投资最青睐的“铁公机”项目为例，经过这些年的连续建设，我国已形成非常完善的运输系统。如表 3.8 所示。

表 3.8 我国运输系统里程数（万公里）

年份	铁路营业里程	公路里程	高速公路里程
2010	9.12	400.82	7.41
2011	9.32	410.64	8.49
2012	9.76	423.75	9.62
2013	10.31	435.62	10.44
2014	11.18	446.39	11.19
2015	12.10	457.73	12.35
2016	12.40	469.63	13.10
2017	12.70	477.35	13.64
2018	13.10	484.65	14.26

如表 3.8 所示，2010-2018 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从 9.12 万公里增加到 13.1 万公里，增幅达 43.6%，其中高铁总里程近 2.9 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在这一期间，我国公路总里程从 400.82 万公里增加到 484.65 万公里，增幅超过 20%，公路网密度超过 50 公里/百平方公里，基本实现村村通公路。在公路系统中发展

最快的是高速公路里程，从 7.41 万公里增至 14.26 万公里，增幅接近 1 倍，目前高速公路里程数也是位列世界第一。

随着运输系统的日臻完善，投资边际收益下滑现象严重。就以高速公路为例，发达地区建高速公路，回本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再到偏远地区建高速公路，就没有那么容易回本了，有时候一分钟连一辆车都不到，投资效益低下。据报道，我国 90%高速公路都是收费的，收费标准也不低，一年高达 5000 亿元，却连续 7 年亏损，而且每年亏损额达上千亿元。

再以机场为例，截止 2018 年底，中国有机场 235 个，供给严重过剩，由于运输能力利用不足，70%都处于亏损状态。

由于财政投资能力受限，再叠加有经济价值的投资项目越来越少，交通运输领域的 PPP 项目在减少，这是外力（政府对 PPP 项目的限制）和内力（收益率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图 3.33 所示，2018 年 3 月全国交通运输领域的 PPP 项目数有 1854 个，到 2019 年 7 月，已降至 1751 个，累计减少 1000 多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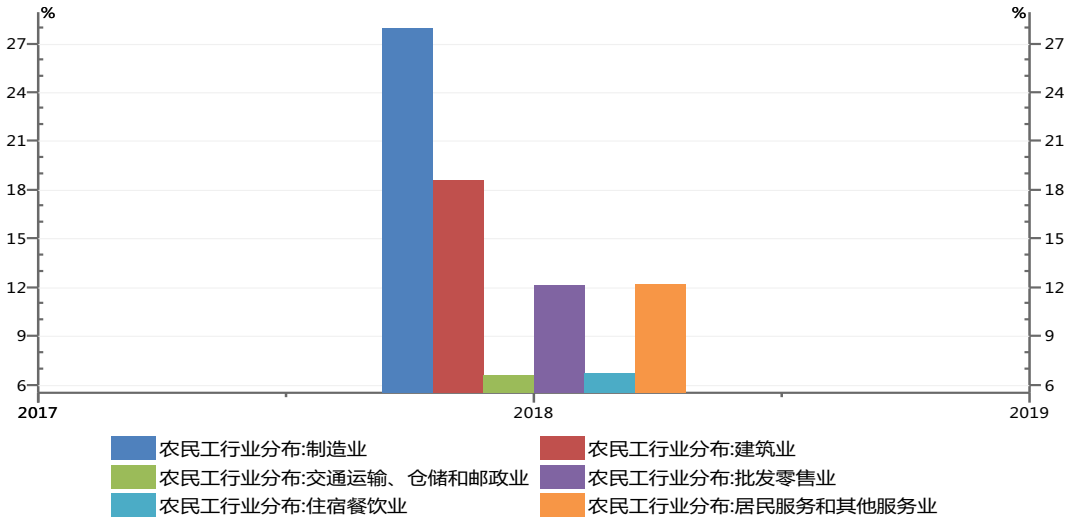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Wind

图 3.33 交通运输领域的 PPP 项目

公共投资特别是基建投资的放缓势必会影响到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劳动群体的就业，这典型表现在对建筑业就业的影响上。从统计口径上看，建筑业包括：房屋建筑业、土木工程建筑业、建筑安装业、建筑装饰业和其他建筑业等四类，现实中它们都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重要场所。

如图 3.34 所示，2018 年农民工就业分布最大的两个领域是制造业和建筑业，

制造业占 28%，若按 2.88 亿计算，约为 8100 万人；建筑业占 18.6%，约为 5400 万人，按直接参与建筑业生产经营活动的 6229 万人计，农民工占 85.7%。一旦基建工程项目放缓或减少，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不可小觑。



数据来源：Wind

图 3.34 农民工的行业分布（2018 年）

第四节 2019-2020 年中国就业形势预测

测算表明若 2019 年中国经济增速均保持 6.2%，非农就业增量将比上年减少近 230 万，说明当前就业形势较为紧张。若 2020 年经济增速还能维持在 6.2%，就业形势将有所回升，但这种回升是以牺牲就业质量为代价来实现的。可以说，中国就业矛盾正在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如何保证就业质量才是最大问题。

一、若 2019 年中国经济增速保持 6.2%，非农就业增量只能达到 400 万，比上年回落近 230 万，说明就业形势比较严峻。

1、评判就业形势时用非农就业增量比用城镇新增就业更合适

人们在评判这个问题时通常用城镇新增就业指标，但这个指标在学术研究上并不好把握。城镇新增就业是人社部统计的，是城镇地区社区介绍了多少人找到工作，没有扣除退出的，一个人也可能重复计算，口径比较粗。非农就业增量是统计局发布的二三产就业人数的年度差值，是净增的概念。

从本质上讲，城镇新增就业也是想反应非农就业增长的情况，但由于有重复统计的偏差，还不如直接用非农就业增量指标要更准确一些。

如图 4.1 所示， 2013 年非农就业增量达到历史峰值 1875 万，当年城镇新增就业 1310 万；此后非农就业增量迅速下降，而城镇新增就业依然递增。2015 年非农就业增量降到 1069 万左右，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仍达 1312 万；2016 年非农就业增量开始跌至 600 万左右，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一直都维持在 1300 万以上，2018 年还创下了 1361 万的历史新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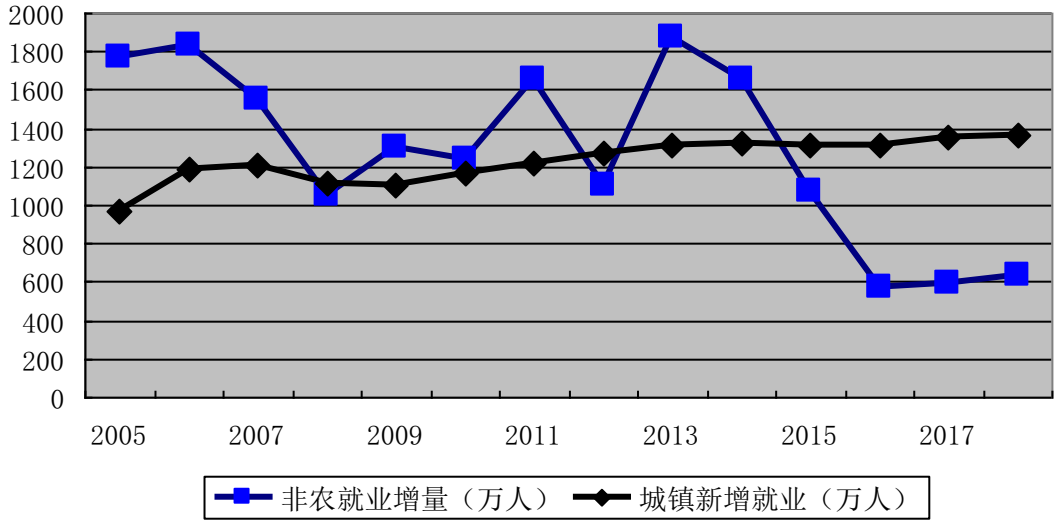


图 4.1 城镇新增就业和非农就业增量（万人）

2、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演进趋势及其 GDP 占比

如前所述，技术进步会吞噬就业，对冲它主要靠经济体量增长，只要后者的增速超过超过前者，就业就还能扩张。

目前技术进步在工业领域的推进速度要快于其他行业，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超过服务业和建筑，是抵消就业的主要力量。如表 4.1 所示，在 2016 年之前的十几年时间里，工业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个位数徘徊，从 2017 年开始，突然提速至 15.%，2018 年为 11.1%，这与前面所提到的工业加速排斥劳动力的时间是基本吻合的。相对而言，建筑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运动形态尚未发生大的变化，仍在原来的数量级上徘徊，就以建筑业为例，2017 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甚至为负，2018 年为 2.1%；服务业 2016 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只有 4.7%，2017 年又降至 1.2%，2018 年又回升至 4.7%，没有系统性的运动趋势。

表 4.1 各行业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速

	工业	增速	建筑业	增速	服务业	增速
2003	40826	——	27444	——	——	——
2004	43323	0.061	28656	0.044	25810	——
2005	45353	0.047	31696	0.106	28090	0.088
2006	48500	0.069	33645	0.062	31131	0.108
2007	53053	0.094	33758	0.003	35788	0.150
2008	57309	0.080	36748	0.089	38491	0.076
2009	58061	0.013	38622	0.051	40883	0.062
2010	63646	0.096	39478	0.022	44070	0.078
2011	66624	0.047	38991	-0.012	46560	0.056
2012	67020	0.006	43532	0.116	49577	0.065
2013	67760	0.011	49186	0.130	50144	0.011
2014	72014	0.063	47711	-0.030	51011	0.017
2015	72071	0.001	50339	0.055	52799	0.035
2016	75747	0.051	52337	0.040	55272	0.047
2017	87491	0.155	51554	-0.015	55923	0.012
2018	97187	0.111	52661	0.021	58545	0.047

注：计算时各行业 GDP 已平减为 2000 年可比水平。

但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正在下降，不管是在总 GDP 中的占比还是在总就业量中的占比都在下降。如表 4.2 所示，从 2016 年开始，工业 GDP 在总 GDP 中的占比已降至 1/3 左右，2018 年只有 33.9%；服务业一直在上升，2018 年已达到 52.2%；建筑业也在缓慢上升，2018 年占比为 6.9%。

表 4.2 各行业的 GDP 占比（%）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工业	建筑业	服务业
2003	12.30	45.60	40.30	5.50	42.00

2004	12.90	45.90	40.60	5.40	41.20
2005	11.60	47.00	41.60	5.60	41.30
2006	10.60	47.60	42.00	5.70	41.80
2007	10.20	46.90	41.30	5.70	42.90
2008	10.20	47.00	41.20	5.90	42.90
2009	9.60	46.00	39.60	6.50	44.40
2010	9.30	46.50	40.00	6.60	44.20
2011	9.20	46.50	39.90	6.73	44.30
2012	9.10	45.40	38.70	6.83	45.50
2013	8.90	44.20	37.40	6.87	46.90
2014	8.70	43.30	36.30	6.97	48.00
2015	8.40	41.10	34.30	6.77	50.50
2016	8.10	40.10	33.30	6.68	51.80
2017	7.60	40.50	33.90	6.70	51.90
2018	7.20	40.70	33.90	6.90	52.20

表 4.3 则显示，自 2003 年以来工业部门在就业总量中的占比变化也不大，峰值出现在2013年，当年占23.73%，此后便开始下降，至2018年已降至19.45%。但建筑业和服务业一直在稳步上升，2018 年分别达到 8.12%和 46.32%，它们已成为推动非农就业增长的中坚。

表 4.3 各行业的就业占比（%）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工业	建筑业	服务业
2003	49.10	21.60	18.04	3.56	29.30
2004	46.90	22.50	18.84	3.66	30.60
2005	44.80	23.80	19.98	3.82	31.40
2006	42.60	25.20	21.00	4.20	32.20
2007	40.80	26.80	21.95	4.85	32.40
2008	39.60	27.20	22.34	4.86	33.20

2009	38.10	27.80	22.32	5.48	34.10
2010	36.70	28.70	22.62	6.08	34.60
2011	34.80	29.50	22.78	6.72	35.70
2012	33.60	30.30	23.71	6.59	36.10
2013	31.40	30.10	23.73	6.37	38.50
2014	29.50	29.90	22.76	7.14	40.60
2015	28.30	29.30	22.09	7.21	42.40
2016	27.70	28.80	21.38	7.42	43.50
2017	26.98	28.11	20.18	7.93	44.91
2018	26.11	27.57	19.45	8.12	46.32

3、各产业就业密度的测算

传统上人们估测就业形势多是用就业弹性方法，即经济波动一个百分点，看就业能变化多少个百分点，但从 2014 年开始我国工业部门就绝对排斥劳动力了，就业弹性变为负，我们就不能再用就业弹性来估测就业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果工业增长越快，排斥的劳动力越多，这显然是荒谬的。

我们知道，劳动需求是派生需求，估测劳动需求的最简单原理就是用增加值乘以就业密度，后者是指一个单位增加值所对应的就业量，即一万元 GDP 所能创造的就业数量，随着技术进步的推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业密度会下降。

如表 4.4 所示，工业部类的就业密度最小，2018 年为 1029 人/亿元 GDP（按 2000 年可比价格）；服务业次之，为 1708 人/亿元；建筑业最大为 1899 人/亿元。

对于 2019 年的就业密度，我们在 2018 年基础上按最近三年趋势进行平滑：对工业部类，2019 年按 11.1%的速度衰减其就业密度；建筑业按 2.4%速度衰减；服务业按 2.25%衰减。结果如表 4.4 所示。

表 4.4 各产业部类的就业密度及预测（人/万元 GDP）

年份	工业	建筑业	服务业
2004	2308	3490	3875
2005	2205	3155	3560

2006	2062	2972	3212
2007	1885	2962	2794
2008	1745	2721	2598
2009	1722	2589	2446
2010	1571	2533	2269
2011	1457	2565	2148
2012	1492	2297	2017
2013	1476	2033	1994
2014	1389	2096	1960
2015	1388	1987	1894
2016	1320	1911	1809
2017	1143	1940	1788
2018	1029	1899	1708
2019	915*	1853*	1623*
2020	801*	1807*	1542*

注：计算时各行业 GDP 已平减为 2000 年可比水平，*为预测值。

4、若按 6.2%经济增速计，2019 年非农就业增量仅约 400 万，比上年回落近 230 万。

假设 2019 年中国经济增速为 6.2%，结合建筑业、工业、服务业等部类 GDP 占比的平滑趋势，估算结果如表 4.5 所示。

表 4.5 2019 年非农就业预测

	GDP 占比	折实 GDP（亿元）	就业密度（人/万元）	就业量（万人）	比上年增加（万人）
建筑业	6.85%	35169	1853	6518	218
工业	33.12%	152182	915	13923	-1168
服务业	53.25%	232619	拆分另算	37298	1357
合计	——	——	——	——	407

注：计算时各 GDP 已平减为 2000 年可比水平。

从表 4.5 可以看出如下几个要点：

（1）工业部门排斥劳动力的幅度有较大放大。这大概有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贸易战；二是技术进步。前者是短期因素，后者是长期因素。

（2）建筑业将先抑后扬，尽管一二季度就业量同比下降，但在下半年基建工程跟进的情况下，全年仍能贡献约 200 万的新增就业量。

如前所述，2019 年 1-2 季度，建筑业就业累计同比减少 12 万和 60 万，但这并不意味着全年就业就一定会减少。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上半年就业减少，但下半年反转为升势，全年就业仍增加的。远的不说，2015 年就曾出现这一情况，当年上半年建筑业就业同比减少 318 万，但到前三季度就收窄为-159 万，全年则逆转为正，比上年增加 68 万。相反情形也有，比如，2013 年上半年建筑业就业人数比上年同期增加 282 万，前三季度则收窄至 204 万，全年则逆转为负，同比减少 147 万。关键是看全年建筑业的 GDP 增长情况，至少从目前来看，建筑业增加值还在维持着较为稳健的增长态势，上半年增速为 5.5%，比上年同期还要高 1 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就业增长很可能会滞后到下半年。

（3）服务业仍然是“救火队长”，是抵补工业部类“就业减量”的主要力量，其就业增量仍能维持在 1300 万左右的较高水平，这主要源于其经济体量的扩张速度超过就业密度下滑的便利，即鲍莫尔-富克斯意义上的低生产率优势。

由于服务业门类较多，再加上有数据支持，我们把对各服务业门类分别估算，然后加总得出服务业的总就业人数。估算表明，2019 年就业增量超过 100 万的门类有：批发和零售业（+451 万）、教育（+150 万）、住宿和餐饮业（+135 万）、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25 万）。

5、劳动力供给减少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紧张局势

2018 年中国总就业人数为 77586 万人，首次出现下降，比上年减少 54 万，就有供给减少因素的作用。

（1）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趋势

一般我们对劳动年龄的定义是 16-60 岁，但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延迟退休等政策实施，对劳动年龄的定义出现了分歧，有人认为应该放宽到 65 岁。

但不管哪一年龄段，都在呈快速的下降趋势。如表 4.6 所示。

表 4.6 各口径下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趋势（万人）

年份	国家统计局数据				世行数据	
	15-59 岁	增减	15-64 岁	增减	15-64 岁	增减
2006	90586		95068		95575	
2007	91129	543	95833	765	96590	1014
2008	91647	518	96680	847	97438	848
2009	92097	450	97484	804	98123	685
2010	93962	1865	99938	2454	98658	535
2011	**94072**	110	100283	345	99070	413
2012	93727	-345	100403	120	99357	286
2013	91954	-1773	**100582**	179	99525	169
2014	91583	-371	100469	-113	**99605**	79
2015	91096	-487	100361	-108	99603	-2
2016	90747	-349	100260	-101	99507	-96
2017	90199	-548	99829	-431	99379	-128
2018	89729	-470	99357	-472	99144	-235

由于没有 16-60 岁人口数据，我们用 15-59 岁年龄段代替，类似地，我们用 15-64 岁来代替 16-60 岁人口。这里虽然有一定的误差，但不会太大，因为计算变化量时误差会被差分掉。

如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准，表 4.6 显示，15-59 岁年龄段人口的峰值出现在 2011 年，当时为 94072 万人，此后即快速下降，除 2013 年比较夸张外，其余年份的减幅基本都在 350-550 万之间，2018 年比上年减少 470 万人。

15-64 岁年龄段的峰值出现在 2013 年，当时为 100582 万人，此后开始下降，在 2016 年之前，每年下降约 100 万人，从 2017 年开始突然加速下降，减幅迅速攀升至 431 万人，2018 年则达到 472 万人，减幅与 15-59 岁人口相当。

若以世界银行的数据为准，也显示出类似的趋势，15-64 人口的峰值出现在

2014 年，当时为 99605 万人，此后开始下降，且不断加速，2015 年减少 2 万人，2016 年减少 96 万人，2017 年为 128 万人，2018 年则达到 235 万人。

总之，不管是哪个渠道，以哪个年龄段定义的劳动年龄人口都在呈加速减少的趋势。

另一个作用变量就是劳动参与率。

我们如何定义失业？，对劳动年龄人口来说，它要满足三个要素：一是目前没工作（比如调查前四周）；二是想工作（积极寻找工作）；三是如果提供工作，能在一个月内到岗。这三条中有一条不满足，就不能叫失业。

现实中很多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就没有工作意愿，比如全职太太，他们不符合第二条，即便没工作，也不能叫失业人口，他们实际上已经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不能统计到失业口径中，不能算经济活动人口。经济活动人口是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的加总，它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就是劳动参与率。

而这些年来中国劳动参与率一直在下降，特别是女性劳动力。如表 4.7 所示。

表 4.7 中国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趋势

年份	劳动参与率（男性）	劳动参与率（女性）
1990	84.79	73.20
1991	84.74	73.08
1992	84.72	72.97
1993	84.72	72.85
1994	84.69	72.71
1995	84.59	72.52
1996	84.44	72.30
1997	84.22	72.03
1998	83.95	71.73
1999	83.60	71.38
2000	83.18	71.01
2001	82.53	70.20
2002	81.79	69.33

2003	81.03	68.42
2004	80.32	67.55
2005	79.73	66.77
2006	79.25	66.07
2007	78.87	65.46
2008	78.56	64.92
2009	78.24	64.38
2010	77.88	63.78
2011	77.71	63.57
2012	77.54	63.40
2013	77.36	63.18
2014	77.14	62.93
2015	76.88	62.61
2016	76.57	62.23
2017	76.27	61.84
2018	75.87	61.26

注：数据源自国际劳动组织的模拟估算。

从表 4.7 可以看出，至少自 1990 年以来，我国劳动参与率就是不断下降的，就以男性劳动力为例，1990-2018 年劳动参与率从 84.79%降至 75.87%，28 年间降低了近 9 个百分点。女性劳动力下降的更快，从 73.2%降至 61.26%，减少了 12 个百分点。目前这一趋势还在延续，2018 年男性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为 75.87%，比上年减少 0.4 个百分点；女性为 61.26%，比上年减少 0.58 个百分点。

二、若 2020 年中国经济增速还能继续保持 6.2%，就业形势将有所回升，但这是以牺牲就业质量为代价实现的。如何保证就业质量不下降，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就业面临的主要矛盾。

延续上述测算，如果 2020 年中国经济增速仍为 6.2%，在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就业密度、GDP 占比仍按前序过程平滑演进。对 2020 年各产业的就业密度仍按

三年趋势平滑，具体地，工业部类按 12.5%的速度衰减其就业密度；建筑业按 2.5%衰减；服务业仍按 2.25%衰减。测算如表 4.8 所示。

表 4.8 2020 年非农就业预测

	GDP 占比	折实 GDP（亿元）	就业密度（人/万元）	就业量（万人）	比上年增加（万人）
建筑业	6.85%	37350	1807	6749	231
工业	33.23%	162176	801	12988	-935
服务业	53.60%	248322	拆分另算	38702	1404
合计	——	——	——	——	700

注：计算时各 GDP 已平减为 2000 年可比水平。

在上述假设下，2020 年工业部类将继续大幅排斥劳动力，达到 935 万人，但减幅比上年略有下降。建筑业贡献 231 万新增就业量。服务业的就业增量约为 1404 万，毫不例外，主要还是要靠服务业来堵工业劳动力流失的漏洞。

在服务业中贡献百万级以上就业增量的门类有：批发和零售业（+464 万）、教育（+159 万）、住宿和餐饮业（+137 万）、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30 万）。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行业也是劳动生产率提升得最慢的一些传统行业，低劳动生产率、低工资的问题比较突出，靠它们来拉动就业，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预测，即经济萧条时期的就业是凭借低效率优势实现的，特别是低生产率服务业，是以降低就业质量为代价来换取就业数量的。

第五节 结论性评语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以及对未来就业趋势的评述

2019 年以来中国就业形势一改往年一帆风顺的局面而变得较为较为复杂，调查失业率两次攀升，风险因素闪现闪离，就业形势既没有全面恶化，但也不是高枕无忧，难用好坏来一言以蔽之，这是与以往不同的一个新现象。

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中国当前的就业矛盾不是全局性的而是局部性，可以

从如下几个维度来剖析：1、分产业看，汽车、电子通讯、纺织等六大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信息服务业等短期内就业问题较突出。2、分地区看，东北和京津冀的就业形势最差，特别是东北。3、分所有制看，民营经济遭遇较大困境，就业景气度下滑严重。4、分规模看，作为就业海绵，小微企业步履维艰，就业吸纳能力下降。5、分就业形式看，传统的灵活就业人数锐减。6、分群体看，大学生就业压力大，但已接近洪峰尾声。另外，20-29 岁青年人失业问题严重。

纵观未来一段时间，影响中国就业的风险既有长期因素（比如技术进步），又会叠加一些短期因素（比如贸易战），它们交织发力，使局势更复杂。在这一过程中长期因素短期内可能会强化，比如技术进步加快排斥劳动力；短期因素又可能会演化为长期因素，比如贸易战的持续性。

具体而言它们包括：1、中美贸易摩擦。美国不断扩大加征关税的范围，并层层加码，可能会在未来某一时间，在局部地区、局部行业突然引爆失业风险。对通用设备制造业等九个对美出口行业来说，应格外关注。测算表明当美国加征关税幅度达到略低于 25%的水平时，这九个行业就可能会引爆失业风险，目前已有四个行业触及雷区，它们主要分布于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四省若干地区。其他四个行业还有 6-8 个点的关税加征回旋空间。2、工业企业亏损正在深化，今年以来亏损额增速远远超过亏损企业增速，长期以往，一些弱质民营中小企业可能会掀起倒闭潮，把劳动力集中抛向市场。3、工业经营困境可能进一步传导到生产性服务业，引发后者的过度衰退，使其就业创造能力下降，更会拉低就业质量。4、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正在不断渗透，未来一段时间内“技术吞噬就业”的步伐可能会加快。5、不断攀升的财政压力使政府进行直接就业干预的能力受限，政府要在赤字财政和就业干预之间做出艰难选择。

接下来我们估测了 2019-2020 年的就业形势。基于对各产业技术进步速度、GDP 占比及就业密度的趋势平滑，我们发现如果 2019 年经济增速为 6.2%，非农就业增量只有 400 万，比上年回落近 230 万，这足以证明今年就业形势之严峻。进一步，如果 2020 年中国经济还能维持 6.2%增速，就业形势将有所回暖，非农就业增量可能会回复到之前的水平。但需注意，这种回暖主要还是靠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租赁和商务服务等传统的低生产率服务业带动的，其占比提高不仅会拉低全要素生产率，更会拉低就业质量，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牺牲就业

质量为代价来维持就业数量的。

对于未来的中国就业，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

首先，中国就业有足够的韧性。随着经济体量的不断壮大，即便稍慢一些的经济增速也能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再加上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趋势，不太可能再出现大面积失业。在这种情形下，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出现与之前不同的变化，特别是失业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反应可能变得更平和，相应地，菲利普斯曲线变得更加平缓，这是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一个新的运行规律。

近年来，西方国家也出现了菲利普斯平坦化的趋势，但它们主要是源于货币政策“锚住”物价目标或工人议价能力不足，中国则主要是源于经济体量的放大，可以说，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其次，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矛盾正在转型，从数量型矛盾转向质量型矛盾，放眼未来，不太可能出现大面积的失业问题，问题是就业质量不高，甚至下降。劳动生产率不高、工资低、工作环境差、缺乏劳动保护、职业病危害频发、工作幸福感差等。中国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低质量就业是无法完成这一使命的。如何提高就业质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长期课题。

二、相关政策建议

1、对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带来的就业冲击，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不仅关注它会带来多大的总量性影响，更要关注它是否会在局部地区、局部行业引起突发风险。对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纺织服装及服饰、塑料和橡胶制品等可能已触发失业风险点的行业要重点监控。这些行业集中的地区如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应加快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或引导措施。

这些措施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积极性的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提高生产经营效益，这也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只有稳住经营，才能从根本上稳住就业。典型的措施如帮助企业介绍新的销售渠道比如第三国销售渠道，提供融资支持、出口补贴或税收减免。二类是中性的措施，它虽不能帮助企业解决经营困境，但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少裁员、多用工，比如有些地方政府规定只要企业不裁员，可以返还部分社保费用。三类是善后措施，针对可能出现的失业人群制定相应的安置措施，比如转岗培训、失业救济等。这些地区应建立专门的预警系统，加强监控、制定预案。

2、东北、京津冀等地区的就业压力主要还是源于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不足，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只有打造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就业压力才会彻底好转。东北地区新动能打造既要有产业升级的布局，更要有体制改革的考量，如何让国有经济焕发新的活力，并与民营经济协同发展，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对京津冀来说，更重要的是产业布局。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如何培育新兴产业、构建新的产业生态，并实现区域协同，是迫需解决的。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经济转型的成功案例比如德国鲁尔，值得借鉴。

3、对汽车、手机等近期面临较大困难的行业要研究专门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不是孤立的，而应结合产业政策、消费政策、税收政策、交管政策等进行。在汽车排放标准五转六的同时做好其他配套措施，比如，把握好新能源汽车补贴的退坡节奏、通过税收杠杆等工具引导汽车消费、放松摇号限购，通过这些举措尽量缓冲冲击。对手机行业，则要结合 5G 布局进行，5G 时代的手机销售与 4G 时代有很大不同。汽车、手机是两大代表性消费品，从根本上说，摆脱困境主要还是要靠提高消费能力，这进一步要求深化提高消费能力的各项改革，比如个人所得税改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对于那些边际消费倾向高的中低收入群体，要尽量保护并提高他们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4、企业是就业的细胞，民营中小企业更是国民经济的就业海绵，对于他们今天所面临的经营困境，要足够重视。今天企业最大的压力就是成本压力，包括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税费、环境成本、劳动力成本等各个维度，有些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导致的，交给市场调节；有些则是人为力量导致的，政府应加强调节和引导，帮助企业舒缓压力，比如遏制土地价格无序上涨、平抑商业地租；加大减税改革的力度，切实给企业减负；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些政策在推进时可以结合就业目标进行优化调整，比如对那些雇佣较多困难就业人员就业的企业，给予更大的政策倾斜。

5、对于技术进步排斥劳动力的问题，要辨证地看待：首先，这是经济发展内生规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也无法阻挡，更不能因噎废食，技术进步有它的演进轨迹，我们只能适应。其次，对于技术进步的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效应，可以通过一定的干预手段进行矫正，核心就是要素比价，如果政府为就业提供补贴，那么就相当于变相地降低了劳动要素的相对价格，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企业多

雇佣工人。在技术进步浪潮下，政府要做的另一件工作就是提供培训支持，防止工人由于技能不匹配而导致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纵览世界，曾出现过不少国家由于人力资本跟不上而导致失业蔓延并最终阻碍结构转型的先例，比如墨西哥。培训是提升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渠道，但一直存在市场失灵的问题，企业和个人都不愿意买单。政府在提供培训支持时要处理好它与企业、个人的三者关系，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它应该通过间接方式参与，不能代企业和个人做决策。

6、要重视青年人失业问题，它既有人力资本不足的原因，又会进一步加剧人力资本的不足，造成恶性循环。青年人拥有健康的体魄和生命活力，如果仅仅因为技能不够、经验不足而被闲置，那是一种更大的人力资本浪费。青年人失业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发达国家一般都高度重视青年失业问题并想尽各种办法来化解之，比如美国为打消雇主雇佣青年人的顾虑，对青年学徒工专门制定了最低工资的豁免条款；德国为学徒工培训买单。

7、完善城市管理体制，放开地摊经济、夜间经济，给灵活就业以更大空间。大凡经济不景气时期，灵活就业是促进就业的一个重要补充，它是低收入阶层的一个重要就业通道。即便在发达国家，灵活就业也是就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业占比很高。严格的城市管理体制有益于美化城市环境，但也要结合民生性的就业需求来设计。其他一些政策设计也要跟上，比如延长夜间公交时间，为夜间消费创造便利。

8、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用好专项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基建投资对农民工就业具有重要作用，它就主要靠财政投资来撬动，而目前财政压力很大，负债规模较高，在这一过程中要处理好赤字财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在这一方面希腊就是一个教训，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希腊利用融资成本低的便利条件通过大量发债暂时解决了就业难题，但经济的深层次矛盾被掩盖，随着融资链条的断裂，债务风险爆发，失业问题卷土重来，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还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国家经济的竞争力。

9、全面提升就业质量，把它作为国家经济振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升就业质量关键还是要靠提升劳动生产率，除了从供给端提升产业竞争力外，还要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技能，只有人力资本跟得上，产业升级才能推进，就业质量才能得到保障。未来就业政策要从过去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升级为提高劳动者

的高质量就业能力，这是其一。其二，继续优化劳动管制政策的设计，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合同法等，为提升就业质量创造制度环境。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要兼顾劳方和资方的利益，通过集体协商的形式来实现双赢。

10、重构就业政策体系。它有两层内涵：积极就业政策要更“积极”、消极就业政策要更“消极”。就前者而言，积极就业政策要为高质量就业创造条件，不再满足于充分就业，而是高质量的充分就业。就后者而言，要构建社会安全网，通过完善的失业救助系统为失业者提供庇护，使他们在经受市场风浪荡涤的时候不会被社会抛弃、不会陷入无助。